

目 次

高个子的姑娘·····	7
槌子头·····	36
街·····	71
下乡的文工队·····	95
安静的人·····	133
在军事基地旁边·····	168
译后记 ·····	199

高个子的姑娘

1

春江排在研磨机旁的行列里，等着研磨镞刀。

“噢，贴出来啦！”不知是谁在她身后说。

她一直在想着弟弟保雄的事情，没有注意。工会干部石野，把梯子靠在那隔着装配间的用铁柱支着的大屏风上，正在爬上去贴一张通知。那张纸上写着：

根据前日分会大会的决定，今日中午讨论要求增加工资的问题，请全体执行委员届时来工会办公室参加为荷。

春江本来打算在吃午饭的时候，到宿舍去看看弟弟的。石野从梯子上下来，笑容满面的朝这边走来。这个还很年轻的工会副主席，从前也是这个镞盘车间的工人，他和大家匆匆地说了几句什么，又朝着春江点了点头，然后就提着浆糊桶，拿着一卷没有贴完的纸，穿过了镞盘车间，到隔壁的煅冶场去了。从石野脸上的神情看来，弟弟大概没有什么事，春江多少有点安心了。弟弟保雄已经十五岁了，是两三天

以前才从少年监护所^①領回来的，因为不便讓他住在女工宿舍，所以把他安置在男工宿舍石野的屋子里。

“喂，女兵，你得給我們好好干！”

一个男工从后边用力扳住春江的肩头說，几乎使她上身仰了过来。

“去你的！”春江把他的手推了下去說。

“你可別象要求发年終獎金的时候那样，下乡买什么东西去呀！”

听了这話，等着研磨的五六个工人，都咯咯地笑起来。在这拥有七百会员的日本金属公司的日本工机工会分会里，除工会主席和各部部长九个人以外，还有三十几个干事，这些人組成了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春江也是女工部的干事。一般金属工厂的工資都是很低的，而这个与金融財閥沒有直接关系的工厂，工資更加低。战时，这里制造兵器，有一个时期連征用工人在內曾达到两千工人，工厂厂房也扩充得很大，可是現在却只能制造一些縫紉机之类的机器了。去年下半年連这些东西的銷路也很糟，因此工厂当局就借口亏损过大，不断地暗示着要裁减人員。工会为了設法克服亏损現象，就主动地成立了一个“生产对策部”，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質量的办法，来对抗工厂的裁員計劃。但是工厂采取了这样的手段：比如，本来有三架研磨机，两架发生故障不能使用了，必得修理，車間工会委員請求了多少次，

^① 即是監禁未成年犯人的監獄。

工厂却連一条小小的皮帶也不給，大家就只好排着队等着使用这唯一的一架研磨机。工厂既然用了这种办法来对付工人，那么，可想而知，这次的增加工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兵，你好办，一个人吃飽了一家子不餓……”

一个老头子，把凉凉的鑿刀放进口袋里，交叉着两臂，不断地盯着春江的还有些孩子气的臉，象叹气似的說。春江吃了一惊似的，睜大了眼睛。

“是么？就光是靠着这連所得稅在內的三千八百块月薪？”

笑声又起来了。女兵，是那些从中国回来的男工們給春江起的綽号，和中国話的“女兵”发音一样。三木春江是个很有人緣的人。她是这个鑿盤車間里仅有的五个女鑿工中的一个，也是最年輕的一个，她又总是和男工們一样，穿着旧軍裝改成的工作服。她的面孔除了蒼白的面色、和大大的眼睛之外沒有別的特征，瘦長个子——一直在营养不良里長大起来的身体，加上，她总是戴着用白油漆写的“日本工机”四个字的、有帽遮儿的帽子，也許就是这些令人想起了中国的女兵来的吧。不过，使工厂的人們感到春江的魅力的，倒不是这些东西。这个十九岁的姑娘，性格虽然完全說不上明朗，但也决沒有一點儿阴暗。当同伴中間有人鬧点小別扭，她能够替她們痛痛快快地說开了事；她那生来就是腰板挺拔的身体，使她总是显得很严肃，平常人們很少看見她的笑容，但說起話来有时可滿有风趣……。

好容易快輪到她的班的时候，那个轉动着研磨机弄得

机上火星四濺的田島——他是一个調皮的男工，脖子上圍了一條毛巾——用手摸了摸剛磨完的鏟刀的刀刃，突然轉過身來，兩眼骨碌骨碌亂轉地看住春江的臉，猛然用兩手托着那柄鏟刀，做着刺槍的姿勢，叫了一聲，就朝着春江的胸部刺來。她胸部往後一縮，他馬上又朝着腹部來了。他的穿着軍靴的腳向前亂跳，退後一步再向前兩步。春江張着嘴，睜大了眼睛，盯住了對方的臉。這時春江臉上表示出她似乎並不以為這是開玩笑。她向後退着，向後退着，一直被逼到發動機室的鐵門前邊了，她忽然用孩子似的尖銳聲音叫道：

“田島上等兵！立正！”

這個脖子上圍毛巾的男子，跳起有半米高，立刻兩個腳踵靠攏，做出直立不動的立正姿勢。這個曾在中國的華北當了五年兵的鏟盤工，在她這一聲喊叫之下，彷彿被喚回他從前的生活里去了。

“你這家伙，一定在中國欺凌過婦女和兒童！呵？”

春江已經鎮定下來了，她兩手背在身後，從“田島上等兵”的脖頸窪兒到他的腳尖上，象檢查似的，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我沒有！”鏟盤工仰着臉，大聲地回答。

“撒謊！”春江用穿着帆布鞋的腳，頓着混凝土的地面，叫着。然後，又喊道：

“向右轉，開步走！”

於是，這個上等兵，邁開大步，把腿抬得高高的，膝蓋幾乎碰到了下頰，走向自己車床那兒去了。在大家的笑聲里，

春江背着手，挺着胸脯，板着脸从后边看着他。

她虽是个很有人缘儿的人，可是决不是一个很逗人爱的女人。她整天都只在她的刨床旁边工作，不跟大家在一起胡闹。磨完了刨刀回来，大家把木片塞进炉子里，争先恐后地围着炉子，烤着冻僵了的手，可是，春江装着没看见他们。

“烤烤火罢，女兵！”

一个转过身烤着屁股的男工，被烟熏得直眨巴眼睛，用仿佛是从头顶上发出来的声音叫她，可是她看也没看他。春江把多少有点凹下去的下巴贴着脖子，俯下头去。看她那侧影，好象在生着气。这个穿着塌肩膀的旧军衣的女孩子，在她那没有表情的苍白消瘦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娇柔的微笑，总是显得很倔强，但在她生起气来的时候，身旁的人却弄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生气？对什么人生气。

可是现在，春江是在热心地唱着歌。实际上，她虽然在生着气，但是生谁的气呢，她自己也不知道。有时一声不吭地憋着气，但过了这一会儿，就变成无缘无故的悲哀，这悲哀忽然又会变为歌声从嘴里唱出来，不知怎么一来，连她自己也迷惑起来了。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①

① “战争与和平”影片的主题歌，即是我们“流亡三部曲”，日本文与原词稍有不同，今从原歌词。下同。

她会唱各种歌曲。“国际歌”，“可厌的坩埚”，連最近的“西伯利亚交响乐”里的主题歌“贝加尔湖之歌”，也会唱一半。她现在唱的是“战争与和平”里的主题歌。她忙着用戴着无指手套的手，去弄好机器皮帶，又旋轉着把手。一边在听着自己的低低的歌声，透过无数革帶的轉动声和从煅冶場傳来的大鐘的响声，又回到她自己的耳朵里。在“战争与和平”电影上看过的各种場面——用扁担挑着嬰兒和家具的中国的母亲的特写镜头：高高的颧骨和紧皺双眉的臉。捧着空碗的赤脚的少年。手拿着系在羊脖子上的繩子，被羊引着往前走路的盲目老人。这些在头腦里一闪而过的各个場面上边，忽然重叠地印上了弟弟保雄的臉，和多年沒有見过的母亲的臉。

——哪里是我們的家乡？哪里有我們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燼，无限欢笑，轉眼变成凄凉……

春江在想着：被燒去了房屋，被夺去了土地的人民，难道仅仅是战时中国才有的么！

分給女工操作的銼床，是旧式的，工作起来很費勁；所制造的也都是些簡單的东西，是縫紉机的脚踏板和連結动輪的系杆的一部分，就是把材料放进卡盤上，搖着搖輪，用銼刀銼着加工的部分。嚓嚓嚓……要是从崩落的鉄屑里，冒出淡淡的灰烟，就要赶快地用笔上油。嚓嚓嚓。冒着藍色的火花銼成了一道道溝槽的一瞬間，是最緊張的了。要

立刻迅速地把手把往回旋轉，然后用錘把系杆敲開，再拿量尺去量。——春江已經這樣單調地接連地干了三年了。她希望做些較複雜較困難的活兒。她希望做一些象那些手藝很好的老工人們常說起的那樣：也去切削汽車的引擎，切削那種大的蒸汽發動機的主軸。她願意多多地製造拖拉機和發電機，多多地製造能使日本繁榮起來的活計。然而現在沒有任何工廠製造這些東西。工廠里有三架三公尺長的大鏟床，被放在角落里，蓋着雨布睡大覺，沒有用處。對於那些手藝好的男工們，那種在縫紉機搖輪上鉗鉗孔一類的小活計，只能讓他們無聊得打呵欠。

日本的工厂，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呢？春江是知道的。这是日本的軍閥和資產階級，为了自身利益而發動的戰爭所造成的。而且她還知道，日本所以陷入如此的苦境里，乃是大資產階級为了自己的再起，把人民踐踏在腳底下所造成的。春江进了这个工厂以后，她在由工会圖書部借來的書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川上貫一的“資本論讀本”里讀到過，在共产党的机关報“赤旗”上讀到過，在難懂的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上也讀到過。在一九四八年年底的“年終獎金斗争”中，她作为一个分工会的执委，又是“日本工機”支部的一个黨員，从斗争中也懂得了这个道理。同时她也知道：如果工人們不打哈欠，開動大鏟床；大伙儿积极地干起來，去製造拖拉機發電機等等和平生產的機械，那么日本很快就会繁榮起來的。同时，她也了解：为了建立这样的合理的社会，工人階級必須站在最前边，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

爭。她的身材，仅仅在十八岁的一年中就長高了五公分，可是她的精神，却不知增加多少倍了。讀報紙，听广播，参加大选的斗争，她也能按照她所能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事物的本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当她意识到，她自己也正在向着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升时，她常常感到一种眩晕似的喜悦。但是，也许由于生理作用，这种雄偉的感情活动，也有时会相反地变成一种愤怒，或者深深的悲哀。

——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

春江反复地唱着这两句。她是有一种失去了故乡和父母的心情的。她的当邮差的父亲，在那年三月九日的空襲中，在深川失踪了，不知死活。那时母亲就带着春江他们四个孩子，被疏散到岩手县的气仙沼去。但是在现在，在她的心里，母亲却不是一个值得令人想念的母亲。她只觉得母亲很可怜而已。她领到手的月薪只有三千三百元，可是每月都要给母亲寄三百元或五百元，她自己只好一连三四天的喝着面疙瘩汤。可是，她一点也不想看看母亲去。……从前，他们住在一家农家的小仓房里，没有门，只在门口上挂了一领草席子。母亲根本就不想下地干点活儿来维持生活，只是从那个在半夜里蒙着脸偷偷跑来的农人手里，接受些大米或者青菜过活。村子里人人都知道了，闹得春江连门都出不去。最后，当她和弟弟保雄两个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虽然她还不过是个孩子，但是凭着女性的本能，她发

觉母亲已经怀孕了。

“三木，三木！”

中午的汽笛响了，头上传动带的转动开始缓慢下来的时候，从早已做完了活儿的装配间的大屏风那边，同住一间女工宿舍的西岡伸过头来，喊她一起吃饭去。

“我就来！”

春江用脱下了手套的手，朝西岡摆了一摆，答应一声，就从后门上女厕所去了。在厂房阴影里的狭窄的小道上，满是红锈的铁屑，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出了厕所，走在通后大门的路上，当她来到制品仓库拐角的地方时，不觉噢了一声，放慢了脚步。她看见一个少年四肢着地爬在地下，把脸贴在那下着大锁的铁门下边，从离地五六公分的空隙处向里边张望。她觉得好象见过这白斜纹布旧衣服改的上衣。走到跟前一看，那个椰子似的后脑勺上有一块秃疤的小脑袋，慌忙转了过来。

“是保雄吗？”

两条连在一起的眉毛下边，闪着光的小眼睛，一看见这是姐姐，就抬起半个身子，嘿嘿嘿嘿地笑了。

“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春江很吃惊。虽然宿舍和工厂同在一个大围场里，可是距离一大段路，中间还隔着一道混凝土圆墙，有一个守得很严的门。这孩子为了来看姐姐，难道是跳墙过来的吗？

“真的，你怎么回事？这儿是‘赔偿工厂’①，要是让那

些‘哈囉’^②們碰見，可不得了！”

她一邊給他拍打着弄髒了的上衣前襟，一邊問他，他只是嘿嘿笑。他眼睛亂動着，留神一看，他的褲袋里裝得鼓鼓的。春江怕被周圍的人們看見，悄悄從他褲袋里拿出二三十個銅牌，從大鐵門底下扔了進去，趕緊拉着弟弟就走。

“別瞅這瞅那的，走罷！”

十五歲了，可是個子很小的禿小子，在春江肩膀底下，總想站住看看。春江一手摟着這孩子的肩膀，覺得這孩子在粗粗地喘着氣。好容易在通行門那兒搜查完了身體，來到宿舍和公司住宅的廣場上的時候，從對面跑來一個安裝部的有點眼熟的女工，她一邊對春江微笑一邊走了過去。這時，這個梆子頭忽然仰起臉來說：

“這個妞兒，長得不錯！”

春江不由地撒開了手。這個歪扭着嘴在嘿嘿笑着的，難道還是自己的弟弟？她直盯盯地看着他，可是他的臉上卻沒有一點感覺。

“姐姐沒回來以前，再不許到外邊去了！”

弟弟一個人穿過廣場，往宿舍那邊走去。他的兩手插在褲袋里，一邊走一邊不住踢着路上石子的背影，雖然還是和普通的孩子們沒有什麼兩樣，可是，春江張着嘴，在後邊望了好一會兒。

① 賠償工廠：即在日本投降後，一部分軍火工廠被劃為賠償，後來被美國占領者擅自交還日本軍火工業資本家，從事製造軍火。

② “哈囉”，指當時接收工廠的美國兵。

增加工資对策委員會的會議，从午飯以后就开始了，到下班的汽笛响起来时還沒开完。不知什么时候，头上的沒有灯罩的灯泡已經亮了。到底要求增加多少工資呢？这是討論得時間最長的問題。前天的职工大会上，做出一个初步的決議：要求与去年春天时一样，按照物价指数的比例增加工資；可是，实际做起来这是很麻煩的。大家認為，政府的所謂物价指数，如果按着人們的实际生活来算一算的話，那完全是杜撰的东西。大家还討論到如何兼顧到基本工資和“技术津貼”的比重，这些問題都是比較复杂的，弄得主席也不好解决。在这以外还談到，虽然都是在一个工場干活的，但是如果比較一下安裝部和鍛冶場，在工作服的损坏上，就非常不同。職員方面的一个委員还說，職員們是必須穿西服的，这是由于經營上的必要，并非只是为了漂亮。——从这些令人听了生气的瑣碎事情，又轉到了公司接受这些要求的可能性，談到公司的亏损，一直談到了“單独資本”^①的“日本工机”的命运以及“經濟的九項原則”。鬧了好久，好不容易職員方面的委員才使用計算器算出了标准工資——三年工齡三口之家的工人，每月工資九千二百五十元。这时，代替那个因伤风在发着燒的工会主席主持會議的石野，用

① “單独資本”，指沒有大銀行財閥为后台的資本家。

已經嘶啞了的声音嚷道：

“有不同的意見沒有？就这样決定啦，有不同意的嗎？”

還有，決定最低工資的問題還沒有討論。春江兩手緊緊地抱着自己的兩臂，幾乎要抱到肩頭上了。她望着那殘留着一点微光的窗子，漸漸地變得憂郁起來。工會辦公室是在工廠的一個角落里，是用木板隔了起來的大約有六七十平方尺的房間。把食堂的條桌擺成了長方形，四十幾個人擠着坐着。沒有天花板。玻璃窗被風吹得直響，有的玻璃已經碎了。忍着寒冷，有人不斷的頓着腳。春江覺得：大家總是在公司虧損的這件事上轉圈子，簡直把她急得出不來氣了。

“現在，討論最低工資。決定了以後就作為職工大會的決議，大概不會有不同的意見的。那麼，最低工資該定多少呢？”

素來規規矩矩的工會主席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從文書那裏取過記事冊，念出現在最低工資的一兩個例子：工廠事務室雜役某某，十七歲，工齡三個月，連稅兩千三百元。安裝工段見習工某某，十八歲，工齡五個月，連稅二千七百元。——這時，把一件黑外套一直披到頭上的安裝工段的老工人馬場，吹着他那大胡子，打了一個呵欠，暴躁地說：

“標準工資定出來了，最低工資不也就定出來了嗎！按九千二百元一算就行啦！”

於是，有三兩個人舉起手來。——“那可有點不合理……”“這是基本人權的問題呀！”

“等一等，等一等。不要乱嚷！”

石野紅着臉叫着，可是，披着外套的那个老头子还在嚷嚷着。战争时期做过車間記錄員，工会成立以后做了車間委員的馬場，工齡是很長的，而且技术也很好。老工人虽然認為象石野这样年輕的工会干部們，只不过是些毛头小伙子，可是因为他們做事認真，也很能做工作，在工人中間也有威信，所以素日也还服从他們。不过，一到紧急的时候，他可就不客气了，春江一直就是痛切地感到这一点。也可以說这就是所謂“手工业工人的气質”，但是她以为除此之外还有別的东西。他們強調技术津贴，強調工厂是亏损的——在这里，老年工人所特有的那种权威，使得不少人去同意他，也有人撤消了自己的意見。安裝工段的別的委員們都沉默着。还有一个戴着軍便帽的、从左額到髮角上有一块火伤疤的煅冶場的老头子，和馬場两人一唱一和。年輕的委員們的意見，常常被压了下去。这时候，如果支部和“工会統一派”的势力弱下去，工会形成了分裂的話，那么这种手工业工人气質就会变成“民同派”思想，甚至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春江这样想着。

“我同意工会的主張，五千元是可以的。”

主席的对面，長方形座席的比較窄狹的一头上，坐着的是女委員們。春江站起来，說了这話的时候，馬場从外套領子里把大胡子的臉轉了过来，“噢”了一声：

“这么一来，标准工資就成了一万五千了，那么象我这样的就能拿两三万啦，真要謝謝！”

老头子的周圍，响起了笑声，春江身旁的女委員們甚至聳起了肩膀。如果說在这个本就虧損的工厂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該拿五千元工資的話，那么，輿論一定会認為这簡直是不現實的。

“主席！”春江举起手来，轉头望着安裝工段的老工人的臉，紅着臉說，“是这样的！”

她站了起来，伸出她的有点陷下去的下巴，天真地、大胆地說道：

“象馬場老爷子，就是拿三万五万工資都是應該的。一家八口人，十五年的工齡，在这种时候，完全是應該的啊！”

有一会儿，全場都呆住了，馬場他們張大了嘴。有人在說：

“离題啦，离題太远啦！”

“不是离題太远，”她望着說話的那边，“这是根本問題啊！标准已經定出来了，沒有办法。不过，請問，在目前这种时候，一个人要租房子，要繳地方稅，要花交通費，五千块钱剩下来的够不够吃飯呢？我，我对你們开口就是‘虧損，虧損’的，首先我就不滿意。好象虧損成了反对增加工資的盾牌！虧損，这并不是我們造成的啊！”

她象个小孩一样，仿佛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上搖落下去似的，一边搖摆着身子，一边說。周圍的人們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了。这笑声，一时几乎把青年工人和老头子中間的对立情緒都消除了。在笑声里，有一种明快的东西，使大家的心情向着寬广的世界解放开来。

“啊，我們可敵不過女兵！”

在三個方案里，因為老工人們收回了他們的三千五百元的提案，在石野主持下多數通過了四千元方案。當馬場走過那唯一堅持五千元方案的春江身旁準備回去的時候，這老头子還在笑着。

“部長們，請等一會兒！”石野追着爭先恐後往外走的人們，叫着，“後天去交涉的時間，等和公司商量以後再在各個車間貼通知。”

春江在門口看了看，石野連一點工夫都沒有，就決定今天不談了，走了出去。沒有受完義務教育的保雄，還不能去做工，她已經托石野去問工會委員會，能不能讓他一邊上學，一邊在工會里當個雜勤工。跟弟弟不在一起的時候，春江覺得弟弟還是個小孩子，是和自己血肉相連的骨肉。弟弟，簡直就象是自己的唯一的故鄉一樣。

“保雄！”

進了宿舍的門廊，在成為男工宿舍和女工宿舍分界的、鋪着地板的寬闊走廊里，穿着有花紋衣裳的，還有照舊穿着工作服的男工們在分成兩三組跳着舞。在因出了毛病而上着鎖的鋼琴上，留聲機在旋轉。保雄一手托着臉，呆呆地站在旁邊望着。

“吃了什麼東西嗎？”

“嗯嗯。”

保雄用懶散的脚步，走到她身邊來，瞪着遲鈍的眼睛，搖着头。春江對他說：馬上就做飯吃，保雄就默默地跟在她身

后,上了楼梯。

“回来了。”

进了屋子,已經換上了和服的西岡,正俯在炕上讀着一本什么杂志。

“啊,辛苦辛苦!”西岡說,抬起了上半身。

住在一个屋子里的大井千代上街洗澡去了。六叠席的屋子收拾得很整齐,令人一看就知是女人們住的。春江把小火炉抬到廊下的晒台上去,做着晚飯。保雄呆呆地站在拉門的外边。

“进来吧!”

西岡站起来,拉开屋門叫他,他还是沒有表情的直立着。等到做好了飯,把大家公用的小飯桌搬到屋子里来的时候,他縮着肩膀坐在一头上,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吃了起来。

“怎么样了? 最低工資?”

对于宿舍的独身者們,这是最关心的問題。无论是西岡或大井千代,很多人都是和春江一样的,都必須寄錢回去,养活她們的亲属。

“可是,問題是在以后呢!”

西岡斜躺着望着她,她却眼望着弟弟,又說:

“是嘛,年終獎金斗争的时候,还搞了‘静坐斗争’呢!”

春江这么回答,看着保雄捧着盛了面疙瘩的大碗,什么都不顧的大吃着。吃完了以后,他吐出一口气,象老人似的两眼无神。西岡說:

“你換衣裳吧，碗什么的，讓我来連我的一塊洗吧！”

說着就站了起來，保雄慌忙地要往外走。

“再玩一會兒吧，要不，就跟姐姐在一塊兒睡不好么？”

西岡提起了洗東西的木桶，對他說。她和春江兩人用各自不同的表情望着他。他低着那梆子似的腦袋；看他的側臉，好象是在研究着自己現在站着的地方，在窺伺着別人的動靜似的。在春江看來，他現在這種惊恐的眼光象老鼠似的，今天白天的那種可怕的表情，已經不知隱藏到哪裡去了。這孩子仍然是可憐的啊。

春江換上了從鄉下出來時穿的斜紋布水兵服，就領着保雄到男工宿舍去，可是，石野還沒有回來。她想也許今天晚上他在工會辦公室里要忙一個通夜了，於是又把保雄領回自己的屋子來。

“行不行呢？讓他睡在這兒？”

大井千代已經回來了，愉快地點了點頭。關於弟弟的事，春江一點沒隱瞞地對同屋的人說過。她們見了他以後，還只把他當做一個純粹的孩子。每人鋪好了自己的被褥。她在靠着拉門那兒和弟弟一起躺下的時候，喜歡跳舞的千代躺在被窩里對西岡說，后天是和公司交涉的日子，不知道還有沒有跳舞晚會。

“鬥爭是鬥爭，跳舞是跳舞啊，是么？”西岡對正翻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讀着的春江說。春江的眼睛盯着鉛字，同意地說：

“是啊，從此以後，鬥爭是長期的啊！”

西岡她們虽然比春江大了三岁，在这些事情上，却都是要問問春江的。常使西岡她們吃驚的是，春江总是不知从哪里借来很多書看，而且讀得非常快，有时还提出一些沒头沒腦的問題，使得西岡和千代无法回答。——意大利的陶里亞蒂发表了了不起的声明！实在了不起！我簡直高兴极了！你怎么想呢？馬歇尔計劃到底会怎么样呢？……

还是按着战时留下的习惯，熄灯前三十分鐘，楼下敲起大鼓的时候，西岡她們已經睡了。头上的灯灭了的时候，春江被挤得很不舒服的側过身子躺着。保雄的有一块秃疤的后腦勺，在走廊上昏暗的灯光下，映进她的眼里来。——弟弟怎么办呢？她睜大了眼睛望着暗暗的天花板，春江的想象，由中国、北朝鮮的广大世界，又回到身旁这个亲骨肉的、小小的生物身上来了。——这孩子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使他还原为从前的弟弟呢？……

——从疏散在岩手县的家里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象是拴在姐姐身上似的紧紧跟着她。他們来到东京的上野，到神田猿乐街去找叔父的时候，那里已經是一片燒焦了的野地。后来她想，說不定父亲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呢，于是又到深川的燒毀了的廢墟上去寻找，当然，这是沒有用的。从乡下帶出来的飯团子快沒有了，无依无靠地走到上野車站，这天夜里就在地下鉄道的隧道里睡了。就在这儿，十六岁的姐姐和十二岁的弟弟，遭遇了分別的命运！

失去了弟弟的姐姐，想回到岩手县去。排在車站前的長長的行列后边，到天亮了的时候，好容易排到售票处前

边，还有五六个人就输到自已了，可是，春江还是想去找弟弟，就跑出行列外边去了。由山下到广小路，又由本乡走下壹岐坂的下坡，几次站在派出所前边，都因为担心着这回连自己也許被逮了去，到底沒敢申訴一下弟弟的事情。

在神田的叔父究竟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无法知道。她到飯田桥的职业介紹所去时，那儿介紹她到住宅区的一个面包房去当女仆，从此开始了春江的新的命运。不过，在这头两年里，即使探听到保雄的下落，恐怕春江也沒有办法把弟弟帶回来。后来，她看到道旁电杆上的一張招工广告，得到面包房附近商店里做針綫的老太婆做保人，她就进了这个工厂当学徒，这只是因为她厌恶了在面包房里当女仆的生活。被大卡車載走了的弟弟的行踪，却是在半年多以后，由岩手县的母亲那儿得知的。可是直到今天也沒能从警察署那里知道保雄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落到这种地步的，保雄原来是被收容战灾儿童的琦玉天使园收容着的；那时春江費了很多事，好不容易才能够看了他一次。要从大宮車站坐公共汽車去的这所天使园，是个古老的小寺院。穿着黄色袈裟的“园长”，用十分庄严的語調說，只允許十分鐘的会面。把正在干着的活儿停下，从墓場对面的田地里走过来的、手脚滿是泥土的保雄，見了姐姐的面，連笑都不笑，簡直象个生人似的，他那眼睛里有一种在不断地窺伺着別人臉色的眼光。人是完全变了样子了。

这个座落于南多摩地方，被农村包圍着，凡事无不落后的工厂，也成立了工会。当春江終于能自由地操作旧式鋸

床的时候，保雄和园里的五六个大孩子，从园里跑了出来，在一家农家的小仓房上放了火，加入一帮小偷儿里边，因此被送进了少年监护所。这情形，春江是在三个月之后才知道的。一年之间，春江去看过他几次，见面的时候，简直使她伤心。不过，即使如此，她也还没有对弟弟失去希望。当他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在火车里，把脸俯在姐姐的膝盖上睡着的弟弟，在地下铁道的寒冷的水泥地上，和姐姐相抱着睡去的弟弟，是春江的亲骨肉啊。

“怎样？要是再干坏事，就把你关进大人的监狱里去！
嗯？”

她去领弟弟出来的时候，弟弟在坐在高坛上桌子后边的那个官员的眼光之下，光着脚站在寒冷的地板上，他对自己命运将要怎样变化，似乎并不关心，也不存什么希望。他的茫然的脸，对着墙壁。春江代替弟弟回答道：

“再不做坏事情啦！”

她这样回答的时候，有一种象是被人硬按住脑袋似的不满和愤怒涌上心来。出去以后，春江抱住了弟弟的头哭了起来，不知是因为怨恨还是懊悔。

“都是姐姐不好啊。原谅我！为了你，姐姐以后一定要好好干！你也学好，好好地干点活儿吧！”

那个紧紧拉住姐姐的衣裙，好象害怕一下子会走失了，紧跟在姐姐后边跑着的矮小的孩子！那个把饭团子掰开来吃，因为自己的大了些，好象觉得对不住姐姐而在躊躇着的孩子！那个老实的、可爱的弟弟，到什么地方去了

呢？

春江不时的縮着身子，为了讓弟弟睡得舒服一些。弟弟翻过来調过去的睡着，有时滾到她身边来，有时又滾开去。她看着弟弟的臉，回憶着。这一瞬間，她突然惊讶地想到：真不容易，自己竟沒有变成一个墮落的少女！真的，这中間只不过是一发之差啊！

——呛人的、干辣的尘埃，种种的气味，在疲劳困倦的感觉里，忽远忽近地侵襲着人。婴儿的啼哭声。似乎就踏在头上的各种脚步声。吼叫声。孩子的呼喊声。那个把軍便帽盖在臉上睡着的老人的咳声，忽然象潮似的远去了，却又突然来到耳边，把她咳醒了。身下只鋪了一条包袱皮，水泥地的凉气滲进身体里，保雄的秃秃的头钻到她的下巴颏底下下来了……

“搜索啦……”

这喊声，不知由哪儿钻进耳朵里。突然，不知是什么人，一脚踢在春江的背上，从人們的身上跳了过去。从水泥的洞穴口上的緩坡那边，传来了混杂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她把怎么搖也搖不醒的弟弟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心猜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叫声、哭声，越来越厉害了。可是，也有的人非常迟緩。把一个包袱当枕头枕着的老头子，用滿是泥垢的手按在穿着旧軍裝的胸口上，只是在咳嗽着，微微張一張眼睛，臉上是一种听天由命似的表情，又閉上了眼睛。一个靠在背囊上，把嬰孩的头按到胸口上的妇人，深深的打了一个呵欠，忽然低下披散着头发的臉，自言自語

地說：

“你們愛怎樣就怎樣罷！”

春江想着：原來是出事了……這時，一個把磨得象木板似的木屐夾在腿間睡着的男孩子，忽然睜開了眼，趕快把手伸進衣袋里，接着就把當枕頭用的空罐頭盒子拿在手上，推撞着周圍的人們，奔向出口那邊去了。

出了事了！什麼事呢？是什麼壞事吧？春江還是弄不明白，一刻比一刻的不安起來了。事情來得非常快，但又非常遲緩。大概是手電的銳利的光，在出口那邊閃動着，那邊，人們漸漸騷動起來了，接着，春江周圍的人們也開始站起身子。

“沒有什麼可怕的事，別怕！”

她把干糧包兒系在保雄的腰上，自己拿着小包袱，和人們一起一步步地移動着，春江俯在弟弟頭上安慰了好幾次，走近了出口的時候，聽見有人喊：

“往左邊來，左邊！”

響着拍拍的皮鞋聲，有人大步跑過來。

“好啦，就到這裡！”

手槍皮套的氣味，沖進鼻孔里，春江的肩膀被捉住了。

“把東西放在前邊！穿衣服的把上身脫下來！”

幾道似乎是手電的銳利的光綫逼近過來。象軍人似的黑衣的警官，兩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戴着口罩的“紳士”，好象覺得很稀奇而亂轉着藍眼珠的、高個子的美國兵，——這樣一群人慢慢地走近來了……

“我，我是……”

春江仿佛在拚着命似的，想要証明自己沒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一只手攬着弟弟的肩头，一只手紧紧拿着包裹。

“我，我是在深川遭到战灾的，現在在岩手县气仙沼……”

正說着，突然包裹被搶了过去。

“誰問你这些，拿过来！”

簡直是怪事！几百个人，什么坏事也沒做过就被逮走！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事，真是令人恐怖……人們被推着肩头，被白色的棍棒杵着，走出地道的出口，深夜的朦朧的灯光照着砂礫的广场，从黑暗的电车道那边，好几輛大卡車开了过来，把人們和各样的喊叫声一起，裝进車里，又开到黑暗里去了。

“不要哭……”

春江被塞进一輛大卡車里以后，努力地抵抗着恐怖，她的手就沒有离开过弟弟的肩膀。大卡車的馬达不断地喘息着，車身抖动着。在激烈的喊叫声中，人們一个一个的被抛进車里来。身后是黑暗的，那里有一道石牆，可以看見石牆上边是上野的群山。究竟，自己遭遇了什么事情呢？她抱着正在啼哭的弟弟的头，只是瞪大着眼睛，不料有人从卡車上跳了下去。听见了叫喊声。接着，两个三个的跳了下去。在春江旁边的一个青年，突然縱身向下一跳，正靠着車子立板站着的春江，被他这一撞，身子就騰空摔下来了。不知是什么尖利的东西，猛烈地扎在肚子上，到她感觉到疼痛的时

候，她的身体正横倒在石牆脚下的黑暗的地方。

她没有叫出来。在大卡车旁开始了一场格斗，过一会儿，又把跳下来的人扔到车里载走了。大卡车往电车道那边驶去的时候，春江一边心里叫着弟弟的名字，一边在石牆的黑影里，好容易歪着身子坐了起来……

3

外边，不时传来歌声。天黑以后，起风了。交涉委员们所在的二楼会客室里，挤满了人。椅子不够，春江就站在后边窗台那儿。从窗子看见做完活儿要家去的人们，站在有稀疏的树丛和石柵欄的事务室前边的道上，对上边助威呐喊。

“女兵，好好干一下子！”

春江从窗子探出头去，鏟盤工段的工人们就叫嚷起来了。那个每天由八王子来做工的“田島上等兵”，揮舞着飯盒子，惹得大家在笑着。

“——干呵，有我呢！”

直到現在，屋子里还很平靜。窗外的助威的声音也停了下来，天色已晚的时候，屋内空气就渐渐变了，开始紧张起来。每隔三十几分鐘就有为了报告交涉经过情况的連絡員，从二楼上往工会办公室跑一趟。这时，忽然在窗下出现了七八个人影。一群人去了，又来了一群。黑暗里响起了“五一歌”和“国际歌”的歌声。还有人喊着：“打开窗子！”

有时，在歌声和喊声里混杂着婴儿的哭声，大概是家属住宅里的家属们也来了。公司方面的人虽然叫关上窗子，但是没有用；春江忍耐着寒冷，站在大开着的窗子前边。时而被风吹得远去了的各种叫声，突然又被吹回，由窗子飞了进来。好象在说：你们听听这声音！在黑暗里，看得见黑黝黝的水泥围墙。从远远的田野和树林那边，吹来了呼呼响的大风。

“好厉害的威吓！”大桌子对面坐着的一排人当中，穿着褐色西装，系着一条美国派头的红色漂亮领带的公司监察人，笑嘻嘻地说。

“威吓人的，倒是你们！”立刻，站在后边的人们里，有人反击他。

红领带用鼻子“嗯”一声应付了一下，把眼睛望到天花板上，又阴险地沉默下来了。……

使空气发生变化的，是在交涉中途，公司方面反而突然提出了一个解雇十分之二人员的提案。从午后两点就开始了的交涉，一点进展也没有。说是工会方面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可以讨论一下，故意地磨蹭了两个钟头，却突然提出了解雇方案。当然，解雇方案不是在两个钟头里能做得出来的，这是很明显的。虽然春江不懂他们为什么一面窥伺着工会的动静，一面把这个方案埋伏到现在，不过她可以想到，这和最近几天里公司方面阵容的变化，一定是有关系的。

“诸位的要求，等我们和经理商量以后，一定要加以考虑。愿意尽量满足诸位的要求。”

工会人員們今天头一次見着的那个紅領帶这样說。那个在胸前衣袋里露出了一块白手帕，打扮得无懈可击的年輕紳士，这就是經理在介紹时所說的監察人，他也是显出同样的臉色，用同样的語調繼續道：

“——同时，也希望諸位接受公司的要求。关于詳情，等一会儿經理还有話講。希望諸位能够承認在公司經營上必要程度的調整人員的方案！”

这一瞬間，春江感觉到身体仿佛是一下子沉了下去似的。风声和人声也听不見了，覺得眼前一片白。等到一切声音又回到耳朵里来的时候，她一直用眼盯着那个挺着身子坐在椅子上的紳士，他要动手切断几百个人的生路，可是臉上連一根汗毛都不动一动，这人的臉实在是不可思議的。

“你是开玩笑吧？”

正对面坐着的、替代有病的工会主席来开会的石野說。坐在一旁的人們，好象是加强他這句話的效果似的突然笑了起来。

“請吧，經理……”

紅領帶向着身旁的椅子，点了一点头，又轉过臉来，臉上現出一种可怕的強橫的神气，对于石野的話和大家的笑声，完全沒有放在他眼里。好象是被身边的工务課長攙了起来的經理，眼睛不时向下望着，用低低的声音，講起必須实行解雇的理由：

“——我实在也覺得很为难，在战前，我的公司就是主

張‘大家族主义’的，諸位和在这儿的馬場君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經理的头上有些稀少的白发，臉上肥肥的肉无力的抖动着。說了一些完全无用的廢話以后，他那穿着黑西服的身体，好不容易才坐回椅子上的时候，春江感觉到：經理似乎要放弃經營了！去年因为要求年終獎金，这位經理到处窜来窜去地逃避着。过不了年的职工代表們，终于在澀谷他小老婆所經營的一家妓院里捉住了他。春江还记得，那时，他在床上，用顫抖的手，一边往代表們递过去的文件上盖图章，一边囁嚅着說：

“噯，你們也替我想想我的处境！”

他一边接过身旁一个象艺妓似的女人递过来的茶杯，一边恳切地訴說着沒有大銀行做后盾的中等資本家的苦处：

“我呀，对你們共产党所主張的：也要貸款給中小資本家这一点，是很有同感的！如果照这样下去，我自己只好完蛋啦，噯……”

在那以后，工会就加强了“生产对策部”的工作，采取与資本家共同克服亏损、向政府要求金融貸款的方針。可是，这位經理，在最后关头却拿不定主意了。现在，大概是已經被什么地方的金融資本牽制住了，眼前这位在最前綫上出面办交涉的新監察人，一定就是那金融資本的代理人。大概是已經与“复兴金融金庫”这类組織商量妥当，以解雇作为貸款的条件，这个家伙大概就是專門来設法裁員的！

“人員調整案是人員調整案，請当做另外一个問題去談。對這個問題如何回答是我們的自由，正象公司提出這個問題也是自由的一樣。不過，在這裡……”

和石野并坐着的兩三個交涉委員，輪流地努力交涉着。

“那麼，對於諸位的增加工資問題，公司方面如何回答，也是公司的自由嘍！”

這已經是很明顯的爭吵了。在春江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大家盯着那個穿着肩膀墊得寬寬的褐色西裝的人，憤怒地叫道：“卑鄙！卑鄙的手段！”“要幹的話，你就試試看！”“滾開！這種東西！”

“哼。”

於是，他照例用鼻子來回敬一下。可是沒想到他竟穩不住神了，舉着烟斗的右手，一下子伸到桌子上來。毫無禮貌地從他垂下來的肩頭上邊，用尖房的眼光，掃視着大家的臉。春江想：“你要怎樣？”可是紅領帶很快就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方才的動作，大概是被大家的憤怒的叫聲激動起來，無意識中做出的。

“要幹，就試試看么？哼！”

這個外國風度的年輕紳士微笑着，慢慢地把烟斗放到口里。這會兒，只聽見窗外的風聲，屋裡好象停住了呼吸。春江的臉發熱，逐漸感到身子似乎輕飄起來。那種眼光，那種臉上的神情，春江是記得的。在上野的地下鐵道的隧道里，戴着口罩兩手插在衣袋里的穿西服的男子，高個子的藍眼珠的

人，就是这样的神情。——耳边，风呼呼的响着，只有灰土和石块的烧毁了了的废墟，挂着草席子的疏散地的小屋子，这些都忽然浮现在眼前，忽然又远去了。有一种好象赤裸着站在颯颯吹着的大风里的感觉。——好吧，拚个你死我活！——春江觉得身子轻轻的，心里非常激动，想要唱出来。

交涉完全决裂了。

人民的旗，红色的旗！

——脚步声嗒嗒响着，从楼梯下来，往大门口走去的人群里，有谁唱起来了。本来大家以为解雇的方案是临时玩弄的花招儿，这样一来，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把兀立在黑暗中的几幢工厂建筑物，从燃烧弹和炸弹之下保存下来的，是我们这些人！在劳资协议会上，主张积极设法克服亏损的，也是我们这些人！公司却不喜欢职工们这样做。他们害怕职工们象主人翁一样热心地经营工厂。他们在准备着解雇工人。生产停顿和民族灭亡，他们是不管的，只要保住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好。

有将近一百个人，在工会办公室里，一边往炉子里塞着木块，一边等着交涉委员们回来。也有穿着棉袄背着孩子的职工，也有在背兜里背着婴孩的家属宿舍里来的女人们，也有在火炉的光亮照不到的屋角里，把下巴埋到带筒袖的大棉袄领子下面，屏着呼吸听着联络委员们的非正式报告的老太婆。如果这些人在这时节，被赶出工厂或家属宿舍

的話，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工會工作人員們，全來集合！”

石野叫着。即使干上一整夜也行，得想出緊急對策來。為了去招呼那些沒有參加交涉的、住在附近的工會工作人員們，有人跑了出去。這中間，在火爐旁邊，召開了黨的支部會議。不擔任工會工作的黨員們，也有很多沒有回家去。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石油箱上，三十幾個人圍了一大圈。支部會議時常在有很多人的地方召集，或者在休息時間里召集，職工們已經習慣了。支部負責人之一，在車間做事務工作的一個青年，低著頭，用鉛筆在土地上划著，不時抬起頭來看看大家的臉，一邊說：這次的鬥爭，關係重大，不能僅靠工人自己，還要和這個鎮里的商人、農民們聯合起來，才能取得勝利。而且這種聯合是有可能性的。——在工會里當文書，終年刻著蠟紙版的這個大學畢業的青年，細長的身子上穿著黑西服，上邊只套了一件黃色的工作服。春江背著火爐站著。在后邊旁聽的馬場老头子，叨著烟袋，不止一次把臉靠近了春江說：

“怎么回事？女兵，你臉上倒挺高興？”

雖然聲音很低，可是身旁的人們聽見了，都忍不住笑起來。

“是呵，當然高興，還要接著干呢！”

沒有外套的春江，用手抱著發繃了的工作服的两肩，搖擺著身子。簡短的發言，一個一個的繼續著。有的人把兩手放在左右同志的肩上，把臉伏在上邊，有的人熱心地注視

着发言者的脸。这很象是在橄榄球或棒球比赛之前举行的准备会，但这是更加严肃的血与血的交流，站在后边旁听的那些人也包含在内，默默站着的春江也在内，共同的血液，从每一个人身上通过。春江看着那些不安地坐在暗处，还没有回去的背着婴孩的女人们的脸，那些忍着困倦扯着父亲衣服的孩子们的脸，她想大声叫出来：——没关系，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决不会失败！……接着是石野发言，他说这是个重大的斗争，党支部必须站在最前列，要有献身于这个斗争的自觉。说了这些之后，大家众口一声的叫着“同意”。

“同意！”

大家的喊声刚停止，春江突然用想不到的高声叫了一声，并且举起了手。后面站着的人们一齐笑了。春江好象吃了一惊似的，红着脸一下子转过身去，她心里充满了一种轻快、奋发的情绪。这是一种不怕丧失任何东西的情绪。这是一种在风里闪闪燃烧起来的火焰似的情绪。一种同志与同志间的温暖的连结。这种火焰在朝鲜、印度、越南、法国、保加利亚……在全世界燃烧着，连结着……

“三木，三木……”

春江正在出神地望着炉中的火焰的时候，有人在她的肩膀上敲了一下。朝那人手指着的方向一看，西岡从外边把鼻子贴在窗子的玻璃上，正向她招着手。

“保雄那孩子……”

走到门外黑地里，西岡急忙跑了过来说。因为风大，她

沒有听清楚下边的話。

“什么？保雄？”

“沒回来呀。到哪儿去了呢？你看已經九点啦！”

春江在前边跑，西岡在后面追着說：

“千代的……不見了！”

她这么說着，可是她的話沒有听进春江耳朵里去。因为今天要去交涉，午飯的时候她特意跑回宿舍一趟，連晚上的面包都做了出来給他預备好了，到哪儿去了呢？有什么地方可去呢？保雄过去的三年情形，这时一齐涌进她的腦子里。进了宿舍的門廊，赶快打开了放木屐的箱子一看，給他新买的一双帆布鞋，已經不見了。她飞似的上了楼梯，在門口碰上了大井千代，进了屋子打开了壁櫥，发现从家里出来时帶來的保雄的包袱也沒有了，春江的竹箱也大开着。春江象木头一样站在屋子当中，臉色发白了。

“你回来的时候，就沒看見他？”

西岡搖着头，說了一句什么，春江也不知是听見了沒有；她的两眼是空虛失神的。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臉上充滿了怒气。

“你的东西，有沒有丢掉？”

她走近默默地站在屋角上有点无精打采的大井千代身边，就好象是审問似的，用严厉的声音說：

“快照实告訴我！”

“手表沒有了。”

千代低着头說。手表是三个人屋里最貴重的东西。春

江又走到站在門口的西岡跟前。西岡吞吞吐吐地說，存摺和毛巾沒有了。同時又象是維護自己的朋友似的說：不過是很有限的一點郵局存款，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春江簡直就沒有聽在耳里。

“噯，算啦，那麼一點東西，我們稍微忍耐一點兒就行了！”

春江正在往一張紙上一件一件寫着遺失的物品，她們想按住她的手，她堅決地說：

“他偷了人家東西，就得報告！”

春江急忙走下樓去。西岡和千代追着她拉住她的肩膀，她生氣地甩開她們的手，來到走廊盡頭，走進宿舍管理人的屋子。一会儿，管理人的妻子从那屋子里出來找石野去了。過了十分鐘，春江才出來。她從等在走廊上的兩人身邊跑了過去，上了樓，進了屋子，隨手關上了拉門，一屁股坐下來。

她睜着大眼睛，盯着牆角。這分明是毫無希望的了。到哪儿去了呢？弟弟所去的道路，和姐姐所想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樣的。弟弟所走的道路是只有警察才知道的道路。只在姐姐身旁呆了七天的弟弟，那用發光的眼睛，看着盛面的大碗，貪饞地吃着的孩子，那在夜里睡夢中叫着“媽媽”的孩子，倒是為了什麼，想到什麼地方去呢？在梆子似的腦袋里，老鼠一樣的驚恐的日光里，藏着另外一種可怕的東西，就是當他說“那個姪兒，長得不錯”時，藏着另外一種神氣。那是從上野的地下鐵道趕了出來，被載上火卡車以前，所不曾有過的東西。就是這種東西，把她的弟弟，把她唯一的親

人，从她手里夺去了。把下颏紧紧贴在胸口上，咬着嘴唇的春江的发青的脸，擦了几次。她象要把席子抱住似的伏倒了身子。

“怎么啦？”

石野匆忙地跑上楼来，在屋门口那儿，看了看那束手无策茫然站着的千代和西岡，就走到压低声音在呜咽的春江的后边，她的脊背象波浪一般起伏着。

“只要提出了偵察請求書，馬上就会找到的，三木……”

这个农村出身的有点粗率的青年，毫无办法的說着。說完之后就直直地站在那里。可是，春江怎么也不肯抬起头来。她已經不哭了，虽然千代和西岡湊近她身边撫着她的背，安慰着她，但是她并没有听见她們的話。春江只在想着：自己的力量和境遇是不能够把弟弟留在自己身边的，在疏散地区的母亲也没有这种力量，弟弟好象被波浪冲洗着的水草一样。就算提出了偵查請求書，使他又回到这个穷困的宿舍里来，可又有什么用呢？把弟弟夺了去的，不正是那从上野地下鐵道里用棍棒和手枪把人赶出来的那种势力么！不正是那个讓他在墓場对面的田里干活儿的穿黄袈裟的和尙么！不正是从高高的台上恐吓着“再做坏事，就把你关进大人的监牢去”的那个官員么！

“三木，安静一点！我用工会的名义請求他們給你找！”

石野这話不知說了多少遍。春江抬起臉来，站起身，面对牆，沉默着。心想，就算提出了偵查請求書，把弟弟脖子上系了一根繩子牵回来，这也是毫无用处的。她不时地

抽着鼻涕。一直在盯着牆壁，就仿佛那上边写着什么字似的。尽管在一旁的千代和西岡在安慰着她，她还是一声不响。

“春江！”

不知是第几次了，西岡又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的渐渐柔软下来的肩膀，垂了下去。忽然，她转过臉来，不大好意思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很强大的吧？是么？”

在她的红肿的眼里，闪着湿润的光辉。一种在她是很少有的、充满了情爱的微笑，浮在她的臉上了。

“朝鮮的同志們，也都在忍受着比我們更厉害的痛苦呢！——走吧！”

她把弄得乱七八糟的壁橱等很快地收拾了一下，把手伸在旧軍裝的口袋里，走了出去。可是，又走了进来，望着西岡和千代，用天真的、孩子似的聲音說：

“我呀，这回真正是独自一个人啦……”

說着就低下了头，用穿着有洞的袜子的脚尖，在廊下的地板上擦着，象在写什么字似的。这是象一个被叱責了的孩子似的純朴的悲哀。在西岡和千代什么話也沒說出来的当儿，她忽然仰起臉，笑了。

“可是，我一点也不会寂寞的！”

她把手一揚，好象在說：“我要出去一下，”于是便从那无精打采站在那儿等着她的石野身边跑了过去，很快地下楼去了。

槌子头

1

杉山民治，是私营电车公司的司机。伙伴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莫洛托夫”。这当然不是说他象苏联的莫洛托夫，而是因为他长了一个前后都突出的槌子般脑袋。伙伴们并不知道，日本话的“槌子”就是俄国话的“莫洛托”。在T·K电车公司的共产党支部里，有人这样叫起来以后，支部以外的伙伴们也就这样跟着叫开了。

民治的脸总是很严肃的。在突出的前额下边，在总是紧紧皱着的眼眉底下，民治的眼睛里，有一种十分认真的神情。他总是把下巴颏紧紧贴在脖子上，好象如果不这样，他那瘦小的身体就会支撑不住他的脑袋似的。现在，他正趴在床上，把下巴搁在枕头上支起头来，望着那低矮的屋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他在写宣传品的底稿。失业的哥哥丰一，在这全家唯一的一间卧室的角落里，把收音机弄得嘎嘎直响，打断他的“文思”。民治非常困倦。昨天夜里是他值班，把零点三十分往返于新宿和S车站之间的车辆，开进车库旁的停车

綫上以后，在值班室睡了不到三个鐘头，今天早晨四时三十五分又把第一班車，由新宿开到調布多摩川去，到家睡了不到一个鐘头，就被哥哥的收音机吵醒了。

屋檐之外，低垂着阴雨的天空，在一片燒毀了的廢墟上，到处是散乱的殘磚碎瓦和生着紅鏽的鉄屑堆。剛割了一半的麦子，伏在雨里。不整齐的小板房凹凸凹凸地排列着，在它的对面，隱約可以看見新宿附近的煤气庫。

——諸位乘客，我們两千五百名 T·K 电車公司的职工，为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从去年十二月起、半年来不断地与公司交涉。現在，我們的平均工資，不过七千三百元，还要扣除所得稅。我們在緊張的劳动中，每天精疲力竭，这点錢用来吃稀飯也不够，又怎能恢复体力，繼續工作呢！——在枕边的紙片上，他用鉛笔正写到这里。

由党支部发起，工会青年部的每个人，都要在一两天以內写出一份底稿来，要在站內或車站附近張貼出十張以上的向乘客呼吁的傳單。公司是有錢的，最近他們把宣傳品夾在報紙里，散发到 T·K 电車路沿綫五十公里左近的乘客地帶去。而工会呢，斗争經費很有限，而且工会內部“民主化同盟派”^①的势力还很大，所以只能在車站里头貼出了一两种印刷的招貼画。

民治皺着眉头，臉上越发严肃起来了。青年部拟定的向乘客呼吁的提綱很多，比如要向乘客宣傳：公司对于工会

^① “民主化同盟派”，是在 1949 年同由“日本产业工会联合会”分裂出来的一个工賊組織。

方面提出来的工资标准增加八百元的要求，竟以延长工时一小时为交换条件，这实际就等于降低工资。还要向乘客揭露公司所谓的“公共事业”是怎么一回事儿。还有……等等。要宣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想用三百字把一切都写出来，这可太难了。

只能就其中的一个问题来写，他决定这么办。实际上，仅他本人要向社会控诉的就太多了，所以思路很乱。还是个光棍儿，今年实足年龄是二十一岁又五个月。司机。从做站务员时算起工龄四年。每月工资里就要扣除所得税百分之十七，另外，还要扣什么失业保险费、健康保险费、互助费、更生资金、工会会费等等，每月拿到手的不过四千块钱。……脑袋上，收音机还在吱吱地响着：

……第一，本週选中彩者应得一百九十八元。第二，九五选手……

回头往床脚上一看，丰一正把收音机搬到第二电台上，那儿正在播送昨天川崎赛车也许是大宫赛车的输赢情况。丰一两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地低头坐在茶几旁边。脸的下半部被火烧伤的疤痕发着亮。下巴已经烧得没有了，嘴歪扭着。他是在战争中被送到缅甸，并在那儿做了俘虏的。当他被从堡垒里驱赶出来时，火焰放射器烧坏了他的脸。他原来是个制图工，被驱进战争之前有很安定的职业。可是，在变成了这样的一张脸之后，一种悲观绝望的心情，使他情不自禁地常常跟人吵架。近来，却是完全陷进赌博里去了。

“喂，借我一百块钱！”

也许是赌赛车赌输了吧，哥哥满脸不高兴，翻着眼睛对民治说。民治没理他，又把视线回到纸片上来，同时防范着哥哥。——所谓“公共事业”究竟是什么东西？从今年春天起，在东京近郊的私营电车公司开始了劳资斗争以来，所有报纸都抬出了“公共事业”这一面盾牌，来责备职工的斗争行为。在读者来信栏里，也只是登着来自乘客间的同样见解的来信。可是，报上一次也没提过公司当局分给每个股东一成五红利的事；也没提过公司和东京的劳委会勾结一起，打算强制施行延长一小时工时的事。——民治这样想着……

“喂，民治！”

说着，那穿着瘦小的军裤的双脚已经来到枕头边上了。——不错，我们是“市民之足”。在社会道德上，是有共同的责任的。那么，乘客们对于这些营养不良的“市民之足”，不是也应该感到有同样的道德和责任么……

“不行！”

民治跳了起来，按住了那支从挂在板墙上的制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的手。当然，这没用，他从小就没有打败过哥哥一次。不由分说，民治被推了个跟头，钱包也给抢走了。

“你要干什么！丰一！”从雨中的麦地里，传来了母亲的尖锐的声音，“民治，快追他，要回来！给那种东西钱……”

丰一倒是怕母亲。他从弟弟钱包里，抽出五六张十元一张的钞票，披上军大衣，从后门拍啷拍啷地踏着泥水逃跑

了。民治把空了的錢包放在膝盖上，眯縫着眼睛，看着雨，深思起来。——使得自己的錢包空了的，果然只是哥哥一个人的过錯么？他却思索起这个来了。

“噲，別洩气！再去一趟試試，好不好？”

在离这儿有五十几公尺远的麦地里，母亲举着傘和筐，仰着小小的用木梳别起头发的腦袋，站在雨地里，和附近裁縫鋪里的女掌櫃大声說着話。剛才她們是一路到稅務署去过的。那在傘底下，把一只手放在背后孩子身上，一直垂头站着的女人，終于迈开步走了。母亲不顧一切地高声嚷着，走到家門口来：

“这算是什么玩艺儿！稅務署里当差的，真够厉害！可惹上我的肝火来了，我跟他說啦：你要沒收就沒收！你願意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你的便！”

把掖在腰上的前襟放下来，个子又小又胖的母亲，拿着盛东西的筐子，一屁股坐在儿子枕头旁边。

“可不是嘛，叫人家等了两个鐘头。結果只談了五分鐘——老太婆你干啥呀？哼儿哈的！他別着臉，看都不看你，人家說什么，他簡直听也不听！”

她在那稅差跟前，当然不会是象現在这样神气，她額上冒着汗珠，說着說着，漸漸臉上有些激动起来了。她这二儿子，却在用比稅差还严肃的臉听着。

“那么，难道他們不承認哥哥是失业的？我計算出来的数字，他們怎么說？”

民治从鼓鼓的牛皮紙信封里取出紙張来，打开看着。不

大認得字的母亲，有点发慌的揩着額上的汗。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算是因为打了败仗，这税也太太
啦！我活了五十多年，象这样要命的税，还没见过也没听
过。”

在这張詳細的記載着(去年一年干了沒有三个月活)丰
一應繳的那份所得稅的紙片角上，不知为什么他們用紅鉛
笔給画上了記号。当司机的民治，当印刷工人的弟弟，当銀
行杂役的妹妹，三个人合起来，一年的收入共計是二十万
元，基本稅額是一万二千八百元，加上額外追征、就是一万
五千元，此外再加上每月由工資里扣除的所得稅，这真是令
人受不了的苛稅……

“真是些惡鬼毒蛇似的東西，我說，我一个月繳五百块
錢的稅，那就是到了家的数目啦！你猜那个小胡子家伙說
啥？”母亲好象忽然記起来了似的，高声說：“——就算是一
个月五百元，过一年不是也繳不上了嗎？从公司里預支出
来繳上好啦！……說的倒好，如今連每月該发的工資都不能
按时发，还会有先借錢納稅的公司！”

她拿起旁边放着的油紙扇子，敲打着儿子的枕头，簡
直不知道这所謂的一年二十万元的收入，是什么时候拿到
家里来的。加上还在新制中学念書的最小的儿子，全家一
共六口人。二儿子連給人家替工掙的在內每个月能拿回家
五千元。三儿子三千五百元，女儿是两千五百元或者两千
元。这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母亲拿到手的最多的錢数了。
就算还有一点罕有的獎金什么的，儿子修修皮鞋，女儿做件

衣服，买些早就該买的東西，要花的錢可多啦。这一万块钱的收入怎样才能对付一个月呢？去年，每人一頓晚飯的菜錢是五元到八元的樣子，有这么一个譜儿，好好算計算計，还可以湊合着过日子。可是，最近，一天得跑到小市場上的魚店、青菜鋪子門前轉三趟，象狗似的搜尋着能够买得起的食物。

“这回，我去一下！”民治說。母亲縮回脖子說：“好好，那你去罢。”这儿子成了共产党什么的以后，就常常說一些母亲想不到的話，使老太婆大为驚訝。这孩子說起話来有条不紊，有时說得非常对。大概因为从小总是讓他側着身子睡的原故，儿子長了这么一个槌子似的腦袋。在战时，丈夫死了以后，母亲就是依靠着这个二儿子过日子的。

“裁縫鋪的事，怎么样了？”

“呵，对啦……”

母亲又拿起油紙扇子来。麦田那边的裁縫鋪應該繳五万块钱的重稅。說是因为没有申請过，所以也沒有除去被扶养家属的那份稅。从前是在四谷开西服店的，空襲时，鋪子被炸毀了，所以才在这儿搭了一个小木板屋子对付着过活。有肺病的丈夫，五个小孩子，丈夫从春天起就躺在床上。

“讓他們查封去好啦，不是沒有什么可沒收去的東西么！”

“糊涂！还有两架縫紉机哪！”

“那不要紧，縫紉机是营业用的，那是不能沒收的！”

母亲張着嘴，眨着眼睛。这孩子倒是說得滿有把握，可是能有这么方便的事嗎？一想起稅務署那个官儿的神气，她实在不敢相信儿子的話。

“那么，要是你那么說……”

她還沒說完，就抬起身来，望着雨窗窗口。在麦田的那一边，出現了穿着黑色雨衣的、和民治在一組里的車務員大島。大島一边叫着边走近来了：

“喂，民治，下午还要上班！”

老太婆站起来“曖曖”地答应着。大島的住处离田代車站很近，車站一有電話他就來叫民治。

“这次行車是十三点五十分，往返于新宿烏山之間！”

“麻煩你啦！”

私營電車的乘務員，額外勞動很多。值宿乘務的第二天，按理應該休息到夜里，可是如果別組里有了病人，那就还得上班去。最近因为肺病請長假的人增多了，再加上公司又强行“定員制”，这种額外勞動，三天里就一定得有一次。額外勞動是有工資的，也就因为有些額外收入，所以每月才能对付着生活。但是請長期病假的人在繼續增加，自动辞职的人也有增加，新职工越来越多了。

“怎么办？来不及做飯裝飯盒子了，面包行不行？”

母亲在狹窄的厨房里忙着。民治翻开本子查着行車時間表。这次行車，全是近距离往返，得一直干到二十一点。他把写了一半的宣傳品底稿折起来，裝在襯衫口袋里。用刷子刷了一下制服。制服肩上已經晒褪了色，褲子膝盖上

已經補綻打補綻。他整齊地扣上鈕扣，坐到小飯桌前邊，由這裡望得見用燒過的鉛皮搭成屋頂的那些小板房子，現在那兒顯得熱鬧起來了。

“可別忘了帶胃散！”

老太婆把紅色的胃散藥盒放在飯桌上。他們十個人里有六個害了腸胃病，一次乘務和另一次乘務之間，最長的間隔不過二十分鐘，這二十分鐘實際上也就是十五分鐘。必得按照行車表的時間去吃飯，生活毫無規律；往往是一邊嚼着東西一邊被車子震動着，所以很容易鬧腸胃病。

2

司機和車務員兩個人為一組。大家都說司機等於家庭中的丈夫，而車務員等於主婦。不過，在杉山和大島這組，情況卻不同些。這是因為車務員比司機年紀大。大島雖然不是色盲，可是分不清綠色和黃色，這就使得他老得干車務員了。大島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現在第三個又快從老婆肚子裏出來。這人連組外的額外勞動都去干，是一個拚命干活掙錢的人。他也和其他的車務員們一樣，很瞧不起自己這個與眾不同的“丈夫”。

“民治要是跟女人接吻的時候，恐怕他這個腦門子很礙事吧？我真替他擔心！”

在華北呆了五年沒鬧過一次病的、農民出身的大島，噹地敲一下民治的肩頭說。大家都笑了起來。在開車以前，

这两个人和几个站务員，在站台上談論起“接吻”来了。这是因报纸上的新聞引起来的：为了“日美亲善”到美国去的“山口淑子”，想在美国学习一套接吻的方法，可是美国的男演員們，却不願意把她当做接吻对象，因此使她大大生气。由这件新聞又扯到“美式接吻”和“日本式接吻”，由“美式接吻”又扯到“露齿的接吻”和“腦門子上的接吻”……

“接吻，接吻这事儿……”民治連笑都不笑，搖着肩膀，皺着眉說：“唯独接吻这事儿，可不能去跟人家学呀！”

他这么一說，大家都張着嘴看他。他的槌子似的头微微偏在一边。大家都期待着一一直在生气的民治，大概会說出什么可笑的話来的。果然，他說：

“接吻，这是严肃的事情！”

一个拿扫帚的站务員，这时突然把穿着帆布鞋的两脚脚踵靠攏，以立正的姿勢，大声重复道：

“接吻，这是严肃的事情！”

大家哄然大笑了。

開車的鈴声已經响了，——他們的劳动越繁重越痛苦，他們越是喜欢談些不正經的話。民治整年都皺紧着眉头，他常常認真地說出很滑稽的話，所以反倒很有人緣儿。他在開車的时候，也是比誰都認真的。

“准备出发！”

走进駕駛台，把手按在制动器上，放出制动机的空气，仔細地擦着正面的玻璃。他們虽然在叫做“猴子座儿”的小椅上放了一个垫子，可是在到某一个一定地点以前，却是絕

对不能坐下去的。在乘务时，只有他总是把他的特号制帽的前遮拉到眉毛上来，而且连帽絛也規規矩矩地套到下頰上。

午后，雨住了。夏天的西晒太阳强烈地照耀着。行車的时候，車里挤得滿滿的，連駕駛台上都感到透不过气来。这辆車廂的車門开关是在駕駛台的下角上。包头釘不是在車棚上，是在車台的壓縮空气动力机的旁边，从来就沒有速度表，压力表的玻璃也早就坏了。T·K电車公司的車輛都是战前的陈旧的东西，而且又因为每輛車出厂年份不同，因此操縱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他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番。

“喂，喂，”靠在駕駛台圍欄上的一个老太婆，伸着脖子叫着：“明大前窩这儿儿站哪？”

“不要和司机談話”这几个字，一点用处也沒有。挂了三輛車，可是車务員只有一个。有一个乘客，好象是去碰一件髒东西似的，只用一个指头敲着司机的后背：

“喂喂，你們还在罢工嗎？嗯？”

这是一个穿白背心戴巴拿馬草帽、滿臉酒意的紳士。

“不知道。”

他梗着脖子回答道。“要用笑臉对待乘客”，这是公司的一条規章，可是民治簡直沒笑过。即或不是民治，別人在開車之前也是这种臉色。不管每天有多少次从这个站台開車，司机总是緊張的，——乘客多得几乎要从窗子挤出去，这站台又是新近开辟的起点站，站台非常窄；由这儿一出站就得在人来人往非常熱鬧的火街上走一公里……

“開車！”

在窗子那儿，副站长一举起手来，就听见了很有威势的大岛的笛声。民治比任何司机的声音都大的喊了一声，把手把插在駕駛器上。这喊着“开车”的声音，叫做“自己确認”，不是給任何別人听的。有的司机象蚊子叫的哼哼一声就算了，也有的司机回过身去象要叱罵乘客似的大叫。

“注意站內！”

他感觉到裝滿了人的車廂非常沉重。虽然車子是用电力开动的，但乘客的多或少，并不是和司机的劳动力毫无关系的。尽管轉动着手把，但陈旧的車廂却光是吱吱地叫着，不爱轉动。要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猛的来一下的話，发动机就会冒火。民治尽量向外放出压缩空气，把滿是汗水的手把慢慢地向右边轉动着。发动机激烈地响了起来，眶当一声，通过了道岔子。身体向前傾着，汗珠拍答拍答地落在手背上。

嗚——嗚，嗚——。在大街上的綫路間，他不断的嗚着笛。这一長声，一短声，再一長声的警戒笛声，是美国占领軍进駐以后，按照美国方式改变的。如果在大街的綫路上发生了事故，处罰是比較重的，因而司机們的神經過分緊張。

“速度不得超过二十公里！”

通过了大街上的綫路以后，又是这五十公里綫路中最难走的地方，——与那条参拜庙宇專用道路平行的綫路上，大約有五公尺寬的土佛川，或在或右的夾纏在綫路上，而且又是很大的弯道。据司机們說：这段象一条在河里游泳的

蛇似的綫路，是当初公司只貪圖這一帶地價便宜才鋪設下來的。在這一段路上，只要你稍一慌亂，車輛就會出軌的。

“呵！”突然，民治在心里叫起來了。把駕駛器嘎嘎的向相反方向回轉，手緊張地握着制動器的手柄。冷汗順着脊背流着。二十多公尺的前邊，從右手人家的房後，飛出了一個皮球，滾到綫路旁邊的泥里去了。一個光頭的男孩子，忽然出現在土堤上。他緊張的握住手柄，要在這一瞬間決定是不是要緊急剎車。看見了這個不在意地站在路堤上的禿小子，什麼樣的司機也忍不住要從窗口罵一聲：“混蛋！”

就是一隻小猫跑到綫路上來，司機也要渾身起雞皮疙瘩的。他們用一年檢查過兩次視力和色盲的眼睛，把神經集中到綫路兩側。他們知道：哪里的人家離開綫路有幾公尺遠，哪里的土堤有幾公尺高；如果不是來自殺的，得在幾公尺以外剎車才來得及；哪兒是下坡，如果不在幾十公尺以外剎車就會來不及，等等，全綫所有地形，他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知道越清楚，也就越害怕。

“明大前，明大前到啦，往井之頭那邊去的，請在這兒換車！”

在上下車擁擠時，司機必得回過身來代替車務員朝車廂里這樣呼喊。

“喂，老太太，您不是在這兒下車嗎！”

過了烏山車站以後，乘客減少了一些，彎道也少了，可以喘口氣了，從褲袋里拉出表來一看，比規定時間晚了三分鐘。誤點是在上下車擁擠時常有的事，但在上下車的客人不

多的站上，規定的停車時間也是短的，所以要搶出這三分鐘來也不大容易。“開車！”民治一一緊握着手柄，儼然地叫着。在這種時候，他（大家也都是這樣）已經把工資太低、把在黑麵包上抹頂少的代用黃油的晚飯，……這些事完全忘記了。

“喂，民治！”

當車子開出調布車站的時候，大島轉到前邊的車廂來，腦袋伸進駕駛台的圍欄，說：

“現在董事們下車去了，看來交涉還是決裂啦！”

然後他嘿嘿笑了一聲，望望民治的側臉，就走開了。今天是公司當局給工會答復的最後一天。一向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公司的董事之類總是到支綫的多摩川終點站的公司宿舍里去聚會。只在這種時候，大島是帶着一半开玩笑的意味，才把杉山民治當“丈夫”看待的。這是因為他知道這個槌子腦袋，是個共產黨員。这个大島既不是“民同派”，又不是共產黨，對於工資过低也從來不說什麼，但在這次延長一小時工時的問題上，竟也感到受不了啦。

“決裂了，決裂了！”

工會利用了車站電話，消息比電車傳的還快。到了一個叫車返的小站，下去兩三個乘客之後，一個站在剪票口上穿着開襟襯衫的女孩子，舉了一把剪子，揮著手臂，越過綫路跑到站台上來，從窗口扯住了民治的袖子：

“民治，堅決干下去！”

在東府中車站，已經貼出公告說：“因為交涉決裂了，扶

行委员会决定后天召集临时职工大会。”

虽然被扯住袖子，被注视着，可是民治决不回过头看一看。仍用一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向前开车。眉头越发皱得紧紧的。那注视着他的侧脸，扯着他的袖口的人，对于他的认真严肃的神情是感到了一种满足的。而民治也觉得自己责任更重了。

“喂，民治，你的稿子写出来了嗎？”

到了府中站，立刻就要往回开。刚把车开进上行线的站台上，扛着铁锹的养路工，——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样是工会青年部工作人员的武田，走进车里来。民治急忙用喷壶洒着水，大岛在扫地。T·K电车公司是沒有车内扫除工的，必须乘务员自己去干。这时，绿旗从信号所的小屋伸出来了。

“喂，给我看一下！”武田说。

车开出站的时候，民治一只手握住手柄，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拿出底稿给他看。养路工一边看着，一边把脖子上围着毛巾的脑袋，从围栏伸过来说：

“暂时给我吧，反正下车以前你不能写了。”

车开到樱上水站，养路工就拿了底稿下车去了。把这最后一趟往多摩川去的车开到了樱上水，民治就要把当做交代标志的手把，交给下一班的司机。到了事务室以后，那个已经根据别人的稿子写好了十几张传单的养路工，又对他說：

“一块去吧，现在就去贴传单，反正也是你回去的路线。”

民治下巴貼住脖子，想着：这么一来他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就得往后推了。可是，他的疲倦了的、有点哀伤的眼睛紧皱着，說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話：

“走吧！我是个共产党员呵！”

当然这话不是因为心里对这个养路工不满而說的。这是对他自己說的。就在这天晚上去貼傳單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件最倒霉的事情。最近在澀谷和新宿一帶的偏僻地方，出現了一种流氓青年的組織，他們对于工人运动特別仇視。他就偶然的遇上了这些人。

起初，他們乘井之头支綫的車，往站台的牆上和站內广告板上去貼傳單的时候，还没有遇見什么事。可是，在澀谷的前一站下来以后，武田要在隧道頂上的水泥牆壁上貼傳單，这儿虽然也是站內，可是比綫路上的道路高，很惹人注目。民治提着漿糊桶，跟在几乎比自己的身材高大一倍的武田身后，爬上了土堤。

“这回，你貼？”

民治把涂好漿糊的傳單用两手撑开举了过来的时候，武田这样說。

“嗯，好的！”

結果这次还是民治当“馬”。在土堤的草地上，手脚着地，斜着上半身，努力支撑着站在自己身上貼傳單的同伴的身体的重量。这时，在背后的黑暗的道路上，有五六个人的脚步声，向这边走来。

“你們是共产党？”

脚步声一停下，就听见了这样的问话。但站在背上的弄路上却决不示弱：

“要揭，你就揭揭看！”

“什么？”

“这儿是车站！”

武田从民治背上跳了下来，可是不知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就一边叫：“民治，快走！”一边往线路那边滚了下去。不知是没有跑，还是没跑得了，民治一个人，提着浆糊桶，被包围住了。在黑暗里，看不清人们的脸。最前边的一个，披着浴衣。从他那一步一步缓缓地向前逼近、两肩下垂的姿势上看来，知道这是个练过“柔道”的家伙。这些人好象觉得对方只一个人不是敌手，还有人在后边笑着。

“你们是哪里来的？把你们的住址姓名告诉我！”

不料民治却强硬地说：

“诸君，要是你们把这个揭去的话，那就是违反远东委员会的十六项原则。违反了第三条和第十三条……”

笑声似乎停住了一会儿。那个正要伸手抓住民治衣襟的穿浴衣的家伙，好象也迟疑了一下。

接着民治却强硬地脱口说出一句话来：“你们这些法西斯……”

民治话没说完，那个穿浴衣的家伙好象忽然理会到了什么似的，猛的扑过来，民治就被那家伙从肩上搯到土堤上了。刚一站起来，又被搯到地上。不知这样连搯了几次，他就和浆糊桶一起，滚落到堤下去了。

3

从面部上看，他好象是在不断思索着什么，但偶然一开口，就会說出不近情理的話来。所以他的面貌越严肃，伙伴們越觉得滑稽。貼傳單的第二天，他在腰上貼了一貼膏药，一瘸一拐地从駕駛台上跑上跑下，可是很少有人問他是怎么弄癩的。

他还是比外表上看来更安然。公司拒絕了工人的要求以后，工会召集了临时职工大会，以八十几票对三十几票，决定了坚决举行罢工，全綫都充滿了一种緊張气氛。“民同派”的中心势力是反对罢工的，可是在“民同派”方面也有半数以上是贊成罢工的，这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延長了一小时劳动時間而使他們受不了。职工中間流傳着各种謠言：有的說少数共产党煽惑了中立派和別的一些人們，企图夺取工会的領導权；也有的說，在罢工那天，也許“民同派”中有势力人物会出来破坏罢工。……对于交通工人，即使是开大会，因为业务关系，也不可能把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但是却可以利用車站电话和不断行駛的电車，很快地把情况傳播到全綫去。民治是青年部工作人員，又是支部的一个党员，他按照着他自己那样的方式兴奋着，活动着。当然不管他是在怎样的活动，他所尽的力量，也不过是处在最下层的他所能尽的那份力量。但是，在他的兴奋里却蘊藏着一种坚定不移的东西。

“到底这个‘民同派’是个什么东西？”

他总是对于“原则的”东西感兴趣。就象是说紫色是红色和蓝色的化合，并不是原色一样，他只是对这种说法有兴趣。“民同派”是什么？如果“民同派”是思想落后的劳苦群众，被内外帝国主义组织起来的一种东西，那么，要是说“民同派”的势力很大，岂不是等于说共产党的势力很弱么！——他就是这样思考的。

“民治，你不会去晚了么？”

被他领来的裁缝铺的那个女人，在一旁说。她想到他还得从这里去上班呢。

“——不要为了我，耽误你的时间，请你快回去吧！”

在税务署的传达室那儿等了两个钟头，民治倒意外的没有感到寂寞。这当儿，他读了十几页书。而且，税务署里的情景，很能引他去思索一些事情。他们好不容易才挨到一行座位的前边来了。究竟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们，在人类生活中是个负数呢还是一个正数？那些人，有的匆匆忙忙地取下电话耳机嚷叫着；有的把账簿从桌子上扔过去；有的哐哐地拉开椅子站起来，跑到课长那里，在耳朵边上嘀咕着什么……

“好一个直接税课长，正赶这时候他调走了！”一个似乎是土木建筑业的鼓着大肚子的男子，一边咂着嘴，一边抓着他那巴拿马草帽说，这声音似乎是从丹田里冲出来的。在行列的后边，一个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真是的，要是碰

上了一个坏家伙，那就没法讲理啦，嘿嘿。”納稅是怎么一回事呢？想着自己家里就是要了命也筹不出每月五百多元的稅，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了一句話：“超过繳納能力的稅金，已經不是稅金了。”

“就是沒收，这人家里也沒有值五万元的东西。”

輪到他們站在所得稅股股長前边的時候，民治讓裁縫鋪的女人坐在椅子上，他站在一旁这么說。年紀还輕的股長，搵着扇子，把他的紅領帶搵得飄动起来，当民治說話的時候，他把臉朝向另一边，并不看他。

“我是不是可以問一問你？”民治用奇怪的面色，望着股長的側臉說。“你看看这个人的样子，难道象是繳得起五万块钱的嗎？”

他以为这个紅領帶要发脾气了，可是他仍旧望着別处，并且大大打了一个呵欠。好象根本就沒有把这个穿着可怜的司机制服的小个子放在眼里，他把打开来的征稅用紙用扇子推过去，縮在椅子上說：

“——本人是自認有这么多稅額的收入的！承認了，那就是法律……喂，下一个！”

民治和那露出乳房給怀里的嬰兒喂奶的裁縫鋪女人，慢慢地走出了稅務署。他皺着眉头，專心地看着什么地方，說：

“还有請願的办法。向稅務長官請求一下！”

妇人低垂着她的散乱着头发的瘦瘦的臉，答应了一声，可是已經很灰心，似乎对于請願的办法并不相信。民治幫

她把小孩背到背上，說：

“我去替你問問怎樣填寫請願書！”

說完之後，他就走了。他照例氣哼哼地梗着脖子，他一點也沒有想到，當他對那個官員說了那樣的話，會有什麼結果。

“開車！”

因為是最末一班的長距離乘務，民治從新宿站台把往東八王子去的快車開出的時候，已經是十分疲勞了。不斷地注意着往前邊看，緊皺着眉頭，眼睛里很不舒服，全身難受，象忍受着肚子痛似的。

“嘿，民治！”

突然從身後伸過一隻手來，往他的嘴里塞着糖塊兒。大概是從新宿看完電影回來的，歌班在同一電車段的同事。他們常常來這麼一手“愛情的表現”。民治不能撒開握着手把的手，只把臉轉了過來。

“干什么！”

被人硬把糖塊兒給塞進嘴里，他呸地一聲吐了出去。那人敲着他靠着的圍欄笑了起來。“哈哈哈哈哈，民治這小子，心里關別扭呢！”接着那傢伙就唱起最近流行的美國歌曲來：

我也是個女孩子，我也愛打扮！
玻璃絲襪和漂亮衣裳，
法蘭西香水滿屋香……

“討厭！”

可是那家伙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槌子腦袋，总是在大家不当一回事儿的事情上，大发脾气的。

……我想念都会呀，我想回去，你呀你……

每逢停車的時候，民治都細心地擦着面前的玻璃。穿过了人家众多的地帶，霧气更加濃重了。前边窗玻璃上挂着水珠。因为没有擦玻璃的自动裝置，就一边開車一边用一只手去擦。車灯的光綫，照出了十公尺左右的、閃着露水的光亮的綫路，可是一到拐弯的地方，就連五公尺远也看不清了。

“隧道，注意！”

他額上起着皺紋，凝視着前方，叫着。通过了仙川車站的隧道，前边展开了南部武藏野的田野。这一帶的霧气更加濃重了。——日本在破产，日本正在破产上行进，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这个呢？——他想着。

急行电車，通过了两三处小站，以全速度行駛着。已經看到东京郊区的一个小鎮——急行車停車站的国領車站的灯光。綫路笔直。来到下坡的时候，嘎的一声，用力轉动着駕駛器，速度慢了下來。……連結在一起的三輛电車，仿佛从綫路上飄浮了起来似的馳过，連駕駛台都象彈了起来似的。两边是三公尺左右的水田的土堤，可以看得見夏天的茂

盛的青草隨風飄搖着。他不斷地鳴着笛，皺着眉望着前方。隔着霧，一眼看見土堤上有一個什麼白色的東西，極快的閃動了一下，立刻就看不見了。鳴——鳴、鳴——……

“什麼他媽的法蘭西香水，畜生……”

他一興奮起來就有自言自語的習慣。

“法蘭西香水？畜生……”

“呵，呵！”

後邊，不知是什麼人從靠着圍欄的乘客當中發出叫聲，他急忙煞車，扳過車閘。急得頭髮都幾乎豎立起來了。車子跳動着向下飛駛，還是跑了四五十公尺遠才停了下來。他覺得全身一陣發涼，耳里吱吱地鳴叫着。

“壓着人啦！”

從後邊響着踏着砂礫的脚步聲，大島跑了過來。這個經驗豐富的老車務員，一邊舉着紅色的信號燈，一邊喊着。

“是跳進綫路自殺的？”

民治一下子說不出話來了。——他恍惚想起，剛才在那被一片車燈光綫照得發黃的軌道上，十幾公尺前邊的大霧里，甚至喊都來不及喊一聲，仿佛確實是有白色的兩條腿似的東西，從土堤上跳了下來……

“反正要打信號！注意點！”

大島上了車，對乘客們嚷道：“因為出了事故，請諸位等一會兒！”他馬上又往後邊跑去，過一會兒跑了回來，對駕駛台嚷了一聲：“女的，死啦！”接着立刻往有燈光的車站那邊跑去。

嗚，嗚，嗚——。嗚，嗚，嗚——。民治胡亂地嗚着“非常警笛”，一方面是警戒后边来的电车，并且这也是规则：在这种时候，司机是不能离开车的。到底是跳下线路来自杀的呢，还是自己的过失呢？但比这个更要紧的，是把人压死了的这一个事实，这事实，夺去了他的思考能力。一会儿上車来，一会儿下車去的乘客們吵嚷着：“小孩还活着……”“真奇怪……”，他觉得这些人都在责备他。

“喂，下来罢！”

車站副站長和派出所的警察順着鐵路从車站那边揮动着紅灯走了过来。他下了駕駛台，走到后边去，只对輾死者看了一眼，就轉过头去了。正是被撞倒当时的姿勢，她踉着身子，裸露在衣服外边的腿朝着线路旁的碎石那边伸出。翻卷到上边来的白衣裳，好象是一块包袱皮似的盖着身子，臉插在线路标木的下边。系在后背上的嬰兒，一陣一陣的发出微弱的泣声。

“是跳路自杀的！”

熟練的副站長弯着腰用灯照着，說出了他的判断。还很年輕的警察，緊張地量着土堤的高度，在尸体的周圍察看着、判断着情况。

“呵，原来是这个女人……”警察蹲下去，把死者朝上的臉抬了一抬，大概認出了是这街上的人，他放开手，把斜垂下来的手枪挂帶扶正了，站起身来自語着。“这女人，神經錯乱，早就发狂啦……”

头盖骨碎了，鼻子、嘴上全是黑色的血。

民治一眼看到她那散乱的头发和粘满泥土的发青的脸，立刻，使他自己也奇怪，不知怎的，在他眼前却很鲜明的浮出了那个裁缝铺女人的脸，虽然并不是长得很相象的脸。这两张脸在民治的脑子里冲击着。

“你看见她跳下来的吗？”

警察转过脸来对着民治。乘客们的眼光，紧紧地包围了他。

“我看是看见啦——”

话没说完，一个站在驾驶台后边的、说是某私立大学的夜校学生，说出了和民治的印象同样的情形，抢先给他证明。

“那么，你怎么办？”

民治觉得喉嚨干干的，虽然在回答着，但急得说不出话来，自己也生气，别人也生气，可是没有一点办法。尽管那个夜校学生在那里给他证明。包围着他的乘客们的眼光，只在盯着他。大家都把他当做有意干这件事的人似的，紧紧地盯住了这个越焦急越回答不好的司机，并且嘀咕着：“还有小孩子呢！”“这有点不合情理！”好象要把压死人的罪过都推在电车和司机身上。

“那么，明天上午到警察署来一下！”

“是！”大岛在一旁脱下帽子，把两手贴到两股上，给警察行了礼。民治还在着急，象要说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副站长在身后按着他的肩膀说：

“好啦，开车罢！”

把警察留在身后，副站長也上了前边車里。

“因为出了事故，讓諸位等了好久，对不起！”大島对乘客們道歉。事故？事故？什么事故？民治的嘴一張一闔地动着。把大島推到一边去，朝着乘客們說：

“这不是我干的，压死她的人，不是我……”

副站長在旁边摸着他的肩膀，把他推到駕駛台上去。

“別說廢話，快開車罢！”然后，他和車务員两人互相望着，笑着說，“沒經過这种事的人，誰都要着急的！”

4

实行二十四小时罢工的那一天，从早晨就下着雨。

杉山、大島一組，被工会調任井之头綫的“警戒乘务”。这天在綫路上活动的，只有占領軍的專用車，是三小时一次的乘务。所謂“警戒乘务”，是在規定的人数以外又增加司機和車务員各一名，組成一个組，是工会为了在万一发生事故时保护車輛的。罢工当中，全体人員都出动了。大家都很兴奋，但是杉山民治特別兴奋。他穿着公用的黑雨衣，因为个子矮，几乎拖在地上。碰見一个人，他就說：

“喂，保护綫路！”

“好的！”

因为这是工会发出的指示之一，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他。望着这个眼睛发光，被汗水濡湿的槌子头上冒着热气的人，有好些人都对他揮着手笑起来。

“知道啦，在綫路边上鋪張席子坐在那儿守着！”

一般人都在想：这条泡在雨里的糟糕的綫路，五十多公里長的綫路，得怎样去保护呢？对养路工們來說，这是他們自己的职责，他們是帶头巡回在拐弯的地方、鉄桥、隧道和綫路交錯的地方以及各个要冲。但是雨一下的大了，就跑进就近的乘务員休息室里去了。

各种流言通过車站电话不断地傳播着。說什么在东八王子，入庫的車不知被什么人从停車綫开到行車綫上来了。說什么东府中的这边，專用電車的发动机起了火，擱在中途，簡直太奇怪了，……这一类的謠言很不少，因为党支部的力量不同，或是因为周圍的空氣的不同，有的地方就說这是共产党要把罢工变为暴动，有的地方就說这是“民同派”企图破坏罢工而进行的阴谋活动。有的时候会因为完全相反的謠言，发生了一瞬間的混乱；但是这也并没有費多少時間、費多大力量就解决了。不管怎样說，以八十对三十的多数决定了罢工的这种力量，根据中央斗争委员会的命令，立刻就把真相查明，謠言的来源粉碎了。

“打倒破坏罢工的工賊！”

工人有着和从前不同的感觉。今天是用自己的力量开动車輛；是用工人的责任心支配着社会动力的一部分。比这次罢工能不能胜利还要重要的是：他們这是在直接地向着旧社会肉搏了。每个人，尽管有大小差别，但都有一种自己是用自己的責任和驕傲充实起来了的感觉。連那个总是以“掙点錢”为目的的大島，今天早晨見着杉山的时候也說：

“今天，你可是工会的人啦！”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着昨天晚上推过的光头。

“喂，保护綫路！”

“好的！”

民治听着身后的笑声，几乎走遍了全綫。他手里拿着卷起来的紅旗和綠旗，因为兴奋而用命令的語調說着話，在各个車站和各个的乘务員休息室之間进进出出。“保护綫路！”这句口号是支部的決議，也是罢工执行委员会的指令。他是这支部的党员，他这样走来走去的对人嚷着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可是也有好些人觉得好笑：——即使会发生破坏罢工的事，也不能把五十公里长的綫路揣到怀里去呀！他到处被人笑着，誰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他来到正开着工会支会會議的車庫里，被人們推到牆角里去，来到汽車工务段去旁听工会斗争委员会會議的时候，人家說他碍事，又把他推了出来。現在，他跑到一个車站的檢票口上，他站在拥挤拥挤的群众的后边。

“你們，你們沒有这样的权利……”

在嘈杂的声音里，听见有人大声地说。連戴着制帽的民治也被群众擋着，不容易走过去。乘客們看見了用車站和工会的名义貼出来的很多通告以后，有的人就往回走，有的人就气哼哼地嘟囔着急忙往别的电車綫赶去，情形非常混乱。有的人甚至圍住了六七个职工在守卫着的檢票口，想用武力冲破。一个穿着淺褐色西裝，脚上登着高底木屐，手挂着一把紙傘的四十几岁的男子，做出一种似乎他自己

并没有乘电车的必要，只不过是为大家抱不平的神气。

“——电车和线路，都是公司的吧？呵？你们这不是侵占吗？”

有人在喊着：“对呵，对呵。”守住检票口的工人回答他说：“不对。占领军的专用车就照旧开着。把守检票口是为了防止斯卡普^①分子！”在脸上显出无所谓的表情的大多数人当中，藏着一种颇为明显的势力。那个穿浅褐色西装脚登高底木屐的男子；那个抱着两臂满脸怒气，歪着脑袋，穿着胶皮靴，好象是个泥瓦匠的男子；一直就在纠缠着要乘专用车，披着防雨斗篷戴着防雨帽，好象是个杂志记者似的男子；这些人就是代表着这种势力的。在检票口里面，离这儿远一些的站台上，那个绞着手臂，戴着金箍的副站长，和在警戒着的警察站在一起，微笑着望着这边。副站长这一级的人物，大抵都是“民同派”的中坚分子，虽然也参加了罢工，但不少人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我说，车务员先生，我的女儿病了呀……”

一个抱着包袱的老太婆，拿着一把合拢起来还在滴着水的雨伞，喘着气，从人群里挤了过来。有人不认识通告上的字，认得字的，也有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罢工”，什么叫“工会”。

^① 斯卡普(Scab)，在一般意义上，指罢工中私自去上工的人，或在罢工中被资本家临时雇佣的工人。在城市的电车或公共汽车等罢工斗争中，常有某种青年或学生，以“为了公共事业”“为了社会道德”为名，临时去充当司机或车务人员，以破坏罢工。此处的 Scab，即指这种人。

这样的人們一出現，那个反对的势力就更起勁了：

“你們看見的，你們的罢工，使这些无辜的人，遭到这样的困难！”

那个穿高底木屐的，从旁边用手指头指点着对方的臉說。正在对老太婆解釋的那个职工，从早晨起就已經把同样的話反复說过多少遍了，現在只簡簡單單地应付着。这时从帶着无所謂的表情的人們中間，也有人喊了起来：“对啦，这个家伙簡直太神气啦！”在乘客里还有很多人只承認有私营电車公司的存在，而对于司机或者車务員是不承認的，只把他們看做电車和綫路的附屬物而已。

“我說，你們要罢工，那隨你們的便！可是，我們受的損失怎么办呵？呵？你說！”

那个把防雨帽戴在腦后，眼鏡閃着光的人，被穿高底木屐的一番話鼓动起来，拿着用一根繩系在褲帶上的月季票，在对方的鼻子前搖晃着。

“公司的責任！这个，我們管不着！”

檢票口上的人們又騷动起来。一个戴着“糾察”臂章的人，站到檢票口的台上。这个声音已經嘶啞了的、穿着綠色职工服的站务員，向大家說明必得进行罢工的职工立場，可是差一点儿被大家推了下去。

“什么話！我們有我們的权利！”

戴防雨帽的一叫起来，从不同的方向又响起了另外一种叫声：

“是呵，生活不好过，大家都一样！”

穿高底木屐的家伙，叫了一声，把雨伞举了起来，那个穿帆布鞋的站务员，就从台上掉进人群里去了。

“还不都是共产党干的！”

“卖国贼！”

——为什么在乘客里，有这许多什么也不懂的人呢？民治来到井之头线的池上车站，在往驹场方面去的线路上走着。雨又一阵阵大了起来，在大风雨里简直望不见十公尺以外的线路。民治继续想着：为什么大家都只是想着自己的事呢？

“危险！”

在烟似的大雨里，他看见了一个穿着防雨斗篷的人在线路上走着，同时他听见了线路上的轧音，他挥着卷着的信号旗，叫了起来。从风雨中飞似的开过来的涩谷发的占领军专用电车，在雨中闪着青色的电的火花，开了过去。

“下来，危险呵！”

电车开过去以后，那个穿着防雨斗篷的人又走到线路上去了，在雨伞底下点着他那戴了一个碗状小帽的脑袋，眨巴着小眼睛对民治笑着，可还是不从线路上走下来。是个便衣警察！民治想到了。他停下来望着防雨斗篷的背影。——可怕的东西呵！

“喂！”

他看见左边丘陵上的树荫底下，养路工区的七八个工人在避雨。民治一喊，一阵大笑声向他弹了回来。

“保护——线路！”

“好——的！”

雨已經小一些，剛才那個防雨斗篷，已經在綫路上不見了。在彎曲着消失于草叢中的閃着光的綫路的那一邊，看得見池上車站的屋頂。這時民治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喧噪着，擁擠着，包圍着他，他把下巴緊貼在頸前，感到呼吸很困難，就解開了雨衣的脖紐。在烟似的灰色的空中，黑暗的雲彩重疊着，慌忙地移動着。——為什麼人們都只想着自己的事呢？他想着。

“怎麼回事？”

旋轉腳踵走開的時候，他又回頭看了看，在彎道上，從右手的土堤下邊，有一個拿了一把黑傘的人登上綫路，有一會兒連動都不動，後來又蹲了下去。民治又往前走了十來步，看見了那個打傘的人穿着黑褲白衣的後背。這人慌忙下了土堤，民治跑起來，吹着警笛，朝着剛剛從池上車站開過來的專用車，搖着紅旗，喊着：“停車，停車！”同時他看見了在雨淋濕的軌道上，擺着四五塊石塊。他跑下土堤。那個細高個子白衫黑褲的人，還沒注意到民治在追他，正在若無其事地順着土堤下的小路往池上車站那邊走着，忽然一回头，他臉上就變了顏色。是個沒戴帽子的，三十幾歲尖下巴的瘦子。他臉色發白。當他發覺無路可逃時，就反過身來做出猛撲過來的樣子，趁勢往回跑，從民治身旁擦過去，向着土堤下邊的田地，跳了下去。民治跟着跳下去，正撞在剛站起來的白襯衫身上，跌了一個跟頭。

“幹什麼，混蛋！”

他轉過身對民治叫着，然后又往水田邊上的山坡上跑，往草叢里跑，當他又最後跑到土堤下邊的小道上時，從車站上跑來的站務員們終於把他捉住了，他還在反復叫着：

“我不知道，干什么？你們這些混蛋，我不知道……”

這家伙忽然發起火來了。大家穿過綫路，打算把他送進站台上的小屋子里去，這家伙的發青的臉上披散着頭髮，暴跳着，那神氣恨不得要把民治咬上一口。

副站長和开着這次專用車的司機都跑來了，站在一旁。不知什麼時候，剛才在綫路上走着的那個穿防雨斗篷的便衣警察，也在一旁站着。臉上，手上都滲着血的民治，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他這神情，倒好像他是個壞蛋。

“你們這些混蛋，赤化分子！”

“等一等，等一等，”在旁邊的那個便衣警察過來勸解着，那個白襯衫猛然跳了起來，跑過來要揍民治，還嚷叫着：“罷工！我讓你們罷工！”

那些在丘崗上躲雨的養路工們跑來了，他們說出他們在遠處親眼看見的事實。

“你叫什麼？哪里人？”

民治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擠到後邊去了，他從大家的肩膀上這樣問。穿白襯衫的不答話。他蒼白的臉上，轉動着目光迷亂的眼珠，變了色的薄嘴唇在哆嗦着。剛才那種威風已經沒有了，眼裡是混合着恐怖和傲慢的冷冷的眼光。

“喂，你叫什麼？說！”

在前邊站着的一些人，生氣的要去揪他的肩膀。差一

点电车就出轨了！真是千钧一发！而且这还是占领军的专用车，如果出轨了！罢工当然也就失败了。

“你，是学校的教员吧？你不是总在松原上车吗？”

有人这么說。冷笑着的便衣警察，好象要庇护这个白襯衫似的，走到大家前边来，說：

“好啦，由我們来审問他吧。……呵呵，知道啦，知道啦……”

他赶散了憤怒的人們，副站長也在一旁揮着手，对專用車的司机說：“開車罢，開車罢。”民治讓一个伙伴纏好伤口，同时望着那个防雨斗篷和副站長把穿白襯衫的夾在当中，往站台上的小屋子那儿走去。他看見，那个披防雨斗篷戴碗狀小帽、一臉酒气的人的黑色側臉上，不知为什么在苦笑着。

“開車！”

被赶散了的司机，回到車里用不滿的声音叫着。車里，有一个美国兵和一个小个子、黄皮肤无精打采的女人，靠着流着雨水的車窗坐着，叼着烟卷，噴着香噴噴的烟。一看見現在当了临时警戒乘务員的民治，美国兵就厌恶地皺着眉用英語叫了一声：“快点開車！”然后朝着那个女人，仰着头，用震动全車的高声，大笑着。

“站內注意！”

往后退了一退的电车，謹慎地通过了站內道岔，开动了。

“民治，了不起！”

“干呵！民治！”

雨还下得很大，在綫路上走着的、被赶散了的养路工人和站务員們，停了下来站在車旁，向上望着駕駛台，大声笑着。民治正站在駕駛台前一个开着的窗子前边，他拍的一声，把手举到贴着橡皮膏的槌子头的額角上，来了一个司机的敬礼。

“保护綫路！”

“好的！”

在笑声里，他越发严肃了。他皺着眉头，好象要看穿什么东西似的，看着前边进着雾似的水花的軌道，照例地把下顎紧紧贴在脖子上。

街

1

唵隆隆，唵隆隆，火柴盒子似的小房子不住的摇动着，仿佛它是在故意地讓千代心神不宁。——你可別倒下来呀，你可別倒下来呀，——千代心里嘀咕着。

好象行礼似的，她有节奏的动着身子，哄着背上的小孩，一边把一些紙头儿，一張一張用手捻着。这是在布匹或是洋服料子上标价碼用的紙籤儿，因为紙硬，捻了一会儿，手指尖就发麻了，不知为什么今天簡直不出活。已經是不能不去做晚飯的时候了。也許因为天在下雨，四周已經黑起来了。

“擤擤鼻涕，別在那儿希溜希溜地抽鼻子！”

隔着飯桌这么一罵，十二岁的大女儿，就赶紧仰起臉来，把短短的头发甩了一甩，把鼻涕抽了回去。她的个子很小，因此把紙片举得高高的，对着炭火盆上的水壺嘴，讓热气熏着，把紙片熏軟一点，捻起来容易些。她因为挨了罵，就赶紧跑到母亲跟前坐下来，可是她很不耐烦，一会儿从滿是褶子的人造絲裙子下边蹠起腿来，一会儿又盤腿大坐，不能

安靜。

“政——春，你敞着門，不冷嗎！”

象母親罵她那樣，她眨着眼睛在土間^①里的弟弟。那個在門口把兩扇玻璃門打開一條縫，正望着雨中街上往來飛馳的汽車的、穿着小學制服的男孩子，比姐姐更不耐煩。

“叫什麼！就開了這麼一點小縫兒！”

“一點小縫兒！人家冷呀！”

“沒有關係！”

他把手插在褲袋里，一邊玩弄着陀螺，一邊回過頭來朝着姐姐一伸脖子，一呲牙，弄得姐姐沒有辦法了。

“媽呀，你看他——”

她轉過臉來，抽着鼻子。而千代仍舊彎着胖胖的身子，一邊一上一下地動着披散着頭髮的突出的前額，一邊不停地動着手指頭。她一直就在想着上稅的錢，可是背上的哭聲打亂了她的思想，使她靜不下心來。——四千七百元去兩千八百元……兩千？噢，不是兩千——。

“真討厭，你就不睡一會兒，真是的！”

回過手去打了一下屁股，背上的哭聲一下子大了起來，接着還是不斷低聲地哭着。——對啦，是一千九，從一千九里去五百元是一千四，對啦，是一千四。還得算上延期繳稅的利息，一天四分錢，是多少呢？催繳費，是不是還有什麼查封手續費呢？可是怎麼回事，這孩子從今早起就不對勁

① 日本式房屋里不鋪席子或地板的房間。

儿——。

“噢噢噢噢，好孩子好宝贝！”

不爱吃奶，而且今天一会儿也不肯睡。已经快一周岁啦，还不大会爬的衰弱的孩子，说不定是在洗衣裳的时候，大孩子们又喂他白薯吃了吧？在千代的脑子里，上税的钱和孩子的事混杂在一起了。

“叫你关上，你就关上呀！”

抬起脸，朝土间里嚷了一声，那男孩子反倒觉得受了委屈似的一下子把身子溜到玻璃门外去了。

“你就出去乱跑去吧！让汽车撞死你！”

光用话恐吓，一点用也没有。

“吡！混蛋！”

这个顽皮的秃小子，转过身来把那关也关不严的玻璃门用两手砰地关上，吐了吐舌头。然后转过身去，搖摆着他的秃脑袋，趁着一辆小汽车象箭一般从眼前飞驰过去的空儿，冒着雨，直奔到街那边去了。

“Five children, killed here! Drive slowly.”

——此处已撞死五个儿童，缓行。——S 警察署——

离这个男孩子横穿过去的地方不远，立着这样一块标示牌。在这不过十公尺宽的柏油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是以高速度驶过，简直就象大工厂里的自动传送带一样，有时一连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你也过不了街。

嗚，嗚嗚，噠，噠。远处响起好象消防汽車似的汽笛声，突然就逼到眼前来；接着刷地一声，又来了一陣风似的小轎車。往来于鄰县的載貨大卡車和机器脚踏車象被风吹集到一起似的聚在路上。从屋檐底下，只見巨大的膠皮車輪把周圍擋得黑黑的开了过去；黑灰色的箱子似的軍用大汽車，以比較低的速度，威风凜凜地，在下着雨的街道上轟响着，开过去。这种情形，使得这一帶的孩子們，甚至連狗呀、猫呀，都自然而然地变得神經迟鈍起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条 K 街上的名物——那載着糞桶的牛車，那系着印花圍裙、包着头巾的姑娘們用手推的販青菜的小車，这些行动迟緩的东西都不从这条街上过了。可是街道左右的人家却还和往昔一样，住在破爛的屋檐下边。从东京的 S 区到这儿是七公里，这儿也还属于 S 区。被冷雨打得一天比一天赤裸的老山毛櫸，象街树似的排列在两边。在摆着柿子、蜜柑和粗点心什么的鋪子的旁边，就是地主家的瓦門楼。从黑色板牆牆头上露出巨大的山毛櫸树干。在屋頂上挂着“电气用品。修理无綫电。承包电工”的招牌的房屋旁边，就是老百姓的傾斜着的小草房。路旁有玻璃門的人家，也不一定都是做生意的，比如，剛才那个男孩子跑出来的这一家，——小小的鉛皮屋頂，在被尘土染成了白色的門框上釘着“小林仁三郎”的門牌的，虽然也是玻璃門，但不是做生意的人家。

“媽呀，今天，黑箱子过的真多呀！”

拍搭搭，拍搭搭——不断的震动着的玻璃門，一会儿暗，

一会儿亮，慌乱地闪动着。女孩子打着呵欠，自言自语着：

“唉呀，肚子饿啦，吃块白薯吧！”

女孩子趁母亲低下头，用长着脏指甲的拇指数着捻好了的纸籤儿的时候，就站起来，伸手到纸门后边的柜子里去。咬了一口白薯，然后把白薯高高举起来，一只手插腰，挺出肚子，“二、二、三、四”地跳起舞来了。这是开运动会的时候学来的集体舞，在破烂的草席上转了两三圈，突然叫道：

“妈，妈呀，你看，吉政吐奶啦！”

她背上的孩子，两手垂了下来，紧贴在肩头上的头发稀薄的小脑袋，一阵一阵地颤动着，从嘴里流出黄色的液体来。千代慌忙把孩子从背上解下，嘴唇贴在孩子脑门儿上。

“真的，这孩子发烧呢！怎么啦？”

她把孩子包在衣裳里让他躺好，同时从披散在额上的乱发下边，转动了一下眼珠：

“你是不是给他白薯啥的吃啦？”

她脱下弄脏了的上衣，擦着孩子吐出来的有一颗颗白粒的东西，用白眼珠瞪着女孩子，女孩子向后退着摇着头。

“嗯嗯，我没给，政春……”

“政春，怎么样啦？”

“政春就给了这么一丁点儿……”

还没说完，女孩就被打得跳了起来，撞到纸门上了。

“——你不是当姐姐的吗！这孩子肚子不好，我说过多少回啦！我说过——”

千代挥着笈带，跳到屋地上了。她脚上只穿上一只木

殿，臉上通紅，眼睛閃着光變成三角形的了。正在這當兒，玻璃門開了，看見了丈夫的臉。可是她不肯罷休，一定要用筭帚柄在女兒的背上打一下。

“好啦，好啦，這算什么！”

瘦長的幾乎碰到門框上的小林仁三郎，渾身上下都淋透了。他把沾滿了泥的紅色的自行車扛進土間里來，千代就那麼拿着筭帚望着他。最好可別帶回什麼倒霉的事，她有一種習慣，就是每天在丈夫下班時，看看丈夫的臉上有沒有什麼不安的神情。瘦得幾乎會折成兩段的郵務工人，摘下了帽遮上還滴着雨水的制帽，把雨衣扔在自行車上；當他那濡濕的水袜子在地上踏着一個一個的腳印，走到炕邊上來的時候，千代還是用發怒的聲音說：

“你怎麼，下班了嗎？”

然而，當她那僅有丈夫一半高的圓圓的身體，走到丈夫跟前時，就象對付小孩子似的，用勁扯着丈夫外衣的袖子，摸着褲子說：

“你看！濕成這個樣子怎麼辦！就這麼加班干，再犯神經痛，我可不管！”

丈夫就象是要扒在炭火盆上似的彎着身子，在有絡腮胡子的臉上顫抖着沒有血色的嘴唇，這側臉，使千代感到了憎厭。而丈夫也氣咻咻地說：

“好啦好啦，快點給我弄飯盒子！”

雖然穿着雨衣，可是總得有一隻手拿着郵件，總得在每家門前上下腳踏車，所以只要有一點風，就會連褲衩都

濕透了的。據說郵遞工人有百分之六十害痔瘡。根據所謂“定員法”（實際上是要“肅清赤色分子”），C二等郵局的六十一名郵遞工里就裁去了九個。這麼一來，從前每個人一般有四個鐘點在腳踏車上的，現在必得用五個甚至六個鐘點去騎腳踏車了。再加上，從昨天起又來了地方稅的催繳單，東京都的和S區里的都在一起，所以幾乎得挨家挨戶去送。

“誰又告假啦？呵？又是中村嗎？”

拿下水壺，放上了咸秋刀魚，從屋角里拿出飯盒子裝着冷飯，千代還是一臉的不高興。郵遞工普通是四個人一組，擔任一定區域的郵遞工作，如果組里有請病假的，那就得加班了。

“怎麼啦？吉政？”

烤魚的煙熏得他直眨眼睛，丈夫到底說了丈夫應說的話。千代把腦袋鉗在壁櫥里，扯出了一些舊褲子什么的，轉過頭對丈夫說：

“就是呀，發燒呢！大孩子給他白薯吃，吃壞啦！”

“……”

“又非得找大夫不可啦！”

這可不是輕易就能決定的。共濟會的醫院太遠了，附近的醫生太貴了。千代望着丈夫的臉，丈夫的臉跟平常一樣，只是皺着眉頭。什麼辦法也沒有的仁三郎披上了濕雨衣，揣好飯盒子，看了看牆角上裹在衣服里的孩子，只是打着响舌。

“他爹，換條褲子再去吧？”

“用不着。”他轉過身去說着，又提起紅腳踏車哐當哐當地撞着玻璃門出去了。千代呆呆地站在門檻上，抱着舊褲子，心里沒主意。——也真是的，這時候換上了干的也沒有用，正是連雨天，這條再濕透了，明天可就沒有穿的了。

2

就是到了深更半夜，K街上也不會減少往來汽車的震動。——八百加五十，九百，九百加三十，沒有多少了。千代把捻好了的紙片用手指壓着數好了，又拿起紙片放到藍色水壺嘴上去。炭火已經不旺了，壺嘴里冒不出多少蒸氣。煮東西、下雨天給孩子烤尿布、家庭副業，一共要用一整塊煉炭，可是捻一千張紙片只能拿到三十五塊錢。

“好孩子，好孩子！”

膝蓋前邊排列着四個頭，靠牆的一副鋪蓋里睡着大女兒、男孩子和有病的幼兒，再一個就是丈夫，他緊靠着炕沿邊緣睡着，幾乎要掉下去。千代雖然作着笑臉逗弄着病孩子，可是心神不安。幼兒到晚上就不哭了。小猴子一樣的腦門兒上起着皺紋，微微地張着眼睛。

“——這就攬着你睡覺啦，好孩子！”

千代想要再給他洗一洗腸子。晚飯以前洗過一次可是沒弄好。從經驗里知道，不哭了並不是一個好征候。她想明天一早就帶他上郵政醫院去。因為是職工家屬，這醫院

可以免費。心里盤算着反正總得花電車費，順便就把這些活計送去。她還沒來得及跟丈夫商量一下，就看見丈夫筋疲力盡的睡下了，連听人說一句話的精神都沒有，于是惹得她生了一肚子氣。看他渾身上下濕透了跑回來，給他預備好毛巾和臉盆叫他洗澡去，可是他困得只是想睡，一句話都沒有說，就鑽進被窩里去了。要是半夜里你再叫嚷起來，怎麼辦？我才真的管不着呢。

.....

一看見正在睡着的兩眼深陷、滿是胡子的丈夫的臉，就感覺到：夫婦兩個和三個孩子的頭仿佛是一齊被裝進了囚車里一樣，她真想大聲叫出來。忽然她發覺水壺的蓋子在咯嗒咯嗒地動着，千代停止了她的有髒指甲的拇指的活動，向土間那邊望着。嗚，嗚嗚，噯，噯——車笛聲象突然掀起的风暴似的從門外響着過去。

.....

地的震動聲，從遠處傳來，越來越近。好象這兒突然冷起來似的，千代用一隻手掩上了衣襟。她注視着從那又黃又舊的帘子的裂縫中露出來的玻璃門上的兩個格子，水壺蓋子的响声更大了，突然間外邊象閃電一般地亮了起來。

白的，白的大箱子①……。刺眼的亮光，蠕動着的白色大箱子……。千代覺得自己的身體，這個火柴盒一般的屋子，全部被染成白的了。嗒、嗒、嗒……。土地的震動聲，奇妙的

① “白箱子”是暗指當時載運美國軍隊從侵略戰爭中撤下來的傷兵的汽車。

寂靜，而且是很有节奏的。一个白箱子过去了，又是一个白箱子出現了。一个連着一个地……好象是在一場噩夢里似的，她觉得呼吸窒息。她一只手上就那么举着紙片，想要叫醒丈夫，但是奇怪的是竟不能把眼睛从那里轉过来。后来当她终于看見一个白箱子上的窗子时，她“呵”地叫了一声。在白光里，她看見一个抬起上身凭靠着車窗的人的两只眼睛，隱約可以看見那人的口髭，从白布之間向外窺視着，那两只眼睛确实是在望着她呢。从很远的什么地方奔来，也許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这奇异的两只眼睛，好象流星似的，偶然直朝着她这边望过来。不知是哪一个人的，說着什么样的語言，但奇异的是这眼睛很懂事。仅仅在这一瞬間，这白布之間的眼睛和白光一起射了进来，迫近地捉住了她，帶着微笑地在向她訴說着什么憤懣和不平。——一会儿，白光消逝了，土地的震动声远去了，只有玻璃門上的两个格子，閃着暗暗的光，和以前一样了，但是千代还在望着那边。

“一点五分——”

她不知不觉地轉过眼来，望一眼在櫥櫃上两只指針重疊着的小鬧鐘。鬧鐘的鍍銀已經褪落了，在它那鼓出的肚子上，也斜着貼上了一張查封的封条。

一閃一閃地，这回是另外一种黄色的光，染黃了窗帘的破縫，剧烈地震动着，开过去了。

“一捆儿，两捆儿，三捆儿——”

千代把一千張紙片用紙繩扎成一束束的，从壁櫥里拿

出包袱，另外还有九束，合起来正好一万張紙片。千代把手举到眼前，屈指一算，从領活計到現在，整整一个星期了。

“三百五十元——”

現在，三張一百元的紙幣和五張十元的紙幣，确实成为現实的了，她突然感到了疲勞和飢餓，她繞着床边儿从櫥櫃里取出一个小蒸籠来。还剩下一块吃了一多半的白薯，从水壺里把发紅的剩茶倒在碗里，垂着头发的前額被热气熏着，千代的臉上开朗一些了。——到月底能湊上五百元了。

“一千四百元去五百元……”

被疲倦和睡意以及暖暖的蒸气弄得迷迷糊糊的头腦，觉得好象越过了难关。因为沒繳上二十四年度的所得稅，家里被查封以后，半年以来，惊恐和忧虑使得人都丧失了对寒暑的感觉。他們在去年想搞点家庭副业，买卖鸡蛋，在玻璃門旁边摆上了三四个小箱子，讓稅务署的署員看見了，这就得繳上連本帶利都得賠上的重稅。跑稅务署，跑警察署，无数次哀求民生委員，这才允許分期繳付罰款，到現在已經过去三个月了，第一期地方稅的催繳單，正好是丈夫自己送来的。

“——五百元，五百元，还剩九百元啦！”

为了讓她那困倦得迟鈍起来的头腦舒适一些，她一边翻来复去的算計着这早已弄清楚了的 answer，来安慰自己，一边就准备睡觉，忽然，她隔着水壺說：

“怎么，你睡醒啦？”

仁三郎的被子在动着。他已經轉動了好一會了，聽見這一声，就象要躲開老婆的眼光似的安靜下來，又閉上了眼睛。

“你怎麼啦？”

她正在解開褲腳帶，隔着火盆往那邊望着。僅僅四十歲的人，頭髮已經脫頂了，眼角上刻着深的、骯髒的皺紋。但是她一看見丈夫故意不快地閉上眼睛的氣餒的樣子，千代就控制不住自己，不能不叫起來了：

“又是腿痛啦？呵？”

胡子臉好象怕晃眼似的轉到暗影里去了。尖尖的頰骨抽動着，口里噴了一聲，不知嘟囔了一句什麼，老婆沒聽清。繞過火盆，在他頭上彎下身子，可是他還是咬牙切齒似的扭着嘴，頑固地緊閉着眼睛。千代說：

“要痛你就說痛呀，哪兒痛？……”

剛說到這兒。

“討厭！”

仁三郎突然叫了起來，抬起了上半身。

“轉過臉去，朝那邊！”

他把被子猛地一掀，連頂小的孩子也露在外邊了。千代急忙給孩子蓋上衣裳，但照舊張着嘴望着那邊。掀開了被子的丈夫，身上穿的短褲衩和披在身上的用舊浴衣改做的睡衣的腰部，都黑忽忽的，濕成一片，冒着熱氣。

“叫你轉過臉去——”

狠狠地瞪了老婆一眼，仁三郎就象剝皮一樣的把睡衣

脫下來丟到地上，然后又解着短褲的帶子，轉過身去，細長的身子上起了雞皮疙瘩，自己嘟囔道：

“——他媽的，是你們不把人當人看待才弄得這樣的呀！……”

仁三郎難堪地縮着瘦瘦的小腿，用手提着鬆開了的短褲的褲腰，朝老婆大聲說：

“短褲子，短褲子呀！——你在那兒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呀！”

千代紅着臉，把頭伸進壁櫥里，亂翻着破行李包。一連下了三天雨，已經換過兩次短褲了，現在要找的是早已洗過了的打算做抹布用的破短褲，壁櫥里漆黑的，怎么也摸不着。

“你快一點呀！”

“你稍等會兒！”

她知道丈夫叫嚷是因為他難為情，她心里也煩得很。好久以前，正是給人家投遞賀年郵件最忙的時候，又是雨又是雪，干了一整夜，那時他睡夢里不知不覺就尿炕了。她為了不讓孩子們知道，想盡辦法烤干那床尿濕了的褥子，可真是費了好大的勁。可是，現在，這個瘦子，這個窩囊人兒，他到發起威來啦……

“給你！”

千代結好斷了的短褲帶，遞了過去，盡力不往丈夫那邊看。丈夫覺得難為情，她自己也覺得難為情。這與他的常常發作的右腳神經痛不同，他這種尿炕的毛病，使千代感到

极大的羞耻。但是如果自己也表现出羞耻，就使丈夫更难堪了。她觉得如果这时再默不作声，那就使丈夫更加不好意思了，于是把丢在屋地上的睡衣收拾起来，把湿湿的短裤子抓了起来的时候，千代无心地說：

“哟，这尿骚味儿！”

千代說着話的时候，她那紅紅的臉是笑着的。可是仁三郎的胡子臉上眼珠子轉动着，嘴角抽动着，突然，千代的臉上响了一声。

“……………”

她捂着頰，望着丈夫的臉。千代眼睛紅着，眼光閃动着。讓他这一打，好象把什么东西都打得沒影儿了。算个什么玩艺呢？你这个尿炕的小子，随你怎么装腔作势，你还不是該多大份量还是多大份量嘛！故意去誤解人家的心情，真是個混虫！看你瘦得象根晾衣裳的竹竿似的罢！

“真痛呵！”

千代还在捂着頰，仰着臉。真气死人，象我这样从来老老实实的人，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呢？……

“凭什么打人？你凭什么？”

可是，渾身起着鸡皮疙瘩的、把两臂交叉在瘦胸前的仁三郎，讓她这么一逼，反倒咬着牙，又打了起来。

“混蛋，誰他媽自己願意这样的……”

这一瞬間，在丈夫的可怖的眼里有一种瘋狂似的東西。千代两手举在胸前，防卫着，往牆那边退去，他还在叫：

“誰叫你笑話人！”

仁三郎虽然还在大声嚷叫，其实他已经渐渐软下来了，千代盯着他的眼睛，她的下颚颤抖着，真恨死人！她举着两手，满脸涨红，咽喉都堵塞住了。呵，真恨死人啦！

直到丈夫抽出尿湿了的褥子，把小孩子推到一边，只用一条被子把自己裹成一个卷儿的时候，千代才由咽喉里发出声来：

“誰笑話你了？誰……”

她突然揪住他那只露在被卷外边的头发，連被子在一起揉搓着，打着。

“你說，你說呀！”

仁三郎脫頂的腦袋轉來轉去地搖着。他頑固地緊閉着眼睛，奇怪的是，一点都不抵抗。

“笑話丈夫，能有什么好处呀！”

千代帶着哭声說，为了不吵醒孩子們，先是把声音压抑在嗓子眼里，可是一旦哭出声来，就管不住自己了。

“为什么假裝不懂得人家的心呀——你要是那么委屈，你就別干那份郵差呀，呵，不干就不干，要飯吃也能活下去呀，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当然是瞎說，可是她索性就瞎說起来了。在被子上拍拍地打着丈夫，一边嚷着：

“——你算什么呀！那些赤色家伙被裁掉的时候，我不是說过嗎，赤色家伙一裁掉，你們剩下的更得遭殃啦！得把你折騰的不只尿炕，还得尿血水呢！那就不如壯起胆子来，和大伙一块去罷工，去示威！可是，可是你这家伙——呵，真

恨死人啦！”

千代把丈夫推了一个滚。把被子掀开来了。可是，那只穿着一条破短裤的瘦长的身子，还是一动不动。她给他铺好了破毯子片和旧大衣当褥子，又给他盖上被子，他还是脸朝着屋地那边，紧闭着眼睛。

“你自己觉得不错，可不管别人，算什么话！”

她在短短的贴身小衣上系好带子，只穿了一条短裤，把手臂放在小孩子头底下，钻进一个被窝里去了。

“你还想怎么着？你还想……”

千代还在说着，但是这以后的话可就说不出口了。开职工大会的时候，丈夫说是不参加不合情理，可是硬把他留在家看孩子的，就是千代；可是，可是，有这么多孩子，要让人家裁掉了，不是毫无办法了吗！她那湿湿的眼睛望着没有灯罩的电灯，却觉得脸上热了起来。

“你还想什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两口子呀——你真恨死人！”

她用屁股撞一下丈夫的背，可是丈夫还是脸朝着那一边，身子硬板板的。

3

天色发白的时候，往来邻县的卡车，公共汽车，载着青菜的机器脚踏车，一时间使得K街上的嘈杂更厉害起来了。昨夜，雨已停了。街旁的山毛榉赤裸裸的，没有一片叶

子，但因为川流不息的跑着車輛，在街上几乎看不見落叶。連霧气也沒有，在漸漸亮起来的冷空气里，不整齐的房屋，薄薄的招牌，蹲伏着的小草屋，旱田里的小木板房，都漸漸地浮現了出来，但是看去都好象是因为通夜惊恐地发着抖，每所房子全显得很疲劳的样子。面色張惶的仁三郎，穿着破旧的歪扭了的膠皮長靴，穿一件扎紧腰帶的襯衫，从道旁那所小小的鉛皮頂房子里，慌忙地打开玻璃門走出門来，有两三輛寬大的大卡車飞也似地开了过去，几乎碰到身上，他順着道旁的泥水窪急急忙忙地跑着。这时鄰家卖粗点心的鋪子里的矮小的老太婆，正在仰着头去摘下玻璃門上的帘子，她就这样往上抻着身子，一边轉过脖子來說：

“怎么样啦？那小的——”

老太婆朝着那个回过头來說了句什么，立刻又往前跑去的仁三郎的背影追問了一句：

“抽？呵，抽瘋呀，那可不得了——”

老太婆仰起了白发的头，就在这个姿勢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噴嚏。这时候，两三輛小轎車“刷”地一声飞駛过去，在一陣汽油的烟气里，老太婆和仁三郎都不見了。

“等等，等等，噯，糟糕！”

千代用一只手按着孩子的肛門，另一只手揉着孩子的肚子，这时，把弄髒了的手抽了回来。在破布片的上边，滿是甘油似的液体和青黄色粘液的糞便。孩子的小小的拳头不时地顫动着，黑眼珠向上一翻，千代就用弄髒了的手，拍拍地打着孩子瘦小的屁股。

“忍耐点儿呀！你爹也不知道磨磨蹭蹭地干啥去啦！”

她还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贴身小衣。——这时候她的感觉是：仿佛是在无意之中被人狠狠地踢了一脚。——两年以前，已经长到三岁的男孩子，只一个晚上就被传染病夺去了生命，那情景清楚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是一种不管多着急也毫无办法的感觉。噯，还不都是因为这个不中用的丈夫，才弄成这种样子！

“调羹，调羹！你傻头傻脑地干啥呀！”

她叫喊着，用赤裸的两腿夹着孩子的身体摞在怀里。正站在一团被子旁边的大女儿，被吵了起来，就赶紧去取来调羹，千代掰开了闭得紧紧的孩子的嘴，往里灌着蓖麻子油。

“真是，灌不进去！”

这时候，在拿着皮包的仁三郎前边，穿着白罩衫的附近的女医生，打开玻璃门走了进来。千代慌慌忙忙地穿起长裤和衣裳，好象忽然变成了一名被告似的缩到医生身后去了。医生一坐下来，就翻开孩子的眼皮看看瞳孔，按按脉，然后拉过皮包来，打了一针，又按着孩子的手腕，同时用心地查看着脸盆里呕吐出来的东西和破布片上的粘粘的粪便，然后对千代说：

“看粪便的样子，可够厉害的——”

还很年轻的女医生，用清楚的声调好象斥责似地说：

“肚子早就坏了吧？”

千代低着头答应了一声，然后又抬起头来，惶惑地问道：

“那，您是說治晚了嗎？”

不知是聽見了還是並沒有聽見，醫生一聲不響地接着孩子的脈，然后又回過頭來，望着她那披着头發的前額，一點不客氣地說：

“孩子自己是不會說話的，要是當母親的不注意的話……”

象是被斥責了似的，千代兩手交叉着放在穿着長褲的兩腿的膝蓋上。在這廣大的世間，孩子病了仿佛只該她一個人負責似的。這一瞬間，就連映在她眼角里的丈夫的影子，也好像離開遠遠的了。

“那麼，您說已經來不及了嗎？”

醫生还是不答話。略微偏着頭，放下孩子的手，敏捷地挽上白罩衫的袖口，朝仁三郎呶一呶嘴道：

“請燒點開水！”

於是拿出了一個大注射器，注射了大量的藥，幾乎使孩子的屁股都脹了起來。醫生叫夫婦兩個用溫濕布揉着孩子身上的針眼，又在胳膊上注射了一針。孩子不時發出微弱的泣聲，小手攢得緊緊的。千代手放在膝蓋上，屏着呼吸注視着孩子的臉色和那位一會兒按着孩子的肚子，一會兒把耳朵放到肚子上去听的醫生的臉色。一看見在牆角里垂着兩手呆呆立着的丈夫，她心里又恨起來了。什麼東西！這又不是我一個人生出來的孩子！這個一點本事都沒有的絡腮胡子實在氣人。

“嗯，不象是痢疾——”

医生說着，又握着孩子的手腕，看着手表的指針，慎重地說：

“所以，我想，还不要紧吧！”

千代握着孩子的另一只手，低头向上望着医生的眼睛，有些湿润了。好象是和孩子的生命一道，自己的生命也得救了。千代用一只手撫摸着孩子的还腫着的小屁股，似乎觉得那萎縮得象小猴子似的臉，营养不足的小手小脚，都在她手里无限地肥胖起来。

“我下午再来看看……”

“噯！”

“要是情形有变化，立刻告訴我！”

“噯！”

答应一声，千代就鞠一躬。最后，医生又翻开孩子的已經柔軟了一点的眼皮看了看，就敏捷地穿上鞋子，在拿着皮包的仁三郎前边走到玻璃門外去了。她望着女医生的背影，一下子把臉貼到門框上了，呵，有救啦！她又感到这晚秋清晨的凉爽空气，她又看見这凌乱而狹小的房間里的一切。这是一种获救的喜悦，但是当她走到孩子的枕边，握住那已經張开了的小手的时候，立刻，这喜悦就消失了。

“燒飯嗎？媽！”

“呵！”

“把籠里切好了的白薯，攔进去嗎？”

“呵！”

女儿在拉門那边問，她无力的回答着。她按照医生的

囑咐，在用破布和旧棉花叠起来往孩子的肚子上纏着。没有办法，她一点精神都沒有了。虽然已經做好了一万張价碼紙片，可是現在又是一場空了。連药名都不知道的各样注射針，細致的診斷和手术，到底得多少錢呵？

“飯盒子，快点！”

送医生回来的仁三郎，喝着又热了一遍的“疙瘩湯”，背向着老婆，隔着拉門，用冰冷的声音对女儿說。

“媽呀，要是爸爸拿两个，我們的就不够啦！”

在拉門那边，响着飯盒子碰撞着鍋沿的声音，和女儿的还没睡够的迟鈍的話声。

“爸，你回来吃吧？呵？爸！”

女儿問爸爸，可是仁三郎的嘴里，只是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听不清的什么話，这就在千代从昨天晚上就有的那种感情上，又点了一把火。

“不管怎么的你倒說一句話呀，今天可不能往局里帶飯盒！”

仁三郎还是不看他老婆，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回来吃吧！”

撂下筷子，拿起放在还没有生火的火盆上的茶壺，看了看，又放了回去，面对着牆，穿起制服上身。千代心想：窩窩囊囊的，可还有那么大脾气呢。

“你呀，看你那股勁儿，象能掙个万八千似的。真沒意思……”

虽然在孩子們跟前，不便說得太露了，可是看着他那別

着脖子坐在門檻上、纏着裹腿的瘦長的后背，心想：就凭你这个一点本事都沒有的家伙，还一直把昨晚上的事記在心里！想着，生了一肚子的气。

“多亏你呀！繳稅的錢这一下子不是全沒影儿了嗎！”

丈夫站在土間里，一动不动的偏着帶絡腮胡子的臉。这笔医药費，实在是一个补也补不上的大窟窿。連花个电車錢都心疼，落到了这步田地，到底該怪丈夫呢，还是該怪自己呢？千代自己也鬧不清了。

“你自己稍微想想吧，把这点破爛东西全給拿走了，我也管不着！”

丈夫还是眼望着地站在那里。最后，千代自己也觉得自己說的太过分了，可就是收不住嘴。丈夫用眼角瞟着櫥櫃上小鬧鐘的指針，等老婆这一陣蛮橫的混勁儿过去了之后，他就把骯髒的紅色脚踏車从屋地里提出去了。照規矩，平常脚踏車是得交回局里的，有特別情形才能放在家里。昨天夜里在泥潭里淌过的車，不只車帶，連車輪条都滿滿糊着泥。

“坏啦？”

千代問。她望着丈夫在玻璃門外，先跨上了一条瘦長的腿，空蹬着車蹬子，然后又拿下腿来，把脫了下来的鏈子挂到輪盤上，她心想：人瘦成那个样子，就是干上一輩子郵差，也不过是个郵差罢了。

“真是個沒办法的，象那自行車一样，整天都在消耗自个儿的身子呵……”

千代坐在孩子的枕头旁边，望着丈夫又跨上车子，摇晃了两三下，到底往前走了，她自言自语着。千代的没有精神的脸上，显得轻松了一些。这时候，照例从远方传来的汽车喇叭声，突然临到近前，震动着玻璃门飞驰过去，卷起了一阵烟尘，连对面人家的房檐都看不见了。接着又是可怕的轰响着的大地的震动声，象波浪似的涌过来了。

“呵——”

一种不安的预感，使得千代站了起来。在屋檐下只能看见巨大的车轮，把玻璃门挡得黑忽忽的，千代胡乱地穿上了木屐，推开了玻璃门，在轰轰的声音中，朝着那还没有走过半条街的骑着红色自行车的丈夫的方向大声叫了起来：

“他爹呀，他爹呀……”

汽油的臭味和轰响，充塞在他的去路上。望不见丈夫被挤到哪里去了。

“他爹呀，他爹呀……”

千代抓住玻璃门，探出身子大声招呼着，几乎被汽车擦着了脑门子。要是丈夫有个好歹，真的叫汽车撞了，可怎么好呵！

“什么呀？”

忽然，在离着五六丈远的电杆的后边，在紫色的烟雾里，她看见丈夫扶着自行车的把手躲在那里，他象呆了似的张着嘴。

“噢呀，好啦好啦……”

丈夫把手挡在耳后，皱着眉，好象在问着：又有什么事

•啦？千代对着他摆了几次手。

“好啦好啦，你路上可要留神呀！”

丈夫的絡腮胡子的臉上，好象还在問：什么事呵？他还在皺着眉头，朝这边看。直到在轟响和烟霧里又望不見了丈夫的臉的时候，千代長長出了一口气。

“怎么这么多的車呀！”

当她把目光轉到大道上，自己从緊張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她才发觉：原来从剛才她向丈夫揮着手的时候起，她臉上就一直是在笑着的。

下乡的文工队

1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曾經在長野县伊那郡富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住过三天。——我是七月中旬由东京出发的。在長野县諏訪郡川岸村的东芝川岸工厂的女工宿舍里住了五天；在工厂附近的农民家里又住了十天。来到富村以后，我的任务是参加此地青年会主办的文艺講演会，并且要和到各个村子去演出的川岸工会的文工队碰碰头，帮帮他們的忙。

活动得最积极的是坂井梅，她是从今年二月間就开始了罢工的川岸工会厂外斗争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现在所住的这家农家的姑娘。她和奔走于川岸村农民家里的我联络上以后，就提起我的皮包，帶我到这个村子里来了。来到这儿那天，坐在屋里不动都把我热得够受，可是她呢，跑出去一整天，直到我睡下还没回来。她的任务很多：和这村里“互助会”^①的川岸工厂的七名职工去联系，和主持着川岸文工队的木偶戏表演的富村党支部去联系，和主持着我的文艺講演会的村青年会去联系，所有这些事，全都是她一

个人干。她是共产党员，今年二十六岁，是个肤色很白，身材不高的姑娘。从川岸工厂还叫作片仓紡絲工厂的时候起，她就在这里做工，已经十二年了。她很快地就热中于自己的工作。她有一种有趣的习惯，喜欢摇摆着两肩，很快的走路。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工会的罢工组织里设有所谓厂外斗争部。据罢工总部的人讲，厂外斗争部还有一个名字，叫作人民斗争部。我现在富村所协助的工作，就是属于这人民斗争部在文化方面的一部分工作，第一是为了鼓励组织“互助会”的罢工工人；其次是向罢工工人家属以及这一带的居民宣传罢工的意义，好让他们来支援罢工。如果单就这些工作说来，这是从前就有过的，并不稀奇；但是，这次罢工的性质，以及罢工宣传内容，却和从前完全不同。比如川岸工厂的罢工，已经半年多了，在罢工长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怎样使得那参加了“互助会”的七名罢工者在这反动空气很浓厚的乡村里，很好地坚持下去呢，这工作就显得越发重要了。尤其在最近，又正是我们和那些跟公司勾结在一起的“民同派”进行着争夺战的时候。

第二天，天还不亮，坂井梅就出去了。她跟来到邻村的文工队去接头，过了中午才回来。我们就忙着写起文工队的海报来。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在村子里贴出去。把一张张的旧报纸裁成四块，写上：“有趣的木偶戏！”“硕太的筷子铺”，

① “互助会”，是罢工工人离开工厂之后，为了维持生活而成立起来的一种组织。

“繪画的布吉”、“大木箱!”,还写了幻灯片“吉田一家的全武行”等等的戏名,連会場地点、票价五元等等也都写了上去。因为用的是廢报纸,墨色一淡,有的簡直就看不清上边写了些什么。坂井梅在这件事上很固执,一定要在“有趣!有趣!”之后,再加上一句“有趣得笑破你的肚皮!”我說“有趣有趣”就已經够了,何必要“笑破肚皮”呢,可是她还是把“笑破肚皮”写得老大老大,歪歪扭扭的涂滿了一張紙。

“这个美弥,就是大島美弥子?”

坂井梅数着明天要来的文工队員們的名字的时候,我插嘴問她。

“就是大島美弥子,还有松井、小芳、渡边、柏原,嗯,一共七个人……”

她把笔換到左手里,細心地屈指計算人数。天这么热,她还穿着白上衣和裙子,鼻子上滾着汗珠,她說在“从东京来的人”面前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在我这样的老头儿跟前,她也決不肯只穿一件襪衫什么的。

“那孩子会表演木偶戏嗎?”

“呵,木偶戏,她到底会不会呢……”

她把臉伏在文工队的海报上,用純粹的土話說。

“可是,美弥子在合唱团里呆过呢!”

我对大島美弥子有一个印象。今年四月,天还冷,我在女工宿舍住的时候,見過她。关于她,我在那时写的一篇“寄自川岸工厂”的特写里,写过这样的話:

……晚上，我去看第二宿舍最后边的“工会图书室”。在这过去似乎是一间小库房的、大约有三张草席宽的铺着地板的房间里，有一个玻璃橱，摆着可怜的二百来本书。——当我关上玻璃橱的门要往外走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女孩子蹲在窗边不亮的电灯底下，热心地写着什么。我还记得她那梳着发辫的、胖胖的脸和低低的鼻子的侧面。

“写什么呢？”

穿着红色人造毛毛衣的女孩子，吃一惊似的仰起脸来，可是并没有打算用手掩上她正在桌上写着的东西。

“写给朋友的！”

“嘿。”

“想把这首歌抄给松本市日本蒸气机公司做工的朋友呢！”

她把铅笔插在梳着发红的发辫的头发里搔着头皮，把身子伏在桌上，笑了起来。

“歌谱，实在很难呢！”

桌上放着“贝加尔湖之歌”的歌谱，还有用铅笔抄的象蝌蚪似的五线谱。在这没有玻璃的吹着风的窗旁，这女孩子大概抄了好久了吧。

“呵，先生！”

她用铅笔在抄了一半的歌谱上敲着，用鼻子哼着调子，忽然抬起头来说：

“我写了一篇文章，想往‘我们的伙伴’上投投稿，您给我看看行不行？”

我点点头，她把两手抱在胸前，笑了笑，好象在说，“这可好啦”，然后给我行了一个礼。

“谢谢您——”

——在我作的家属调查表上写着：

这女孩子叫作大岛美弥子，十九岁，小学毕业，长野县諏访市人。一家八口人，除父母之外，有弟二人，十七岁、十五岁，妹三人，十岁、七岁、三岁。在片仓工厂工作一年半，在东芝工厂四年。母亲从去年五月即卧病。父亲原是编席工人，最近没有活儿做，只在家里做做饭或出去买买东西。她每月收入二千三百元，把一千元寄交父亲。母亲不愿她参加罢工，叫她赶快到纺丝厂去做活儿，可是父亲却是能够理解罢工的，叫她和大家一致行动。

这次，我住在女工宿舍的时候，没有遇见她，却没想到她参加了文工队。

“先生，喝杯茶吧！”

当我们写完了四五十张海报的时候，坂井梅的母亲在炉台上倒着茶，把茶杯放在我膝盖前边。她一边把一个三四岁的长得很大的男孩子缚在自己背上，一边说：“这孩子真淘气！”然后，在女儿跟前也放上一杯茶。

“我可不要了，刚喝了一肚子！”

坂井梅粗暴地说。把墨迹已干的海报叠了起来，很快

地收拾了一下。

“村田繁他們，也不來幫幫忙？”我說的是這裏的“互助會”的負責人，她昨天晚上來過一會兒。

“說是要來的，可是聽說阿繁家裏還沒剷第三遍草呢，家裏又養了不少夏蚕！”

這裏的“互助會”也全是姑娘們，七個人里有六個人得下地干活兒。

“那麼，您也準備準備吧！”

“好的！”

“道可不近呵，行么？”

她抱着那捆舊報紙，跳到屋地上，戴上了草帽，回頭笑了一笑就出去了。今天晚上的文藝講演會是在山溝里邊，她還要負責把我領到那裏去。

“了不起，真是個忙人！”

在爐子那一邊的板地上，母親從架子上抽出一盤一盤的蚕盤來，把桑葉放進去。一蹲下來，她背上那已經睡着了的小孫子的腳就觸在地上了。

“有四歲了吧？”

“噯。”

“往後更該忙了吧？”

“這麼一點活兒，算得啥！”

我在爐子這邊平躺下來。外邊太陽還是火辣辣的。翻眼向上一看，在後門口上，無力地下垂着的南瓜葉子的發白的背面，反射着強烈的陽光。系在南瓜棚下的熱得難受的

小山羊，一直在叫着。我很想睡一觉。无论哪里农村的集会总是很晚的，并且到处都是跳蚤和蚊子，这些天来，我一直睡眠不足的。

望着没有顶棚的房梁，在这里我又感觉到，在别处也曾感觉到的我自己处境的微妙。罢工职工的家属——即使家里子女有的是共产党员，那些老人们也并不赞成他们参加罢工斗争，尤其是务农的人家。……坂井家里的人们都出去了，但我有一种被什么东西束缚着的感觉。屋地上的竹子搁板上挂着或放着蓑衣、镬头、空草袋子或种籽口袋。我虽然还记不得这家里每个人长的什么样子，但我从家属调查表上知道：这一家共有两亩五分地，父亲和嫂子下地劳动，大女儿出嫁了，大儿子只在夏季到下伊那的蚕种制造所去作短工，二女儿就是坂井梅了，二儿子是村邮局的邮差，三女儿在上伊那的丝厂做工，三儿子是瓦匠学徒，四儿子是小学生，有一个孙子。——

“罢工，……到底能罢到什么地步呢？”

睡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头顶上有说话声，这是只有老妇人才有的发颤的声音。回家歇晌的父亲，把穿着草鞋的脚，踏在炉子旁边，叼着烟袋，往我这边望着。大概是趁着歇晌的当儿出去采桑叶的吧，那个嫂子正背了一个大竹筐，从矮矮的草屋檐底下走进太阳地里。她的白色的草帽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刺着我的睡意蒙眬的眼睛。

“噢，听说是很大的工潮呢！”

我点着了烟说。我如同在别处一样，在这儿也是这样

的開場白。對於家屬，罷工是值得擔心的事。從家屬調查表上看來，坂井梅每月收入三千五百元（包括這家的長子在內，她的收入是最多的了）。她住在女工宿舍里，每月給家里寄一千元，但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不能給家里錢了；此外，當今年三月下雪的那天（正如東京報紙上所記載的那樣），政府為了對付五百多名罷工者，動員了一千多武裝警察去封閉工廠的時候，姑娘們曾經搖着紅旗唱着革命歌曲表示反抗，所以在这村子里，人們都這麼說：

“川岸工廠的姑娘們，算是嫁不出去了！”

“希望家屬們能夠很好地理解這件事，工會方面也並不願意這樣做！”

我先來這麼一句，接着就說到川岸工廠的罷工，以及東芝工廠所屬的全國四十多處工廠的龐大而複雜的工潮。不過，解釋起這些問題來實在是很困難的。當我到過幾家罷工工人的家庭之後，才知道這些家庭都是不理解罷工的。首先，參加罷工的本人對罷工就沒有充分的理解。其實這也難怪。關於罷工的事，解釋起來倒沒有什麼困難；困難是，對於需要解釋的事情本身，是他們難於体会的。

譬如，東芝工潮的發生，是由于資本家使用了以金融資本的勢力重新組織起來的金融機關的壓力，來進行企業整頓和裁減人員的。正如東京的報紙上曾大肆宣傳的那樣，他們認為東芝公司的大規模解雇，等於對民營企業的考驗，它關係着戰後日本資本主義之能否恢復。這次的大規模解雇，幾乎是由吉田內閣來打頭陣的，完全是政治性的。僅就我所

見到的属于东芝系统的神奈川静岡四五处工厂說来，产品积压的数量非常龐大；积压的产品包括电话机、打字机、誘蛾灯、灯泡、真空管、計度表等等。六月間，我在东芝工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旁听的时候，从他們的报告中知道，在东芝公司所属各工厂的五亿数千万元的生产总额里，現金收入不过一亿数千万元。因此，既然制造出来却卖不出去，資本家的办法当然就是裁减工人縮減生产了。不过，卖不出去，倒不是因为产品过多，而是因为全国充滿了失业者，国民購買力极其低弱的原故。无论电话、打字机、无线电本来都是不足的，可就是买不起。甚至因为誘蛾灯和灯泡等等的不足，都已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如果再制造更大的失业群，先不管資本家怎样，首先就是日本的毁灭。——把話說到这里，倒是任何家庭都能够懂得的。比如在中等以下的农家里，就很少有收音机的；坂井梅的家里不但沒有收音机而且連报纸也沒訂。然而，若再接着說下去，可就不容易被了解了。——比如說到，吉田內閣所講的，如果国民忍耐一下穷困的生活，將來終究会好起来的說法，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如果到处是失业者，农业工业也都衰退下去，国民生活如何会好起来呢！对于日本的出口貿易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吉田却对之并无好感；而对于南洋和菲律宾的出口，又大受外国商品的排挤；即或大資本家的錢袋重新膨脹起来，但因为国民沒有一点实力，結局也只能成为外国的买办資本家而已。这样的例子，在变成了殖民地的其他国家里是很多的。本来，日本的資本家們，

已經在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戰爭中打破了自己的錢袋。資本家應該把個人的利益盡量的縮小一下。產品積壓并不只是東芝公司一家如此，日產汽車公司製造出來的幾千部汽車就都原封不動地在生着紅銹。應該把這些積壓的產品，貸給缺少這些用品的農村、工廠或家庭，然後再繼續生產。這就會減少失業者，可以逐漸恢復農業和工業，國民生活也可以改善，也就能夠償還工廠的負債了。如果不用這種方式，不用不是為資本家個人而是為全體人民的方式，那麼日本必定會垮台。參加了罷工的人們，並不是只考慮自己的命運的。這次罷工不這樣進行鬥爭是不能勝利的……

我就是這樣講的。以我的能力，已經不能說得比這種說法更通俗的了。同時，儘管自己想要說得更通俗些，但事情的本質却不允許你講得比這個再通俗了。能不能很好地理解，也只有靠聽眾自己了。

“嘿嘿，咱可不懂這麼難懂的事兒！”

瘦小的母親，她那因為沒有牙而癟下去的嘴邊上滿是皺紋，偏着從包頭的毛巾底下露出白髮的腦袋。

“噯，不管怎的，好就好壞就壞，早點有個着落才好！嘿嘿。”

父親沉默着。好幾次從嘴上拿下煙袋來，歪着腦袋想說句什麼，可是又叨上了煙袋，兩眼直直地望着滿是灰塵的房梁。他在斑白的亂蓬蓬的頭髮上，整理着包頭布，咳嗽着。

昨天晚上也和這老人談過話，據說這村里的小學和郵局也要裁員了；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村里流傳着這種謠言，

說是“把教員和郵局的人裁掉以後，捐稅就會輕了！”雖然局長還並未公開宣布，風傳原來只不過十二個人的郵局就要裁去三個人。老人的當郵差的二兒子，是戰後才到郵局做事的，所以很是惴惴不安。屬於所謂“破落農戶”的這一家，也在收割之前就被派定要繳出一石九斗的麥子；去年一年就繳了五千多塊錢的稅。老人把嘴上的煙袋取下來，搖著頭，好容易說了一句話：

“嘿，政府要裁去這麼多人，到底要干嘛呀？”

2

我是東芝工會聯合會的文化顧問，我的責任僅是幫幫工會所領導的文工隊或文化小組的忙，給他們在工作上提供一些意見。所以，對於罷工鬥爭的一些中心問題不十分清楚，但是，我知道川岸工會領導上為了合理解決這次罷工，正在想盡各種辦法。工會聯合會也因為川岸等幾個工廠是最早展開鬥爭的，願意即使是單獨的也好，及早解決。無奈資本家卻表示“無意繼續生產”，因而雙方僵持下去，罷工時間越拖越長了。不管國民在感到物資如何缺乏，但對於資本家們說來，“賣不出去”就叫作“生產過剩”，他們表示：就是罷上一年半的工也無所謂。

罷工長期拖下去，文工隊的任务就越來越重要了。這兒的文工隊，如果充分利用人力的話，本是可以編成兩個隊的，現在編成一個隊，是為了隊員們能夠互相替換，以便不間

断地出去活动。文工队以在村鎮上的罢工工人“互助会”为根据地，有时是在共产党或社会党以及文化团体的协助之下，巡回演出的。如果遇到共产党的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那就往往一天只能吃上一頓飯，在农民家里的房檐底下过夜，然后筋疲力尽地回来。

罢工职工的“互助会”組織增多了。我春天来的时候，工厂里作早操时，廣場上还是滿滿的人。罢工者也去作早操。这次，在我住的五天时间里，却只有两天早晨有早操，在分散于女工宿舍的空房間里的罢工組織中活动的人們，只不过五六十个。

随着罢工者“互助会”的增多，“民同派”的势力也大起来了。于是，凡是关于罢工組織的經濟窘迫情况，工会领导上的新的方針等等，往往用不上二十四小时，就能从長野县直傳到东京的公司董事們耳朵里；馬上，村鎮里就会散布起关于罢工組織的各种謠言。因文工队去工作过而巩固起来的“互助会”，不到半个月，又会被“民同派”煽惑得动摇起来。

有一天下午，我在睡午觉，为了躲开西晒的太阳，我几乎把身子貼在工会書記長办公室的牆壁上了。正睡着，忽然被牆那边很多人的吵嚷声鬧醒了。一張开眼睛，心想“出了什么事啦？”馬上就爬了起来。

我自离开东京以来，总是睡午觉的。这間屋子的主人H書記長是沒有蚊帳的。可能是因为H个子小，很宜于盖被子睡觉。只要一睡着，不管跳蚤蚊子，于他毫无关系。我可就是盖不住被子。在臉上盖上一張报纸睡吧，又憋得出不来

气。晚上我就扯着被子和报纸，在屋子里由这儿挪到那儿换地方睡，往往在挪来挪去时，不知什么时候，那没有遮雨板的玻璃窗上就已经发白了……

走到廊下，隔壁的执行委员会的房间里外都挤满了人。和坂井梅并肩站着正往里边看的女书记 I 君，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红红的鼓鼓的脸蛋，更加鼓起来了，她对着我怒声说：“他们这种不要脸的话，真能说得出口！”

原来如此。满满一屋子人，当中一张很大的粗糙的木桌，桌上一边坐着 A 委员长和 I 副委员长，他们的对面坐着敌对的中心人物——“民同派”的大将 S 某和 T 某。这个房间原来也是女工宿舍，铺着十五张没有布边的席子，屋子里别无他物，也没有一点装饰。在这三十多人里边，有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五六个人，其余的是 S 那一派的和罢工互助组织中的有家属的工人。这时，“民同派”正在正面攻击执委会。这里也是朝西，日光直射进屋里来，屋里的人们满头大汗。也许因为紧张，除了 T 某的不平常的高声叫嚷以外，人们是很静的。T 某是个小事务员，总是穿着黑西服，是一位所谓的雄辩家。他三十五六岁，前额奇异的突出着，鼻子发红而且很大，陷下的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他的眼睛好象总是在看半个东西还没有看得完全的时候，就赶紧去看另一件东西去了。

“你们看看我们这倒霉相罢！从二月到现在半年多了，我们不知道执行委员会怎么样，我们可是连可以当的东西都没有了！”

他的滿是血絲的眼睛，从低着头的 A 的前額看到在 A 身后靠牆站着的我，从我又看到走廊下边的人，一个一个地看了一圈儿。在 A 委員長的对面，把臂肘支在木桌上的 S 某，好象一切話都讓 T 某一个人去說，他只在紧要关头才发言。剛才我听他說了几句，他的意思就是叫現在的执委会讓位，因为公司方面表示过：只要不是赤色执委会，就同意进行商談。S 某的职业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他不时地斜着眼睛看我。在我写的“寄自川岸工厂”的特写中，关于 S 我写的是“性情不易了解”“秃头頂的五十岁男子”，但現在我是清清楚楚地“了解了他的性情”了。秃秃的額角上浮起粗大的青筋。吊眼梢的閃爍的眼睛，尖尖的鼻子，这是一种只要見過一次就很难忘記的臉。

“人家都說共产党不到九月革命^①成功，是决不停止罢工的！可是，要叫咱們給共产党当垫背的，咱們可受不了呀！”

T 某又叫了起来。在 S 的后边有人叫了一声：“对呀！”这个把腦袋紧貼在牆上仰着臉，伸出两条腿，穿着軍衣的四十来岁的 F，是一个公开的“民間派”，也是一个手艺滿不錯的鉗工。連我都知道他曾在罢工一开始就跑到別的工厂去賺了一笔錢。有一个老头子，把臉放在支起来的兩膝中間望着，那臉上的神气好象在說：“可不是我說泄气話，真有点受不了啦。”在这各式各样的二十儿人里，有一多半并不

^① 9月革命，1949年日本反动政府为便于鎮压工人运动捏造謠言，說是日本共产党要在今年9月发动武装革命。

是什么“民同派”，而是罢工工人“互助会”里的人们，他们是代表罢工工人来诉说生活的困苦的。

A 委员长的因汗水浸湿而发黑的襯衫后背，正朝着我这边，他低声地一一回答着他们。这人三十四五岁，也许因为身材魁伟，人显得很稳重。他讲着如何为了从速解决这个斗争而采取了各种手段，如何处理因斗争的拖长而招来的生活困苦。他说他自己，不用说早已没有了可送进当铺去的东西，他老婆是带了两个很小的孩子，在岡谷市的职业介绍所当日工，一天只挣二十块钱。至于共产党究竟说过“九月革命”之类的话没有，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要是把川岸工会执委会跟共产党混为一谈，那是不对的。现在的执委会是每年一次的大会选举出来的，因此在这里谈现在的执委会的去留问题，是没有意义的。——A 说了这些之后，轻轻地仰起头来继续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作战计划马上就会传到公司的耳朵里去呀！”

听见这话，S 的尖鼻子就突然转到另一边去了。——公司正在用“回家休养”、“调动工作”等等名义，要裁减去一半职工，我相信在裁员的这个阴谋里，S 一派似乎是和公司当局已成立了某种密约。

“民同派”的攻势，也就正是公司方面的攻势。“民同派”和现在的执委会的斗争，是一直在继续着的。以前有一个叫做 K 的高级职员，就是“民同派”的大头子，他在某次非常紧急的问题上，被工人们揭穿了，工会把他开除了。工会

开除了他，公司却喜欢他，他终于住进公司附近的住宅，作为“民同派”的幕后人，他和村议会以及镇上的有权势人物勾结起来了。从现在他们已开始了正面攻击这一点上来看，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把多少罢工者的“互助会”偷偷地拉拢过去了。我虽不大了解详细情形，但那一天他们确是公然地进攻了的，可是后来也并未发生其他新的情况。在第二天的每月例会上，也还是作了同样的进攻。

这些日子，一直是好天气，也一直很炎热。九点钟开始的大会，有工会联合会代表的报告，执委会的报告，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还有我的致词；到了讨论议题的时候，已是西晒的太阳晒得人发昏的时刻了。在工厂食堂里开的这次例会，“互助会”的人也都不辞辛苦地参加了。比起春天的时候，人少了一半，但也有二百四五十人。讲台左边的屋角上是妇女们。后边正当中有三四十个“民同派”，其中就有T某和昨天的那一些人，造成了一种不平常的气氛。出席大会的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有号码的红色的决议票，有的帽子上搭一条毛巾垂下来挡太阳，有的为了躲开西晒挪动着椅子，使得屋子里空出一大块地方。S来得很晚，慌慌张张跑了进来，就奔到后面那伙人堆里去，弯着腰跟这个那个贴着耳朵喊喳一阵。这是很露骨的挑战。然后又提着木屐跑回走廊去，接着又跑进来喊喳一阵。——走廊上有两个穿守卫服装的彪形大汉，在走来走去地监视着会场。

“我先谈结论：这就是，我要批评现任的执委会！现任执委会是没有能力解决罢工问题的……”

T某从那伙人里站了起来，一左一右地摇摆着身子嚷了起来。一刹时会场里紧张起来了，扇子和帽子都不动了。他那一向充血的眼球乱转着，高声叫嚷。說的内容和昨天的一样，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倒很会装腔作势。在他的周围，象一阵风似的不时响起掌声，也有人叫着：“对呀。”在讲台下的执委会人员逐项驳斥了他所說的話，但他一直就那样站着，叫喊着。有人举手要求討論“議程”，他就大叫道：“我正在发言！”据我看，他們是打算一下子把会场的空气控制住，于是立即提出改选执委会的动議的。T某的攻击只在“赤色执委会”和“共产党的九月革命”这两句話上兜圈子。会场的特点是妇女占半数，这是最有利的一点；可是就在这妇女席的一部分人里，那些罢工以后似乎就在田地里做活的、晒得黑黑的姑娘們，却显露出一種犹疑迷惑的眼神。如果說是危机，这一瞬間可以說是最危險的了。这时候，执委会席上的人們都站起来了。

“現在接到了—一个紧急情报，因此执委会要用十分鐘的时间去討論—下，大家同意嗎？”

主席的这句話，使后面的那些人們有好些伸長了脖子。在不—安的空气里，有很多人嚷着“同意”。T某一个人却忽然站起来忽然蹲下去的叫着“不同意”。可是，执委会的人們不到五分鐘就回到执委会席上来了。I副委員長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小个子的技术工人的I君，是不善于演說的人。他有点羞澀似的笑着，小声說着。可是，他的演說的内容，却使得整个会场屏息靜听。他說，根据情报：T某

在某月某日，和現在在場的另外一個人，曾在東京與公司的某一董事會面。曾在某月某日一個人拜訪過公司的幹部。又在某月某日去過靜岡，和脫離了工會聯合會的“民同派”F 工廠工會幹部會見並且協商了什麼事情。——這時T某還在站着，從四面八方投來的視線，已經使他無法坐下去了，只好彎着腰站在那裏，亂轉着他的凹陷下去的眼珠子。

“執行委員會討論了是否要發表這個情報，結果是決定發表了！剛才T對執委會的攻擊，正象近來的報紙一樣，是充滿了惡意的。這一點，我想凡是嚴肅地進行着鬥爭的各位工會會員都會注意到的。當然，執委會必須經常地接受批評，但是T的發言，並不是什麼批評。”

I用很溫和的語氣說了這些話。他側着頭好象在思索着什麼似的，然後又抬起臉來說：

“執委會希望諸位來判斷這個問題。此外，關於這個問題，如果T先生同意的話，我們也準備公布更詳細的內容，並且也可以請供給這一情報的人到會作証！”

會場響起了要求發言的喊聲。我向“民同派”的頭子S那邊看去，他的突起着青筋的禿頭向前伸着，又慌忙彎下腰去和別人耳語着，又抬起頭，他那尖鼻子向兩旁扭動着。會場里，發言的一個接一個，不等正在發言的人把話說完，就又揚起了一片憤怒地要求發言的叫聲。這時T某已經改變了一下姿勢，他站在那裏全沒把主席放在眼里，就直接回答發言者的質問。

“是的，我承認。可是這沒關係，我們不能只靠着鬥爭

吃飯呀！難道生活不是頂要緊的問題么！我是為了這個才……”

在憤怒的叫聲和罵聲里，這很明顯是對他不利的，馬上就會被開除出去，但 T 某似乎準備堅持到底。我想，這樣的情報大概也已經是不足為奇的了，在工會聯合會這樣大的組織里，象這樣的情報是會立刻就掌握在手里的，現在只是為了把這根刺拔掉，才把這情報公開的。我正這樣想着，忽然注意到，執委會席上的 A 委員長一邊望着會場，一邊對身旁的 H 說着什麼；我順着他看的方向望去，果然 S 某已經連影都不見了。F 等兩三個人也在打算退席，站了起來。書記長的 H 君，手里拿着木屐從我身旁走過去，就從窗口跳出去了。我也跟着他跳出去，我到底年紀大了，跳是跳出來了，可是食堂的窗台太高，把屁股頓了一下子。

“趕快，趕快！K 已經騎自行車走啦！”

我一跛一跛地跑回書記長室的時候，在朝着工廠廣場開着的窗子下邊，坂井梅和一個也是在廠外鬥爭部工作的名叫 A 的女孩子，正從窗子里探出身子來，搖擺着，喊着。K 就是前邊說過的那個高級職員，那個幕后的主謀者。

“我騎車子追去！”

II 一邊往身上披着舊軍服上衣，一邊從走廊跑向存放自行車的地方。女書記 I，正蹬着窗台系着帆布鞋的鞋帶，一個叫 Y 的青年，從走廊上走了進來。

“我往哪儿去呀？”

黑黑的、大個子的、二十二三歲的 Y，是木曾谷人，因

为是文化部的工作人員，所以我認識他，平常就总是慢騰騰的。

“你怎么那么糊里糊涂的！”

系好了帆布鞋的 I，做着要从窗台跳下去的姿势，一边隔着窗子生气地叫着：“到上諏訪車站去！”

“上諏訪，太远啦！”

三个姑娘并着肩，从廣場上往便門那边跑去。又有一个青年从廊下跑进来，催促着 Y，也从窗口跳出去了。

太阳移动着，廣場上出現了阴影。我走到廣場角落里一叢楊樹下一望，看得見工厂后边的天龙川上的桥。桥的那一头是一段一段的梯田，村里的农家在林叢蔭影的掩盖下，看不清了。这时，桥上出現了糾察队姑娘們的背影。大头目的 K “騎車跑了”，这就意味着“民同派”的下一步的行动。糾察队大概就在追踪着他們。我回过身来，見工厂食堂里的大会还在进行着，不过講台已經移到工厂的一边去了。

3

开过这次例会以后，已經一个星期。F村青年会主办的文艺講演会的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經是正午了。蚊香已經燒完了，香灰从灰皿里落到代替席子的紙皮上。这家农家也沒有蚊帳，关上风雨窗，空气悶热得透不過气来。我朝上望着房梁，在腦里浮現出昨晚在講演会上、一个穿着淺色襯衣扎着紅領帶、嘴角发白的青年那不愉快的臉。

講演会开始的时候,是十点,下半夜两点才完。和坂井梅两人回到家的时候,已經三点多了。我談的是文艺,当偶然接触到“下山事件”^①和“三鷹事件”^②的时候,发现有不少听众很感兴趣的样子,所以就講得多了一点。关于“三鷹事件”,我是在川岸的农家里在报纸号外上讀到的,真相知道得不多,所以只是談了一些感想。而听众显然是分成了两派。这里只是青年集会的地方,在草席上摆着長長的条桌,有一半是青年妇女,另一半是青年男子,后边有一些老头子們站着或坐着。听众的意見一分成两派,那个穿着白麻布單衣的青年会会长,和穿着翻領襯衣的文化部長,两个人就离开了座位,到角落里談話去了。坐在我右边的一直都是很有禮貌的妇女們,也往他們那边望着。左边的男子們和后边的老头儿們对我說:“先生,过些时你換个地方,再給我們講一遍吧!”这里的文化部是比較进步的,我听說他們曾反抗过村議會給青年会規定的“不許談政治”的規章。这时,三十几岁的、穿着白色麻布單衣的、長長的臉很有男儿气概的青年会长,很快地走到我跟前,立刻又轉过身去坐下,和妇女們談起来。穿翻領襯衫、光头、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文化部長,在左边角落里被两三个似乎是干事的青年們圍住,在

① “下山事件”,正当大量裁减国有铁路員工的1949年7月6日,日本国有铁路下山总裁突然被杀,日本反动政府認称是工人干的,直到今天尚未破案,据說这是美国特务干的勾当。

② “三鷹事件”,1949年7月15日,日本反动政府为了鎮压工潮,制造出来了“无人电車突然开动因而死伤数人”的事件,事后他們認称是工人所策动的。

爭論着什麼。我從他們身後走過去的時候，那個系着美國式紅領帶、穿着淺色襯衣、個子細長顴骨很高的黑臉青年，正向文化部長伸過他那頭上抹着油的腦袋，一邊用扇子敲着手掌，一邊說：“這是怎麼回事？那傢伙不簡直就是個赤化分子嗎？”

也許是我講得還有些生硬，不過也確實是有一些傢伙是專門來找麻煩的。

走到爐子那邊，從地里回來的父親和嫂子，正在吃午飯。我問“坂井梅呢”，母親就一邊叫我吃飯，一邊說是一早起來，她就到公共汽車終點站去迎接文工隊去了。雖說是鄰村，如果不爬山過去，就得繞很遠的路。從伊那電氣鐵道的 I 車站乘公共汽車到終點站要三四十分鐘，由這兒到汽車終點站，大約還有一里路遠。

“好容易演一回，不下雨才好！”

父親一邊喝着飯碗里的開水，一邊自言自語地說。破舊的餐盤上邊，放着一個大碗，盛着橘子皮和辣椒切碎了拌在一起的醬菜。他用筷子夾着，已經沒有多少牙齒的嘴咕咕嚕嚕地嚼着。老头子雖然不贊成女兒所干的那些事情，但他對木偶戲可是很有興趣。

“早晨，西駒山上滿是雲彩呢！”

這一帶叫作西駒山的山，比一切山峰都高，象一面大屏風似的，擋在草屋前邊，望不見山頂。我想着，今天是这样晴朗的天氣，不會下雨的。正在望着山的時候，忽然人影一閃，進來了三個在這兒沒有見過的人。

“我們是××机务段的，最近讓他們裁下来的……”

每个人都背了一个空火油箱，先走进来的一个，摘下了白色小帽，这样說着。这人年約三十左右，穿了一件被汗水浸得发黄了的襯衫和国营鉄路的制服褲子，这褲子被尘土弄成了灰白色。

“不买点糖嗎？五元十元都行，比市上卖的便宜三成！”

他直直地站在地上，眼鏡在黑而瘦的臉上閃着光，說話很直爽，但由于不熟悉而有些羞澀的样子。

“买点糖怎么样！买五块钱也行呵！”

老头子好象是五块钱也拿不定主意，于是把目光轉到炉子上去，母亲嘴上浮着微笑沉默着，穿襯衣的那个人把背上的火油箱向上推了一推，又說了一句，搔了一下头皮，低下头去。接着一个穿着国营鉄路制服上身敞着胸的二十二三岁的青年，走了进来，也脫下帽子，說：

“糖，可是很好的糖呵！……”

他抬起头来，从他那光头頂的腦門上流着汗水，突然高声地說：

“……我們是被吉田內閣裁掉的。被裁下来的，全国不知道有几万人！”

他的臉，下顎寬闊，很有精神。一只手把制帽按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时地向前伸着。大概到处都这样講过了，声音已經嘶啞，說“是”字的时候，听来好象“刺”字的音了。他用力地說着，嘴里噴着唾沫。

“你們农戶繳的粮食那么不值錢，我們讓他們裁下来，

这全是吉田內閣的卖国政策! 我們……”

他說的話, 几乎跟我昨天對他們一家人說的話差不多, 我覺得好笑。坂井梅的父親只是望着伸到爐子邊上的穿着草鞋的腳, 從嘴上把烟袋拿下來, 也用和昨天同樣的表情听着。

“實在多謝!”

我拿出兩三張十塊錢的紙幣, 年紀大一些的戴眼鏡的那人, 把火油箱放在門檻上, 數起糖塊兒來。因為天熱, 糖塊都軟了。

“你們這是從哪兒來呀?”

母親從炕上下來, 把一大碗咸菜放在門口, 一邊問。已經停止了演說的青年答道:

“昨晚在 S 村住的。”

“那麼, 是爬山過來的啦!”

母親捧着藍色的水罐, 很佩服的樣子。站在房門口的另外一個人也拿着碗走過來了。正在和父親說着什麼的那個演說的青年, 這時蹲在地下仰着臉說:

“對啦, 我們非得打倒吉田內閣不可!”

××機務段是在鄰縣的, 他們似乎是曾經用了好些日子訪問了一戶一戶的農家, 然後才轉到這兒來的。那個年紀較大的穿襯衫的青年對母親說: 想要由這兒到 N·F 去, 不知道怎麼走法。父親代替母親回答說, 由這條村道向前走就到了 F 嶺, 在嶺上就看見天龍川了, 那時再往東去就行了。他這麼說着, 又站起來, 走了出去。

“多謝，多謝！”

三个人背上了火油箱，走进大太阳地里。不一会儿，从下边的道上傳过来父亲的声音：

“要在太阳下山以前赶到 N·F，可够呛的！”

父亲回到屋里来，好象被什么感动了似的，一直背着两只手，站在那儿。在鋪着地板的房間的暗处，母亲帮着嫂子，給那些从昨天起就都已仰了头的蚕喂桑叶子。她歪着从毛巾下露着白发的头，脩下去的嘴的四周浮着微笑，在这笑容里有一种不知是听天由命还是謙卑的东西。——因为外汇兌換率的变化，去年的秋蚕生茧还是一千一百元一貫^①，今年春蚕就落到七百六十元了。

“到底会怎么样，象我們这种人，是啥也不懂的！”

不管我問什么，母亲总是这么回答我。一看就知道是很能干活的、臉色黑黝黝骨格很大、眼睛很美的嫂子，从高架子上取出蚕盤来又放进去，更是一句話都不說。

这时，在土間里的父亲，忽然走到門口去了。剛才我就断續听見走了調的喇叭声，是用力吹着的，可是調子不对，怎么也不协调，这喇叭声是怪里怪气的。

“来啦，来啦！呵，到底来啦……”

忽然土間里一亮，穿了白裙子的坂井梅，滿臉大汗的闖了进来。嫂子和母亲都来到土間里。我也跑了出去。在山下的桑田里，在尘土飞揚烈日当头的大道上，有的拿着木

① 日本的一貫，約合我國的一百市兩，即六斤多些。

偶，有的肩上挂着手风琴，有的拿着小鼓，一共七八个人，被村里的孩子們圍拥着，走了过来。

“呵，我第一！”

拿着喇叭的、个子很高的渡边，先跑进来。接着，又有两三个人跑上来就倒在房檐底下的裸麦捆上了。两手拿着木偶的松井队长，和一个叫作小芳的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向父亲母亲问着好。满脸通红流着汗的大岛美弥子，从腰上解下小鼓的皮带。她一眼看见我，就张大了眼睛：

“暖哟，是您哪！”

她好象是在什么奇怪的地方遇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笑都不笑，只是看我，忽然又给我行了个礼。还是和从前一样，个子矮矮的，鼻子低低的，短短的下颏儿；只是比从前晒黑了，瘦了一点，象个大人似的了。

“会打鼓啦？”

“正在学呢！”

她瞪着圆圆的眼睛，认真地说，然后就一瘸一瘸地到屋檐底下的麦捆上去，想挤个地方坐下来。几个人穿的都差不多，她是特别一点，穿了一条不知是什么布做的红色长裤子，裤脚上都让尘土弄白了。穿着在背上系钮的茄紫色的工作服，全褪色了。

“你让开点，我脚痛呀！”

她脚趾上扎着绷带。拿喇叭的那个叫渡边的年轻人，个子虽长得大，也不过十九二十岁的样子，他把脚蹬在麦捆上，怎么也不动。

“不讓你坐，不讓你坐！”

那里除了小芳以外，都是些男孩子。惡作劇的渡邊的嚷聲里夾着別人的笑聲。

“這兒，我有優先權呀！”

大島美彌子差點兒被擠到麥捆下邊去了，她氣得跳了下來，甩着兩條小辮子，對他們嚷道：

“毛澤東同志說過——”她紅着臉有力地說：“——要愛護女同志……”然後用勁地坐到原來的地方。

“請說，毛澤東同志什麼時候說的？”

在大家的笑聲里，大島美彌子還是氣得板着臉坐着。

這個房檐低得幾乎要觸到地上的小草屋忽然亮了，坂井梅和母親，把準備好了的醃胡瓜和茶壺什么的拿到檐下來了。父親偏着纏了一條頭巾的頭，眯着眼睛站在房檐底下。這時空出一個位置，大島美彌子躺了下去。父親看見她脫下來的木屐的趾襪兒已經鬆了，就悄悄地拿了起來，翻過來看了看，拿進屋裡去了；過一會拿出來的時候，已經給換上了一個新的，悄悄地放到大島美彌子的腳底下了。那女孩子已經天真地微張着嘴，一只手掌托着臉蛋兒睡着了。在鄉村里巡回表演的文工隊，睡眠的時間是很少的，這個年紀頂小的姑娘大概是太疲勞了吧。……

“一，二，三，”

一個多鐘頭以後，因為一會兒就要在這一鄉的一個最大的村落里表演了，七個人就在房前站了一個大圈兒。樂隊隊長是小芳，她姓什麼我已經忘記了。是個矮矮的、腰很

粗的女孩子，还穿着从前在絲厂做工时穿的茄紫色的工作服和白裙子。她举起两只手指向下一揮，大島美弥子的小鼓就最先响了起来。布隆冬，布隆冬，——她打鼓打得很好，两条小辮子搖摆着，抬着眼睛用心地望着指揮者的手，打着鼓。渡边的喇叭响了起来，不知叫什么名字的低音的喇叭也响了起来，手风琴也响了起来，文工隊長松井在吹着口琴，虽然是乱凑起来的乐器，但經過了很好的練習，所以也演奏出了由乱凑起来的乐器所能演奏出的最好的音乐。奏着“晴朗的五月”、“紅旗之歌”、“国际歌”等等乐曲。——从谷底下上来的戴草笠的人，在麦秆編的帽子上还蒙了一块手帕的人，都出現在桑田和田壠上了；路上背着竹籃的姑娘，手推小車的老头儿，从自行車上把一条腿垂在地上的青年，都停下来听。——从来不曾震动过村里空气的輕快明朗的旋律，这时震动在梯田、杂树林和山谷之間……

文工队走的时候，我也混在孩子群里跟着走。松井一只手上举了一个叫做“頓太”的木偶。木偶是个卖竹籃的老板，身上穿着短大褂，包着头巾，有一个大而紅的鼻子。来到十字路口或是人家較多的地方，他就从胸前取下扩音筒，来一番“宣傳”。太阳还很高，走过了一处有五六家人家聚居的地方以后，好大一会儿，都是在水田或旱田之間尘土很大的小道上走着。渡边鼓着流汗的两腮，向天吹着喇叭，松井叫喊着：“諸位，今天晚上，八点鐘，請到农会的二楼上去！”可是，从远远的树林那边，只有回声和悠長的鸡鳴来回答。

这时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背上背着小腦袋在顫动

着的嬰兒，從水田的土堤上朝這邊跑來。另一個象是弟弟的男孩子，渾身是污泥，拚命地追過了她，也向這邊跑過來了。但是文工隊並不是到處受歡迎的。當這一群脖子上圍着汗水浸透了的毛巾，穿着又髒又皺的褲子，渾身泥土的人們從一條小溪旁邊走過的時候，兩三個正在洗衣服的婦女住了手看着，我听她們在我身後說：

“罷工，罷工！呸！”

“那個小丫頭，算是干啥的！”

我們來到一家有圍牆的農家門前，庫房前邊的場園上，有一口安着水車的水井，兩三個隊員就跑了進去討水喝。庫房前邊的蔭影里，站着一個大概是被喇叭聲叫了出來的老太婆，她拄着拐棍，頭髮白了，可是長得胖胖的；還有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似乎是這家的媳婦，往我們這邊望着。那個一臉不高興的老太婆，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在一個吊桶里喝完水的兩三個隊員，就一邊擦着嘴，一邊說着“對不住，對不住”地逃出來了。大島美彌子是最末去喝水的一個，她把小鼓放在盛开着浦島草花的牆腳下，站在井台上，不知如何是好地望着老太婆的臉，說了一句什麼話，就立刻跑過廣場，走進看來極寬敞的屋里，拿出一個水甕子來。老太婆一見就用拐棍咚咚地敲着地，大島美彌子垂着下嘴唇，越發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又走進屋去，抱孩子的女人也緊跟着走了進去。這回大島美彌子是拿出了一個鉛鐵碗來。

“真髒……小丫頭！”

她喝着水的時候，這個壞脾氣的老婆子，搖着腦袋，氣

得鼓鼓的說。喝完水，把碗送回屋里，大島美弥子还是窘得臉上通紅；拿着系在褲帶上的手帕擦着手走过来时，向老太婆和那女人赶快地行了个礼。她那样子很难过，好象就要哭出来似的。她又朝着那还在唠叨着什么的老太婆看了看，然后突然扭过头来，高声地喊了起来：

“今天晚上——八点鐘——，請諸位——不論大人小孩，都来看——有趣的木偶戏呀——”

她从拄着拐棍張着嘴的老太婆那儿，紅着臉回到牆跟前。她沒有注意到我在看她，急忙扎上小鼓的皮帶。这时，我看見在她正低着头的臉上，不知是大粒的汗珠还是眼泪，在往下流着……

4

真讓坂井梅的父亲說中了，从傍晚起，隔一会儿就刷刷地下一陣雨，这是山里气候的特点。到农家吃完晚飯以后，約有九点鐘的光景，农会的楼上人已經滿滿的了。本来只能容一百五十人，可是来了三百多，从走廊到楼梯挤得水泄不通。“互助会”里的七个姑娘里，有五个帮忙招待。

主持演出的乡村党支部人員，和远远地从伊那来的党地委会的委員們，把場內的秩序維持得很好。小孩、老人讓在前边，青年們和中年人讓在后边，如果招待得好，乡下人是很听話的。开始由党支部 M 同志致詞，接着我就以工会联合会的立場講了講川岸工厂罢工的事。然后是演出音乐

节目。戴着鴨舌帽的 M 同志，很惹人注意，他的十分質朴的致詞，很受欢迎，这与其說是因为他是共產黨員，倒不如說因为他是农民中間的一个，大家都熟悉他，所以才更愛戴他。

“那么，諸位，大家在一起唱一个，請——”

当文工隊員們站在幕前，奏完了“晴朗的五月”和“劳动之歌”，正要演奏民歌的“木曾曲”和“伊那小調”的时候，拿着指揮棒的小芳，忽然轉过身来对大家这么說。

这时，因为身材矮站在前边的大島美弥子，和那些头上扎着手帕的隊員們，一齐向前傾着身子，用手脚打着拍子，开始唱起“木曾曲”来了，果然听众里也有人和着唱起来。这是因为在川岸村演奏“外国歌曲”失敗了，大家进行了自我批評之后就改变了方針，演奏起日本民歌来了。圍着汗水浸透的毛巾，穿着骯髒打纒的褲子的隊員們，現在是能够与听众的朴素的心情相通了。沒有酒，也沒有伴奏，可是大家都齐声唱起来。白发的老太婆搖頭拍手唱着的歌声里，混进了老头子們漸漸粗大起来的声音，歌声在全部观众里展开了。顿时，舞台上和观众之間打成了一片。我也一边唱着，一边望着周圍的臉，忽然感到一种要流泪的心情。搖动着白发的头，拍着多皺的手，快乐的老太婆們的臉；小燕子似的張着口，仰着头唱着的孩子們；最初有点拘束，漸漸就把手按在盤腿的膝蓋上；仿佛要用他們粗大的声音压倒一切声音的老头子們；这些人已經把舞台上文工隊員們的声音压下去了。歌声好象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下，現在偶然地涌上来，在这里会合在一起了。好象是有一种几百年来，

不，几千年来就被遗忘了的什么东西，在这时突然显露出来了。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喜悦，而是为了大家都这样地在一起，大家都这样地活着而喜悦。在这一瞬间，使人感到了，这喜悦是从什么遥远的遥远的地方，被召唤回来了。

頓太的簍子鋪呀，尽管你来买……
酒簍子，醬簍子，还有醬油簍子……
……………
咚咚咚，咚的咚的咚。

合唱以后，“頓太的簍子鋪”接着上演了。在伴奏和歌声里，叫做“頓太”的木偶和叫作“小东西”的狗，在一面窗似的幕上出现了，这一出戏就这样开幕了。围绕着那个“簍子怪物”，善良的工人——布吉出来了，红眼睛的警官出来了，白头发的、脸象个茨菰似的和尚出来了。这些人物的动作和言语越是滑稽可笑，就越把现实社会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会场里的笑声越高，全场情绪也就越高涨。頓太、布吉、警官 正因为都是些木偶，可以任凭每个不同的观者，根据他们的思索和思想，把它想得更深刻，更复杂。只要文工队员们集中精神，互相配合得好，那么即使表演技巧不高，也总是能把观众的情绪带到最高峰的。

节目的顺序是“頓太的簍子鋪”、“绘画的布吉”、“大木箱”。狗的吠声，资产阶级的怪叫，妇女议员的“是呀是呀”的尖叫，在舞台上响起来了。——我是完全不懂演剧这一套

的，借着职务的名义我常跑到后台去看看：有时学狗叫的松井，仿佛想去舔舔骯髒的地板似的，四肢着地，額上青筋突起，汪汪地叫着。有时是渡边一只手动着木偶，一只手捂着脖子，学着肥胖的資本家的怪腔怪調，弄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有时扮“女議員”的小芳，用手掩着工作服的兩襟，甚至扭动着粗粗的腰，噙着她的小嘴，“咯咯咯咯”地笑着。大島美弥子是从开始到完結，都是一只手上拿着脚本，給忘掉台詞的演員提詞，另一只手忙着敲木桶底，发着拟音，或者帮助拿要出場的木偶，或者去拉幕。为了吸汗，他們全包着头巾，甚至在两只手都忙着的时候，就用脚动作，就这样在又热又窄的小地方，拚命地干……

在換节目的当儿，有被裁下来的邮局代表和从苏联被遣送回来的人們講話。二十五六岁，穿着黑制服褲的邮局代表，只顧揩着头上的汗，几乎沒抬起臉来，当他把用全国邮电工會長野县支会的名义写的东西念完了以后，立刻就下台了。也許是因为不习惯，又是和到会的人們早晚常見面的，所以特別害臊。观众的臉上呆呆的。有人放下了烟袋，張着嘴；有的歪着头仰望着；有的把下頰放在怀里孩子的头上。这倒不是因为听不懂他念的东西，而是因为“要是把学校和邮局的人裁下一批来，捐稅就会減輕了”这个反宣傳，正象一枚楔子一样打在他們心里，而且現在显露在他們的臉上了。所以，在这里不管你多么善于講話，不管你說多少遍“不对，不是这样”，恐怕他們也不会表示态度。把他們束縛得紧紧的新的現實和旧的現實，在他們心理上是根

深蒂固的！这从他們的臉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是幻灯“吉田一家的全武行”。从黑暗里不时响起掌声，掌声象拍打袜底尘土似的响着。这是东芝工会自己創作的，是文工队的压軸戏。他們已經演得很熟練了，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就是这故事的主角。喇叭声，大鼓的爆裂似的响声，男声和女声，以及突然的合唱。三月，下雪的日子，一群警察从川岸工厂的后山上蜂拥而下，一直闖进了工厂的这一景，一直保持了五分鐘的靜場；于是从黑暗的各个角落里，响起“国际歌”的歌声。那些說过“沒人娶川岸工厂的姑娘”的村里的人們，在銀幕的返光之前，几乎屏住了气息。

“諸位，如果方便的話，請留下开座談会！好給文工队一些批評，也談談川岸工厂罢工的事……現在，虽已快到十二点，住得近的人請……”

在观众站了起来的时候，松井隊長站在台前，仰着戴眼鏡的臉，用嘶啞的声音喊着。人們从唯一的樓梯口往下挤着，一边走着一边談論着。——不用說，大部分人是为了娱乐而来的，这些人們一边談着“很有意思”，或“不很有意思”，一边往家走。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会覺得是“看見了沒想到的东西”的。人們的兴奋，似乎还殘留在那些散乱在會場上的紙片和烟灰皿里。党支部的同志在收拾舞台，坂井梅在用力地打扫着空敞的席子……

文工队这种工作，到底是从何处开始出現于世界上的呢？——雨早住了，从我背后的窗子，可以望見悬在山頂上的星空。座談会在进行着。最初有五十几个人留下来开会，

可是到后来，連那两个特为从 S 村爬山过来，給文工队提了很好的意見的青年也回去了，現在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大家正向文工队提出要求，或者向苏联遣返回来的人提出問題，从“下山事件”又談到了“三鷹事件”。排成一列坐在那里的文工队員們已經疲勞不堪了，松井和小芳等还在坚持着。靠着楼梯口欄杆坐着的大島美弥子，把两手放在膝盖上，不时地張开沉重的眼皮，立刻又閉上了。这时，听見了从什么地方傳来的雞啼声。但她們还必須乘明天的第一班公共汽車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当我望着大島美弥子的下唇在低低的鼻子下边漸漸垂下去的側影时，我仿佛看見了在斗争中前进的世紀里，正在产生着难以想象的而又不可抗拒的东西。

“先生，您說——”

这时，坐在牆角里的一个中年人，忽然对我說起話来了。这人四十五六岁，穿一身旧軍裝，在盤腿坐着的两膝之間，放着一个仿佛小学生的書包似的大背包，黑黑的臉上的凹眼睛，一直向下看着。正在磕着烟管的那只手，和憔悴的絡腮胡子的臉，一見就知道是个农民。从昨晚起，無論在青年会集会上，或后来把会場改在寺院的大殿上，他总是跟大家一起，总是在角落里以同样的姿勢坐着，沒听他說过一句話。

“——咱們，嘿，也想到是这么一回事！”

他大大睜着凹下的眼睛望着我。当他的胡子跟厚重的嘴唇一起动着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人們都感到震动了。他

們一直都在兴奋地高声談話，一下子停下来了，都看着他。大家都在談着“下山事件”，但都立刻就明白了在这个农民的話里，却并不是只談这一件事。

“——是的，所以报纸这种东西……”

年輕的区委，很快地插嘴說。接着是村支部的 M 也說起来。看样子，他們好象是對待一块好不容易才轉动了一下的沉重的石块，想趁勢把它抬起来。这时，这个沉重的石块，却害臊似的閃动着眼光看了看他們，又轉过来望着我的臉，說他自己要說的話：

“我虽然也那样想过，可是，嘿，只有我一个人那样說，人家把我当混蛋看……”

哈哈哈哈哈，——突然，大家都笑起来了。直到現在总是沉默着的老人和青年們，也好象是从心里揭去一个盖子似的，笑了起来。村支部的 M，似乎很了解这人是哪一村的、是怎样的人，所以他的笑声也最高。大家越笑，这个黑臉的中年农民的臉上，也就越发認真越发有精神了。——这是一点顧慮都沒有的，有价值的发言。虽然是很小的村落，但也是压着重重的石头的。如果有誰要說出想說的話，那就会受到很重的伤害，而結成沉默的瘡痍。現在，这瘡痍脫落了。笑声是溫暖的，包含着复杂的情感。有誰插进一句簡短的話，笑声又繼續起来了。

有了反应了，这是文工队工作的一部分成績——我这么想着，一边看着大島美弥子，她忽然好象很吃惊似的睜开了眼睛。那样子就象是一个正在睡着的小狗儿，忽然听到响

声立刻耸起了耳朵。她一直是把脸贴在栏杆上向下看着的，这时忽然站了起来，往楼下走去。因为离我坐的地方很近，我也跟她下去了，在楼下传达的桌子那儿，坂井梅被五六个青年围住了。临时安装上的百支光的电灯已经灭了，周围黑黑的。穿着白衣服的坂井梅一边抗辩着，一边向后退。好象是由哪里回来的青年们，喝得大醉。昨天晚上那个穿浅色襯衫的高个子青年，把襯衣垂在裤子外边，得意忘形地拿着一把纸伞，穿木屐的一只脚踏在正堂门口的地板上。

“你们说是木偶戏，可是召集一些人开会，哼！”

那边，一个穿白浴衣戴眼镜年纪大些的人，正在说着“算了，算了，”在阻止他们。当坂井梅急忙转过身往回走的时候，穿襯衫的家伙叫道：

“你们这些家伙，全是共产党！”

另外的两三个人，也在叫着：“赤化分子，赤化分子！”可是，突然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大岛美弥子，矮矮的个子，偏着褐发的头，用出奇的清朗的声音说：

“呵，诸位，请上楼来吧！”

穿襯衫的那个家伙把脚从板地上拿下来，叫了一声什么。美弥子摆动着发辫，带着笑容，又往前走了一步：

“呵，请上来吧，座谈会还正开着呢，请不要客气！”

青年们退了五六步，在黑暗里，咒骂着、凝视着大岛美弥子。坂井梅也往前走了一步。大岛美弥子穿上了放在那里的木屐，往外走了两三步。

“请吧，诸位，请上楼来谈谈，给我们文工队提些意见

罢!”她的尖厉的声音在响着。“他媽的，該揍你一頓!”“共产党这些混帳东西!”各种声音混在一起。“算啦，算啦!”那个年紀大的穿浴衣的还在劝阻着，那几个家伙在黑暗里，漸漸地跑远了。

“这些坏蛋，是西富村的!”

坂井梅还在激动地說。走了回来的大島美弥子，仍然天真地睜着圓圓的大眼睛說：

“哪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东西呀，嗯!”

她自己肯定地点点头。然后，象是一下子驅走了睡意，精神焕发地，旋轉了一下脚踵，小声地唱着：

在那木曾河上，撐木筏的人……

做着在表演时的样子，小鳥儿似的跳跃着上楼去了。

安 靜 的 人

1

我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到宮城县去旅行的时候，見到他的。只是偶然在不同的場所見過他兩次，我覺得他是一個戰前所沒有的知識分子型的人物。

在那次旅行里我要做兩件事。第一是參加“日本人佐藤”的追悼會，第二是為了和那些在宮城看守所里被囚禁了三年多的“松川事件”的被告們會會面，給C雜誌的讀者們寫篇報告。舉行追悼會的地点是在T郡T鎮，這地方雖然也在宮城县里，但已接近岩手县境了，所以打算在開完追悼會以後，歸途上再在仙台下車。

追悼會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我是在前一天到的，到后就和主辦追悼會的T鎮共產黨支部以及鎮上的開明人士們，一起着手籌備。偏巧從幾天以前就下着雪。“日本人佐藤”這個說法，是沿用許多蘇聯人所熟知的“Японский-Сато”這個稱呼的；在參加俄國革命的日本人里，他是唯一的戰死于游擊隊中的日本工人。那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事，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滿二十九周年，

如果按着佛教的規矩來說，那就是三十年忌辰了。在此次戰爭中被俘的日本士兵中，有好多人被蘇聯人這樣問過：“你知道 Японский-Сато 嗎？”也有人在哈巴洛夫斯克市蘇維埃辦公大樓一進門的地方，見過“日本人佐藤”的巨幅照象。但是，在我們日本却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就連日本共產黨也只有關於他的很少的文獻，到了一九四八年才把佐藤合葬於“無名戰士墓”。就在他所出生的這條街上，也沒有人知道他，二十九年來，大家一直認為他的“去向不明”。他出身於貧苦的小商人家庭，本名是佐藤三千夫，偶然的是，佐藤是我的亡妻的近親，她和他年紀差不多，又是從小就住在隔壁長大的，我通過我的妻多少知道了一些他的事情，我在一九五〇年寫了題為“日本人佐藤”的小說，多少有助於世人了解關於佐藤的事，所以我也被列為追悼會的舉辦人之一了。如果按照預定的計劃，從正午開始用佛教儀式舉行追悼會，晚上還能舉行紀念講演會之類的活動，可是從我來的那天晚上，雪下的更大了，第二天一早又刮起風來。T鎮終究是個偏僻的地方，要是雪下的太深了，公共汽車一停，要來參加的人恐怕就有來不了的，有的人還得乘自行車翻山越嶺呢，因此辦追悼會的人很擔心。

聽說這場大雪比往年下得早，使得這古老的小市鎮呈現出一種更加淒苦的景象。從前，這裡是諸侯伊達支藩所住的地方，大約有六七千人口。鎮東以北上山脈為界，周圍全是稻田。到處是剛剛割倒的稻子，被大雪復蓋着。不能晒，又不能收，搞的不好恐怕就要爛掉。本來錢就緊，一

年只能收获一次，农民的开支全靠这一点稻子，这么一来，鎮上立刻受了影响，現金完全周轉不灵了。

T鎮的党組織已經被迫削弱了。战后不久，在这个偏僻的小鎮上，也有农民和少数工人曾几次举起紅旗庆祝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可是到了朝鮮战争开始前后，自治警察改为国家警察，許多活动分子因違反美国占領軍的政令而被捕，因此人数大减了。早晨，我趁着雪下得小些，出去买紙烟。在一家象是医生住家的草屋頂房子門前，站着个还年輕的农民，背上背着装着木炭的背筐，在他手推的小車上边，載着一个用棉被裹着的有病的老太婆。露在棉被外边的病人的头发上，复着白雪。我一打听，才知道背着的木炭是預备代替医药費的。在一条街的拐角处，蹲着一个姑娘，用一块大包袱包着头，雪落在膝盖上把褲子染成白色，褲子上边放着十来个鸡蛋，等着买主，不时揚起臉来目送着道上的行人。T鎮党組織貼在小学校的鉄皮牆上和倉庫牆壁上的追悼会公告，也被雪濡湿了，用紅墨水在字旁画的紅綫，也都濡湿成一片了。公告上写着：

为了紀念全世界值得驕傲的先覺者——“日本人佐藤”，我們T鎮定于今日下午一时在××寺举行追悼会，請有志人士踴跃参加！

但是，被生活迫得出不来气的过路人們，仿佛連停下来看一看的心思都沒有。也有的公告，被风刮了下来，在泥雪里被

人踏坏了。

从街上走进小胡同里，看见离我借宿的那家大门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穿深蓝色外套的男子，看这人的样子还不到三十岁，没戴帽子，背着手，仰着戴眼镜的脸，好象是在欣赏着暂时晴朗起来的天空。大概因为看见了我，突然掩上外套的前襟，弯着腰，慌忙跳进旁边的点心铺里去了。我知道这家伙是干什么的，走过点心铺的时候，往里边一看，见他正在土间里的炭火盆上烤着一只手，脸朝里坐着，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后身，显得非常僵硬。

我回到借宿人家的屋子，屋里散乱的放着纸墨，党支部的两个青年正在写着“开会程序”之类的东西。我告诉他们那个穿深蓝色外套的家伙，一个青年对我说：那家伙是国家警察，是从离这儿二十多里地的郡公所所在地的S镇来的，从昨天起就把这儿监视起来了。

“又下起来啦！”

坐在我对面的主人S先生，把脚伸进放着脚炉的被窝里，用老人的发颤的声音说。S老人并非什么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对T支部的工作出了不少力气的人。据说已经七十三岁了，小学时代的佐藤三千夫就是他的学生。他做T镇小学校长的时候，他那在东京上大学的独生子，因加入共产党被捕，“转变”出狱以后不久，就被送到南方战场上打死了。S老人自从儿子成了“赤色分子”被免去了校长职务以来，就住在这空无所有的屋子里，只有老夫妇俩过着日子。

“要是火车不停开，就好……”

老人伸着細細的脖頸，隔着黃色的紙窗傾听着刮風的聲音。他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人，我們在一旁緊張地談論着的時候，他象個外人似的一句話也不說。可是，現在他却很擔心：也許那連結 S 車站和 T 鎮的私營鐵路的柴油火車今天會停開。我問他關於佐藤的事時，他只是說那已經是幾十年以前的事，記不清了。沒有更多的話。但是看得出來，老人對於這個追悼會，是潛藏着只有老人才有的感慨的。

“來啦，來啦。”

這時候，紙門猛地拉開來了，隨着刮進一陣帶雪的风，到車站上接人的支部聯絡員 C 君突然出現了。C 的胡子上滴着雪水。這個老農民急急地說：

“東京的，仙台的，全部來啦！”

C 君背後，一下子出現了十五六個不同的臉和不同裝束的人，房間里立刻擠滿了人。S 老夫婦，忙着送上面巾和坐墊來。東京來的人，是共產黨中央的。其他的是地方，縣或地區的代表，還有五六個鄉下人打扮的，好象是附近鄉村的黨支部的同志們。我認識的只有中央的代表 I 議員，在開始自我介紹的時候，他說：

“我是日共中央派來的代表——I·T，請多關照。”接着又說：“我知道這兒冷，可沒想到是這麼冷！”

他說着，他那胖胖的臉上露出笑容。屋子裏熱鬧起來了。自我介紹是按着座次進行的。這里庄稼人的穿著可壞極了，在破外套上扎着繩子般的破帶子，為了表示禮貌脫去破外套，就露出了更破的短褂子。介紹輪到那個和鄉下人一

起坐在窗边的年紀約有四十二三岁穿西裝的人时,他說:

“我,是县委会的 K·R。因为联系得不好,来迟了,請大家原諒。”

說着,也和身边的乡下人一样,两手按在席子上叩了一个头。在我身后靠牆坐着的 S 老人,“呵”了一声,我回头一看, S 老人正和在旁边拿了茶盤跪坐着的,好象耳朵有点聾的老太婆,低声說:

“这是 K 先生,你看, K 先生呀!”

直到这时我并没有料到:这位 K 先生就是日本电波学的权威之一,理学博士,以前是××大学的教授,有一年春天,东京的报纸上报道过的那一悲剧的主人公。当时,我只是注意到这个穿西裝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知識分子,但是为什么混在乡下人当中,却一点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气味呢?头发梳的整整齐齐,穿旧了的褐色西服,熟練地結起来的領帶,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穿慣了西裝的人,但是在穿着破軍衣的工人和破外套的农民之間,却一点都不显眼。略微有点胖的白而長的臉,眼鏡后边的溫良的目光,他的特征是下唇比上唇突出,这給人一种柔和的、天真的感觉。身旁那个穿軍服的,用臂肘触了他一下,他急忙轉身接过茶杯来,用两只手捧着它,垂着下嘴唇,出神地望着一直在講着什么的 I 議員……

追悼会是談不到盛大的。除去S老人和佐藤幼年时代的两三个朋友以外，其余的全是党员。虽然也給鎮長和鎮上人士送去了請柬，但誰也沒來。曾經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过的佐藤三千夫，死了二十九年，他的灵魂还不能为故乡所容！

因为参加会的人来迟了，仪式也开始得迟些。××寺位于北上川的土堤上，透过佛堂的窗玻璃，被大雪所籠罩着的寬闊的河面尽在眼底。在风雪的飞舞略一停息的間隙里，看見有一个人的影子，好象要跌倒似地在河对岸的土堤上蠕动着，过了三十几分鐘，变成了雪人似的那人，拍打着蒙在头上的毛毯，出現在黑暗的寺院的厨房里。

低垂着紅旗的祭坛上，悬挂着佐藤中学时代的照片，他穿着深色的土布褂子，戴着有白綫的帽子，照片已經变黃了。佐藤在学校成績很好，因而得到鎮上人士的帮助，才进了中学。四年級的时候，他成了罢課的領導者之一，被学校开除了。以后，为了求生到海参崴的一个火柴工厂去做工，也就在那里参加了革命运动。靠近祭坛坐着的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給了鄰村的农家，一个嫁給了石卷的工人；两人都怀抱着小孩，被阳光晒黑了的高高的顴骨，很象照片上的佐藤。佐藤的家人，后来知道了他是参加游击队战死了的，但是因为恐惧反动統治階級的压力，二十多年一直保守着

秘密。尤其是他的父亲唯助，在最初的十年間，把这个秘密藏在他一个人的心里，最后才把这事写在遺書上留給家人而死去。

仪式由和尚念經开始，接着是讀祭文。本来是應該以合唱“国际歌”来开始仪式的，但是为了希望鎮上的群众也能来参加，所以才采取了这种形式。在几个人讀了祭文之后，穿了旧西裝的 K 氏，就代表县委会宣讀祭文。然后把讀完了的祭文稿慌忙地放到祭坛上，学着大家的样子，拉过坐垫来，撑着臂肘，变换着方向依次給和尚、家属和司仪人行礼，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本来没有什么足以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我却注意到这人时而流露出頗为侷促不安的神情。我的任务，是在讀罢祭文之后，說明一下佐藤的經歷，和从他参加游击战争到战死的大約两年的时间里——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这一时期的俄国革命在西伯利亞发展的狀況，还要說說佐藤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我談話的三十分鐘時間內，朝着祭坛排成口字形坐着的三十多人，尤其是那些乡下老人們，都是以端端正正的姿勢在听着。只有那个大概对“赤色分子”沒有好感的和尚很不礼貌的中途退席了。K 也是規規矩矩地盤着腿，两手插在褲袋里听着。苏維埃政权，是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經過了約五年的时间才巩固起来的，而在西伯利亞就更長一些。为了扼杀这个在地球上初次誕生的工人階級政权，世界資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美、日等国的干涉軍，以数十万軍隊侵略了从欧洲到西伯利亞的大半个俄

国。列宁被特务用手枪击中了三枪陷于危篤，斯大林在現在的斯大林格勒，領導着赤脚的工人和农民，对英法資本家近代化装备的十余万白軍作战。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正在欧洲和英法美等国作战，俄国革命一起来，立即停战了。特別在西伯利亞、日美两国共同派出十万軍队援助白軍。这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階級，喊出了“不許干涉俄国”的口号。干涉軍中法国讓·利亞普尔首先起义，接着英軍动摇，德軍掉轉枪口回到本国掀起了革命。逃到西伯利亞的白軍，在日本干涉軍的庇护下，連續犯下了血腥的罪行，在卡瑪河上航行着“血的船”，在西伯利亞鉄路上往返开駛着“死的列車”，俄国农民和工人的血不知流了多少。佐藤三千夫的活动，就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日本軍队的后方，把“离开俄国回家去吧！”“不要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放出一枪一彈！”的日文傳單，散布在兵士之間。根据当时的記錄，他化了裝，“渡过沼地，越过山岭，匍伏在野地里，喝着泥水”地工作着，一直到他在哈巴洛夫斯克的紅軍医院里断了呼吸的那一天为止，他一直都是为了这一任务而斗争着。

我一边說着，一边望着坐在我对面位置上的人們，这时K忽然从褲袋里抽出手来，往上推了推眼鏡。手又放回褲袋里，可是下垂着的下嘴唇輕輕地颤抖了起来，低垂着的額上，在这一瞬間，布滿了皺紋，連他那丰满的肩头，这时也仿佛突然瘦削了下去。这一很快的动作，已經重复几次了，可是他那盤着的腿和他的手臂，却是連动也沒动。这是一

种多年忍受过来，現在也还在繼續忍受着的一种姿态，仔細看去，虽然是和别人同样的姿势，却又有所不同，而且几乎是令人惊讶的不同。

傍晚时，雪停了一会儿，到夜里又下起来了。在T鎮小学举行的紀念講演会，听众也并不多。不到五十人的听众里，差不多都是鎮上附近的农民，互相挤着坐在风雨操場地板的正当中。講話的人站在講台上，冷得两腿不住地抖，最后甚至連声音都发顫了。在我之后，I議員講了一些关于农村經濟的問題。接着就放映了“松川事件”的幻灯，不知是誰借来了两三个火盆，生上火，人們就都圍攏到火盆周圍来了。

农民們穿得很破爛。寡言的东北老百姓們，听了講話之后也不鼓掌，也不知道提問題，但是只从在大雪的夜晚赶来开会这事上，就可以知道他們多么热情了。穿着破外套的，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的，头上包着毛巾的各色服装的人們，張着嘴呆呆地望着发縐的布幕上的幻灯。那个从仙台来的穿軍裝的人，用很大的声音在解說着。他的青年所特有的勁头儿倒很足，說着說着他自己就兴奋起来，解說就变成演說了。他講着誰都知道的事情，什么“松川事件”是“下山事件”、“三鷹事件”之后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一九四九年八月的某天晚上，在东北铁路松川車站附近，不知是什么人用詭計顛复了火車，司机和助手等三人惨死。更奇怪的事是，正在这一地区内进行反对解雇斗争的国营铁路工会和东芝电气公司工会的骨干分子二十余人，馬上被捕

投獄，而且任何與上述事件有關的證據都沒有，就判處了死刑以及無期徒刑。被告們已在宮城看守所里被拘禁了三年。他講得正起勁的時候，那些直着脖子看幻燈的農民們，已經打起呵欠來了。這位軍裝青年只顧自己興奮地講演，幻燈片已經好久沒有更換了。我很着急，向黑暗的四周圍望了一望，在我身旁看見穿着大衣的K的后背，他把兩肘放在鐵火盆的邊緣上支着頭，好象睡着了的样子，我在他的背上敲了一下。

“已經告訴他了，不叫他講那麼多……”

原來K並沒有睡着。他抬起臉來，低聲這樣說，然後又說：

“他的解說早就離開幻燈腳本啦。這人就是不考慮大家的意見。”

說着，他就站起身來，用腳在地上探索着，走到穿軍裝的人身邊去了。

就這樣，紀念講演會很快就結束了。幸而這時雪已經住了，騎腳踏車來的人們打算趁着夜里道上還凍着的時候趕回去。大家都到汽車站前邊的小飯鋪里吃面。能喝兩盅的人們都喝起酒來了，地委會和縣委會的人們却忙了起來，因為這裡交通不便，所以只要有了一個見面的機會，就要商量一下各種各樣的事情。縣委會的K不是被那邊的人叫去、就是被這邊的人敲敲肩頭，和這個說了再和那個說。等他好不容易回到我身旁的桌上來，剛把筷子伸進吃了一半的面碗里，屋外騎上了腳踏車的那些農民們又朝他喊起來了：

“你說到底得怎么办呀？”

K 拿着筷子轉过臉去。原来是一条牛被沒收，抵充稅款的事情，好象是大家在研究当法律手續办好之前，是否把这头牛交出去？K 氏对他們說了一句什么，可是那些因为喝酒而有了精神的人們大声吵嚷着，什么也听不清。K 又离开桌子，移动着滿是泥的膠皮靴到那边去了。一会儿就响起了农民們的笑声。

“照你那么說，就讓那牛餓三天呀！”

“那不餓死了嗎？”

这时，不知为什么 K 轉身朝里站着，面对着鋪子里的电灯光，笑声在他的背后响着，他仰起戴眼鏡的臉，垂着下唇。正好房檐上落下一块雪来，打在他微微偏着的臉上，雪块拍地一声碎了。哄笑声又响了起来。

“K 同志到底还是个教書先生呵！”

K 好象挨了打似的捂着臉，站在那里，四周充滿了笑声。他那样子就象是个挨了罵的孩子似的有点稚气，看样子怪可怜的。

那天晚上，我們从东京来的人和 I 議員一起回到 S 老人家里去过夜。我从东京来的时候就有点感冒，第二天早晨终于发起燒来。所以連那些分散在联络员 C 君和党小組同志們家里的、从仙台来的同志們是什么时候回去的，也不知道了。从第二天起，天好象是晴了，也略略暖和了一些。睡了两天，燒退下去了，决定第三天再打攪他們一天。早晨和 S 老人吃完了早飯时，戴着大耳朵帽子，扎着綁腿的联

絡員 C 同志來了，說是要進山里燒十幾天炭去，接着就和 S 老人說起話來。

“是嘛，我說那個人沒有錯！”

面對着這個用急急的語調說着土話的 C 君，S 老人“嗯”了一聲，臉上露出感動的神情。

“一點都不知道，原來，他的二兒子在木屐工廠！”

“昨天，在××寺的廚房里，那個穿草鞋的孩子，來看他來了？”

“嗯，不知道呢！”

聽他們兩人的話，我知道了 K 氏是把二兒子寄養在本地木屐工廠的一個同志家里。漸漸地我才弄明白了：原來 K 氏正是我所猜想的那個在報紙上登載過的 K 理學博士。

“他就是那個 K·K 嗎？”

我插嘴一問，C 君回過頭來，照例用他那急急的語調說：

“呵，原來你還不知道！早給你介紹一下就好了！”

戰時，K 氏在物理研究所和××無線電公司工作，為軍隊做過不少的事情。戰爭末期開始對戰爭發生了懷疑，戰後立刻就參加了共產黨。一九四七年被共產黨提名為 S 市的市長候選人，因為競選演說的內容違反了占領軍的政令，被軍事法庭處以苦役五年的徒刑。他的演說中提到“美國把外國大米輸入日本，而把日本大米運往南朝鮮，”這就違反了美國軍隊的“政令”。過了三年零七個月之後，K 被假釋，突然回到自己家里。過了幾天，他那依靠出租房屋給學

生們來維持生活的妻子，突然留下一封遺書服毒自殺了。聽說這只是因為她曾經與借宿的學生有過愛情關係，又不願加以剖白求丈夫寬恕，就以一死作為對丈夫的謝罪了。

K被大學驅逐了出來，又失去了妻子，只好把大兒子寄養在東京友人的家裡，把二兒子寄養在仙台附近當地的同志家裡，獨自從事於黨的活動。

“身材高高的，的確是個美人呢，噯，提起 K 太太，都說是個好人呀！”

老黨員的 C 君，好象十分清楚 K 氏的家庭。他不時的用他的大手撫摸着連鬚胡子，然後又抱著胳膊搖著頭。

“K 同志很痛苦呵，聽說是戀愛結婚的呢，嗯——”

3

因為在 T 鎮停留了五天，又在柴油火車上搖晃了一個多鐘頭，到東北鐵路的 S 車站換乘由青森開來的火車的時候，我有点著急了。明天在東京還有事，今天能不能會見“松川事件”的被告們呢？加上，我離開東京的時候，由日本國民救濟會拿來的給仙台市松川對策委員會的介紹信，又不知道丟到哪儿去了，翻遍了皮包也沒找到。

“松川事件”在今天，已經逐漸成為“力量”的問題了。為了弄清這個事件的黑白，重點已經轉移到能團結多少人的問題上來了。社會上的有識之士，固然一開始就是以疑問的眼光對待這件事的，尤其在最近，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意志的

人更增多了。我也認為這是一件大陰謀，甚至可以想象這是一件有背景的陰謀。就是从常識上來判斷：在國營鐵路工會和東芝公司工會中彼此素不相識的二十幾個人，就會在四五天之間實現那麼大的破壞活動嗎？況且，在獄里囚禁三年之久，並未發現任何證據，世界上決不會有這種怪事。但是，問題是在今天僅憑“認為”和“想象”已經不行了。常言說：不真實的就是沒有力量的，在日益殖民地化的今天的日本，如果沒有力量，就是真實也要被掩蓋的。假如事情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有背景的陰謀的話，為了使真正的犯人免于追究，他們很可能不擇手段地搞到底的。我從東京來時，聽到了要根據被告的控訴“重審”的消息。這確是前進了一步，可是，正如 O 主任律師所記載的那樣，在第一審的時候，判決前夕“審判長在一夜之間就完全變卦了，”就是說，在目前的局勢之下，如果單靠審判長的良心，那是很危險的。如果人民的力量不能團結一致，真理就陷于危險。現在，大聲疾呼地把事件的真相告訴世人，是比判斷事件的真相困難得多的。

正午，在仙台車站下車的時候，我就一直想着這件事，關於 K 氏的一切已經完全忘卻了。幸亏我還記得松川對策委員會所在的街名，在仙台市一條偏僻街道的泥路上，轉來轉去找了好久，总算找到了。是用板子圍起來的簡陋的小房子。我敲了敲那粗糙的屋門，里边的人聲靜下來了，聽見有人在屋里答應了一聲，門一打開，我不禁“呵”地喊了一聲。狹窄的屋地上，放着一個邊緣都燒得焦黑了的火盆，一

个穿軍裝的人臉朝外，把一双穿着軍靴的脚放在火盆边上，正在嚼着小圓面包，想不到这个人正是 K。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紹信了。

“您，就是这儿的嗎？”

我的意思是問：这儿就是您的工作地点嗎？对方慢慢的咽着面包，回答道：

“不，我不在这儿工作！”

在他的眼鏡后面的溫和的眼睛里露着微笑說：“我常常到这儿来！”

比起在 T 鎮見到时，他显得更年輕力壯，血色健旺而富于战斗力了。吃完了似乎就是午飯的面包之后，他从屋隅取出碗来，从歪着放在火盆一边上的水壺里倒上白开水，給了我一碗，另一碗他自己用两手捧着便喝起来。屋子里摆着三四張桌子，人們都伏在桌子上忙着，有时大声地互相談着什么。K 氏默默地用火箸撥着炭火，把垂着下唇的臉伏在火盆上吹着火。

“大概能見着五六个人吧，拘留所允許接見的时间，一共有四个鐘头呢。”

我說了来意之后，回答我的却不是 K，而是一个面对着桌子穿了一件黑色棉布工裝的青年，他背朝着我們，臉伏在桌上这样說。

“一点鐘的时候，我到監獄去送东西，等到那时再說吧！”

好象是为了赶紧做完事情，語調显得突然而粗率，但感

覺得到那種為了使獄內和外界聯絡起來而努力工作着的人們的親切。接着，我說，我打算順便還去看望一下暫時保釋出來，現在在東北大學醫院里住院的被告之一的S君，然後打算乘今天夜里的火車回去，不知道乘哪一趟火車好。

“醫院里，晚上也可以去探望的！”

穿黑工裝的人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就“查查”地動着他的鐵筆。板壁上邊貼着律師們的名單，上邊畫着紅圈或者寫着“某某律師某月某日將來仙台，宿某某旅館”等字。后邊牆上的電話鈴聲一響，一個女孩子就離開桌子，在地上拖着她的膠皮靴子跑去接電話。在這裡情景是極其忙碌的，K氏的存在也並不惹人注目。他坐在方形的小木椅子上，翹起椅子的兩條前腿，背靠在板牆上，一直在他的小筆記本上寫着什么。我看見他從軍裝的各個衣袋里取出好幾個小本子來，打開兩個本子挨到眼鏡前邊，似乎在比較着什么，接着從屁股上的褲袋里又取出一個本子來。然後，又挨次把筆記本裝進各個口袋里去了。他似乎還兼着別的工作。一會兒，他從滿是灰塵的板牆角上，取下了腳踏車的气筒來。這些動作，都是緩緩慢慢地，都顯得很天真。從我面前走過去的時候，他忽然停了下來說：

“往東京上野去的火車，有×時×分的，××時×分的……”他不慌不忙的說着：“×時×分的是從青森開的，大概沒有座位。××時×分的是快車，到上野天還不亮。也許倒是×時××分的好些，是從這裡開的，去得早點，還會有座位。”

然后他就提起气筒的膠皮管，走到屋外去了。他的話里沒有廢話，也一点不勉强。在T鎮从C君那里知道了他就是那个K理学博士之后，現在我很想和他談談。可是，那个穿黑工裝的，抱着要送到監獄里去的東西，在催我走了，我們就急忙走出去。K在大風里吱吱地打着氣，當我們走過去時，他就對穿黑工裝的人喊道：“××君，讓我領他到醫院去吧，我正要去回那邊去——”

這是对我的好意，也为了分担同志們的工作。那个面孔消瘦显得很疲倦的穿黑工裝的人，高兴地点了点头，K氏又打起氣來，喘吁吁地說：

“五點鐘，我在××那兒坡底下等你！”

我們急忙乘電車來到“古城番外地”的拘禁着很多死囚和重罪犯人的宮城看守所。遭受过美国集中轟炸燒得片瓦无存的仙臺市街，只剩下寬闊的大道了。战后已經过了六年，还是那个样子。眼里看見的，只是卷起尘土飛駛着的吉普車，據說还是因为大部分开到朝鮮前綫去了，現在街上的吉普車和美国兵，已經比从前少得多了。

在看守所里，我們只見着S·S(死刑)K·T(無期徒刑)M·S(死刑)N·H(死刑)K·A(無期徒刑)等五个人。和每个人也只不过談了十几分鐘話。倒是办手續和等待的时间特別長，等到和第五个人見面時，已經花費將近規定的四个小时了。不过，尽管時間这样少，但在了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犯人”这一点上，這時間却是过于多了。

“×××号！”

和我的身材同样高的坚固的铁窗里边，侧着身子坐着一个穿黑制服的看守，一边用铅笔敲着桌子，一边不住声的喊：“×××号！”刚才，听到右边高高的屏风后边响着开手铐的声音，不一会儿，铁窗那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这里的构造只能使光线从铁窗的正面射进来，它的左右两边都被墙壁和屏风挡住了，看守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探监人的面孔。

“呵，我，就是 S！”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出人意外地发出明朗的声音。我侧过身子想好好的看一看他的脸，他也似乎体会到我的意思，在对面采取了适当的姿势。

“是××先生吗？我是 S·S，实在，多谢！”

瘦瘦的脸，前额和鼻梁似乎是同样的高，以工人所有的那种轻快的神情，轻轻地点着头，眯缝着可亲的眼睛。当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他是从看守那里知道我的名字的。我也知道这个穿着黑棉袄的将近五十岁的人，就是松川工会的委员长，他被诬陷为这一事件的幕后主谋者，毫无证据的就被宣告了死刑。

“您这么老远的跑来了，——天气很冷呀，今天——”

他抚着自己满嘴的长胡子，大声地笑着。这是工人才有的轻快和明朗。——我觉得很惊奇，这就是被判处死刑的人么？

“身体怎么样？”

“很好。不过因为营养和运动都不够，似乎衰弱一些，但是，不要紧的！”

說着就伸出被墨水弄黑了的那只有茧的手指給我看：

“这只手指头，天一冷就有点痛！”

听说他們在獄里，把熄灯時間以外的十分之七的时间，都用在写明信片 and 写信上了：用这个来和无綫电或报纸的反宣傳斗争，向社会上控訴，揭露这事件的全部虛假。

“坐下！”

这时，正在记录着我們的每一句問答的穿黑制服的家伙，用鉛笔指着窗边的椅子，这样命令着。他听了这话，那本来因为微笑而变細了的眼睛里，閃起亮光，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好象忽然改变了主意似的用溫和的語气說：

“这样不是很好嗎！”

他撫着嘴上的胡須轉过臉来，又把眼睛眯縫起来了。

“真是胡鬧，老子本沒有罪，无緣无故关了三年，还要判什么死刑——”

他甚至发出了笑声。語气漸漸强硬起来了。

“这些胡子，这些——你知道么？”

他用力握住关羽式的大胡子給我看，我向他点了一点头。

“这些胡子，不从这儿出去是絕對不刮掉的！”

穿黑制服的家伙又用鉛笔敲着桌子，喊着：“到時間了！”他对那人点了一下头，又說：

“——要是他們非杀不可，在断头台上，老子这胡子，会一根一根的倒豎起来！”

在窗下站着的两名黑制服走到他身旁时，这人又眯細

了眼睛，和我告別；轉過身去，接着我聽見了上手銬的聲音。

難道會有這樣的罪人嗎？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起在油印的“人權民報”上登載過的，關於這人的“胡子的來由”那首小詩：

——太涼啦！

“沒有熱水呀。”

——痛得很呵！

“我是外行，剃刀又不快呀！”

——洗臉水！

“沒有那東西，好啦，進去進去！”

——媽的，這簡直不是人刮臉！

——動物！難道動物還要刮胡子？

“好啦好啦，刮完了的快進去！”

嘎噠！嘎噠！

寒冷的鐵門檻里關着獅子。

獅子，也刮胡子嗎？

我是人！

好，我從此再不刮胡子！

我想，在這位工人由於憤怒寫出來的朴素的詩里，充滿着真實。這是那顛覆列車的真犯人永遠寫不出來的。

“呵，××先生么？”

記不得是第幾個人了，在正在發呆的我的眼前，忽然响

起了年輕人的声音。同时，一个很大的影子擋住了我的眼睛。

“我就是K·A!”

“呵!”

我一边注視着他一边感到吃惊。这个圓圓的臉，黑珠子似的眼睛，身材魁梧的青年，原来就是所謂“赤間調查記錄”的本人。使我吃惊的是他那清朗的眼睛和相貌。他穿着一件附有紅墊肩的棉袄，挺着腰坐在那里。这已經不是那个到处追逐乡下姑娘的小流氓了。

“我讀过你写的××，所以很想和你見一面!”

青年把手搭在鉄窗上，把臉也貼在上面，高兴地說：

“我也讀过××先生的××，嘿，我进了監獄才学会念書。嘿，进了監獄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

他独自“嘿”“嘿”地說着，好象这个青年就要打开鉄窗和我一道出去似的。他高兴得很，象是想傾訴一切又一时而說不完似的。

“嘿，已經要重审了，当然也不能大意，是的，敌人是在吉田的背后的，是的。”

大概他的話超过了界限，黑制服用鉛笔在他的肩膀上触了一下。青年猛的回过头去大声喊道：“討厭!”接着又轉过臉来。

“还有，这次××先生那部电影，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可是也許是我太不自量，我对那个女主角有点意見，我已經写信去了。还有——”

青年的圓眼睛越来越明亮了，問題一个連一个地提了出来，我只好不断地点头。

这是多么惊人的成長！他是一个鉄路上的小工，因为和流氓們打架被警察抓了去，那时他是十八岁；现在他二十岁了，在獄里过了两年，他已經完全改变了。从前这青年虽有很强的腕力，但他那幼稚的头腦却認为警察是“絕对的”。由于威胁、利誘以及烟酒的誘惑，終于捏造了一个成为这一事件的基本根据的“赤間調查記錄”。但是，当这个本質朴素的青年，看到这許多无辜的人一个个地被抓了进来之后，由于良心的苛責，就在监房里上吊了，不想繩子断了又活过来，痛苦之余，他才从警察和自己一块捏造的那个虛誑的窗子，看見了真实的世界。

“到時間了！”

“过一点，有什么关系！”

青年和黑制服爭执了一会儿，又把臉靠近了鉄窗。

“呵，先生，中国鉄路工会的同志里，也有我們的朋友了！和捷克鉄路工会也通信了。中国，我是知道的。可是，捷克是在欧洲吧？在欧洲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最好有一本世界地图……”

“呵，”

我点了点头，这时站在窗下的两个黑制服，走到他身后了。

“干什么！混蛋——”

被扭轉过去的青年，发出有力的喊声。人們的影子扭

动了两三次，我看見挺起腰又回过头来的青年的臉。

“我一定跟他們拚到底！先——生！”

他喊着。突然，鐵窗上的木板，在我鼻子前边响了一声，落了下来。

我兴奋地走了出来。和等着我的穿黑工裝的青年一道，在只有一边有房屋的街上走着。白天很短，現在已經是傍晚了。我想：——帝国主义也許非得把这些人杀死不可的，但在同时，也在誕生着新的人。而压迫越殘暴，新的前驅者越会更多地突破迫害，生長起来。对于养路工人那样的青年們，尽管帝国主义越来越殘暴，“死刑”或“无期徒刑”是吓唬不住他們的！况且监牢并没有与外界隔断，国际局势起着更直接的作用。而且，正是因为这些青年們被关在獄里，他們的聲音，反而能向全世界扩展开去……

“K 同志也在这里住过呢！”

起初，我不懂穿黑工裝的青年說的是什么。

“呵，K 同志？”

穿黑工裝的青年轉过他的細脖子，望着監獄的有着裂縫的混凝土的牆壁說：

“他在这里一直住到今年春天呢。我以前是他的学生。自从他进了監獄之后，他就变得真正了不起啦。已經不是所謂的‘教授’啦。”

他和 K 在一起的时候，是用那种粗率的口气談話的，可是在背地里，他却非常尊敬他。監獄的牆壁早已离开我們很远了，可是穿黑工裝的青年却还是說着“这地方”。

“这地方，一句话，是屈服它而成为活尸呢；还是战胜它而成长起来呢，这地方就是岔路口。”

我跟着这个腿很长，走路很快的黑工装，在不知名字的胡同里走了一阵。——我想，不论是诞生还是成长，实在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对于工人尚且如此，何况小资产阶级呢！尤其是对于象 K 那样有社会地位的人，或者有社会地位的人，那恐怕是更加困难的。这时，黑工装忽然短促地喊了一声，往那边一看，正在有电车道宽阔的 T 字形横道对面，有一个手扶着脚踏车手把的穿旧军装的人。黑工装举手打了一个招呼，突然有一辆吉普车猛然横着飞驰而过，好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了。在渐渐稀薄下去的尘埃里，我看见戴着眼镜，垂着下嘴唇，正在朝这边望着的 K，他的脸上照例没有什么不同的表情。

4

“让你等好久了吧？”

“不，只一会儿。”

穿黑工装的青年往车站那边去了。我跟在推着脚踏车的 K 的身后，从电车道上拐过去，走上一条突然陡起来的坡道。不知这是到了仙台市的哪一带，一边是一些小木板房，斑点似的散在被火烧过的山岗上；一边是在崖下飞驰着的已经开了灯的电车。我还残留着方才的兴奋，不知不觉就用较重的语气说起看守所里的事情了。可是对方并没有

受到特别的感动，只是回答我说：

“也有比较好的看守。”他说，在看守所里，也有对“松川事件”抱同情的人。一般的说，在看守所中间出现了战前所没有的、对待政治犯抱着一种“民族的同情”的空气。对“松川事件”的被告也是这样的。——说了这话以后，他就一声不响地推着嘎塔嘎塔乱响的破脚踏车，扭动着旧军装下边的肥胖的臀部，往前走着。我想转换谈话的方向，了解一些关于他个人的事情，可是他自己却不说什么话。我又不好问他那件在报上登过的他的私事。

“看样子，你身体很结实。”

“是的。”他点点头说：“从健康上说，是在研究室里的时候好的多，因为整天在外边跑！”

他用力迈开穿着军靴的脚，并没有显出特别拘泥的样子。

“你的专业，怎么样了？”

“连学会的报告都不容易看到呵——”

接着他慢慢地夹着几句专门术语，谈了两三件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据我所了解的是这样：他说自己已经被学术界关在大门之外了，虽然也有时被邀到朋友的实验室里去。脱离了实验，理论毕竟是观念的东西，这是不行的。不过，如果不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而努力打下社会科学的基础，那也是不可能有大的成就的，他现在并不急于回到实验室去。……大概是谈了这样一些话。

“你一个人住着吗？”

“是的，自己做飯吃。”

他沒有一點感傷的樣子，反而更不容易深談下去了。

“竟是這麼堅持下來，真了不起！”

听我這麼一說，他轉過臉來：“呵？”了一声。好象覺得突如其來。我們兩人目光相對的時候，他下唇輕輕地顫動了一下，鏡片後邊的眼睛好象很狼狽似的眨動着。

走到坡上，來到另一條電車路上，在拥挤的人群里，兩個人被隔開了，我們繼續往前走着，我忽然想起了在T鎮的小飯鋪的屋檐底下，在農民喊着“那還不餓死了嗎”的叫声和笑声里，K用手捂着被雪塊打中的面頰時的那種異常窘迫的神情。在群眾斗爭中努力去改造自己，——也只有從貧困和悲慘的生活里站了起來的群眾的斗爭當中，才能找到足以經受這樣的悲劇的原動力，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儘管如此，在內心里要經歷怎樣的痛苦呵。

一会儿，來到了東北大學的附屬醫院。擺在薄暗而雜亂的門口的竹皮草鞋，鼻梁帶全都斷了；我正在轉來轉去想找一雙好的，不知他從哪儿找到一雙遞給了我。他一只手提着軍靴，給我領路，穿過走廊上了樓梯。他那樣子決不想討好別人，而且也不善於應酬，但使我不斷地感覺到他有無限的謙遜。

“我把××先生領來了。”

進了一間小小的病房，他親切地对床上的人說。

“××先生？”

接着就是病人連續的呻吟。我走到床边，病人抬起了

上半身。

“不，没有关系，躺着或起来都是一样的痛！”

病人的发黑的脸，又瘦又小，胡子长的很长，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和S君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因为他非常爱好文学，我们已通过两三次信了。他的病是一种全身变成紫色的奇怪而危险的病，还有很厉害的神经痛。我的意外的访问，S君很高兴，他努力抬起着上半身。

“不要紧，我常常是这样的。”

这人是国营铁路的技术员，又是国营铁路工会福岛支会的委员，被判处了十五年劳役。罪状只是因为他是同谋者，其实所谓“同谋”的那一天，他正在郡山市参加地区工会的纳税斗争，根本没有在家里。那时偶然留在郡山的文件还保存着，曾作为反证提出过，但是审判长却把这文件扣下，不当作审理材料。

“屋子很冷呵！”

我想这对病人是不好的。这间屋子小得几乎只够放一张床，没有窗帘，暖气设备也拆除了，战后过了六年，号称东北地方第一的大医院，还是没有恢复起来。

“不，就是这样，也比监房好多了……”

S君轻轻呻吟一声，把瘦瘦的身子动了一动——牢里可受不了，去年冷得到过零下十八度呢——

有煤烟冒进屋子里来。这时才发觉K不在屋里，不料他一会儿就拿进来一个冒着烟的炭炉子。但他马上又走出去，似乎是到护士室要开水去了；果然提来一把茶壶，他那

样子显得很笨拙，但他很小心地把炭火堆积起来，揉着眼睛，把水壺放到炭火上了。

“我在从前的‘苏滿国境’的堡壘里住过两年，以后一到冬天身子就痛，在战争里差一点死掉，現在他們又用监牢来折磨我……”

他說着說着，就兴奋起来了，說起了战争时的事情。談到他在苏联被俘的一些事，他是在最初遣送回来的那一批，那时他还不大了解民主运动，可是回来以后，他逐漸的明白了苏联和日本的不同，就热心地参加了工人运动。話很長，他又談得很兴奋，我恐怕这对他的病不好，但又沒有法子阻止他，只好点着头听着。这时我忽然注意到，K的臉上又流露出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只有一把椅子，我在坐着，K就弯着腰坐在床边上，用手撐着头，好象是在看着那炭火炉子。我看不出他是睜着眼还是閉着，他有时突然伸出手来把眼鏡架往上推一推。象我在T鎮上看見过的一样，这些动作多半是无意識的。在他那看来使人感到一种寂寞的肩头上，似乎还殘留着長期監獄生活的习惯，仿佛在时刻提防着，唯恐自己精神一松懈，就会从內部涌上痛苦来。

“我們会战胜的，重审一定会胜利——”

S君想要躺下去，又呻吟了起来。我用手扶着他的肩膀，他就用牙齿咬着毯子边，一直呻吟了老半天。

“——把真犯人，非得把真犯人找出来不可！我們要是失败了，真犯人就永远找不出来了！”

我想只有我走开，他才能平靜下来。这时K忽然說：

“給你換換熱水壺吧！”

他在床邊上轉動着，肥大的臀部撞着牆，從被子里取出一個瓷制的熱水壺來。他又提起冒着熱氣的茶壺，一起拿到走廊里去，過了一會又進來，把熱水壺塞進被子里去，又隨隨便便地向病人問道：

“N 大夫今天來過沒有？”

“今天是 W 大夫，N 大夫是明天的班！”

“那麼他昨天來過啦。”

“嗯。”

K 照例垂着下唇，默默地對病人望了一會兒，S 君一見 K 的安穩的神情，似乎他的興奮也平靜下去了。

“兩三天以前，我碰見 N 大夫，他說檢察當局正在想盡辦法找他的麻煩，很苦惱呢。”

“呵，這麼一說我就明白啦——”

病人從毯子里伸出手來：

“N 大夫有一次說過很突然的話！他一邊給我看病，一邊對我說：‘我是一個醫生，我一定為治好你的病堅持到最後。’我聽了很高興，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說出這話來……”

“嗯，嗯，” K 點着頭。然後低下腦袋，穿着竹皮草鞋的腳尖，好象在地板上畫着什麼似的移動着。然後又抬起臉，機械地說：

“也許不至於發生這樣的事，不過，如果 N 大夫不來診察的時候，請你立刻托什麼人通知我們一聲，那時候，我們

必須提出抗議。”

臨別以前，我握了握 S 君從毯子裏伸出來的骨瘦如柴的手，就走出了病房。K 在走廊上等着我，一边走一邊告訴我：那些傢伙把一個病人放在監獄外邊也不放心，正在通過大學和醫院，對給 S 君治病的醫生們使用各種手段，想要取消暫時的保釋。最近醫生們在診斷上已顯得很複雜微妙，進步的醫生 N 醫學士，因為正確地診斷了 S 君的病，所以無論在表面上，在暗地里都在受着迫害。

K 一只手提着軍靴在我前邊走着。走廊上的電燈，有的只有燈罩，沒有電燈泡，也有好多地方都是黑黑的。也許因為他在主管這個醫院的大學做過教授，所以對樓梯和一些拐角的地方很熟悉。他也不是一句話都不說的，只要有必要問他的事，他都好好地回答，不過很少主動的開口。

“這裡是你的原籍嗎？”

走到樓下時，我裝做無所謂似的問了這麼一句。

“不，是東京。”他回答。

“東京？”

“我是生在下谷的。”

“噢，那真正是江戶人啦。”

正是拐角的地方，我站了一站，他的臉一轉過來，我們正好臉對着臉，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K 的眼睛向下看着，隨即又走在我的前邊了。我離他一步遠，跟在他身後默默地走着。這麼一來，就自然而然地只有等他先開口了。我想當我們傍晚走在坡上的時候，他就應該懂得我希望知

道一些什么的了。又往前走了十来步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一种很勉强的气氛。象这样默默无言的走着，我自己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到底还得是我先开口：

“你讀过‘思想改造’这本书嗎？”

“沒有。”

我就說，这是最近才由中文翻譯过来出版的一本小書。——我本来打算换一个話題，但是我的感情轉換起来是很迟钝的，所以終于还是在这个問題上打圈子。——这本书里载着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和毛泽东主席的往来書信。——我不管走在我前边的 K 有沒有听着我的話，我繼續說着那篇文章的內容：那位曾經很頑固的哲学家，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漸漸地发现了自己过去在学术研究工作上的錯誤，就下了决心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文中叙述了决心改造自己的經過。毛泽东主席給了他一封回信，回信很短，表示鼓励，并且說：这种改造恐怕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既然有了即使还很微小的进步，那对于你的哲学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回信的大意就是这样，这位哲学家受了极大的感动。——我对 K 說了这么一些話，这时我們正走到医院大門前灯光底下，K 忽然停住脚步，說：

“关东大震灾的时候，我十四岁……”

因为很突然，我也站住了，起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說这些話。他把軍靴換到另一只手上，往上推一推眼鏡，停了一停，眼睛望着脚下，然后繼續說：

“那一次，父母都死了，房子也燒了，我就到处跟人家要

飯吃，在隅田川河岸上就轉了一個多星期，後來——”

說到這里，又把軍靴換在另一只手里，仰起臉望着暗處，用同樣的聲調說：

“後來，所以，我是比較習慣了……”

到我們再走的時候，已經站了好一會兒了。K 往前走，我跟着也走，可是我什麼也沒有說。我想，K 大概是一直不斷地與噬食靈魂的“虛無”，與那些拉他後退的東西在戰鬥着呢。

走到門口，K 把木牌子交給傳達室，又連我的一起把竹皮草鞋放進木屐箱子里去，這時，我覺得 K 已經把我希望知道的事情，用簡短的、最具體的內容回答了我，在這回答里滲透了這個人特有的性格。對“虛無”的戰鬥！今天很多革命家們，都謙遜地不願更多地談到自己如何與“虛無”戰鬥的。究竟是如何與“虛無”戰鬥過來的呢？支持了這一戰鬥的，當然永遠都是人民群眾。可是走向人民群眾的這條道路，也並不是容易的。

“今天回去還要做飯嗎？”

“已經托了樓下的老太婆替我做，買點菜回去就成了！”

他打開腳踏車的鎖，解開車架子上的細繩，又仔細地把包袱重新扎了一扎。——我不知道這個大震災的孤兒，是怎樣成長的？如何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取得了學位？又是怎樣結了婚的？但他那垂着下唇、突起着臀部，推着嘎嗒嘎嗒亂響的破腳踏車的側臉上，卻是連一點感傷的影子都沒有。

“只要是从這個車站往那邊去的電車，你搭乘哪一輛都

可以。”

出了醫院的門，沿着電車路走着，K 對我說。

“這時候火車已經停在月台上了，還是早點上車等着好些！”

風很冷，街上人還很多。推着腳踏車的 K 和我常常被行人們分隔開，和傍晚那時不同了，這回是我沒有話說了。把 K 判了五年勞役，把他從大學里驅逐出來，殺死了他的妻子，甚至还奪去了他的兩個孩子，這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事。不論在理論上或是在現實上，這種遭遇，是容易令人向虛無投降的呵。

“××先生！”

K 在我身後叫我。在車道和人行道之間，有一個穿着長褲子的，矮胖的老太婆，把 K 拉住，正在匆匆忙忙地說着什麼，旁邊有一個穿着舊外套登着木屐的老頭兒，也按着腳踏車把手站在那裏。這些人們好象是跑到醫院來找 K 的。

“我就在這裡失陪啦！”我走近他時，K 氏簡單地對我說：“有人不讓他們擺攤子，威脅他們，有個壞蛋正要帶人來砸他們的貨攤子……”

看來很緊急，那個老頭兒已經把矮個子的老太婆，扶上調過頭去的腳踏車的貨架子上了。

“走吧！”

K 也把腳踏車轉過頭去，對我點點頭，笨拙地跨上車子，騎走了。我回到電車站，很快地就上了電車。因為和他們走一個方向，我就靠着車窗坐着。電車快到下一站的時

候，就赶上了那两輛脚踏車。我从車窗伸出手去揮动着，K却沒有注意到。等电車开了过去又停下来时，K揚着戴眼鏡的臉，垂着下嘴唇，跟在載着老太婆的那輛脚踏車后面，从我眼前跑过去了。

在軍事基地旁边

1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到京郊一家农家去，帮着做点地里活儿。在那一个多星期里，我却遇见了飞机墜落等等一些偶然的事情。

說是帮着做点地里的活儿，可是象我这样的写文章的人，也許给人家反倒添了麻烦。但对于我自己，这却是一服非常好的药。

近来，我感觉到我不能不针砭自己一番了。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尤其是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世界上激烈地变动着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和工人农民群众是隔离得越来越远了。自以为看看报读读书，就可以在理论上理解世界的变动和潮流，但是我明白，在感觉上，却无论如何是从现实生活脱离开了。今年“五一”节的落伍，就是最好的证据。当然，这里所说的落伍，倒并不是指的那天游行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大了，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突然昏晕过去，被扔在队伍之外的事；这是自然条件，没有办法的。我说的是，直到游行的时候我还在想，既然游行队伍里据说有

十万群众，是这么多的人民所要求的事，又仅仅是在那儿举行游行的解散式，即使有些小冲突，人民广场也是可以允许使用的吧！我竟有这样“天真”的想法。离开了游行队伍以后，在平河街电车站那儿休息了一会儿，坐电车到半藏门的时候，才发觉乘错了车，慌忙跳了下来，又坐在濠边上歇了半天，这才步行到三宅坡：坐上电车，还没到樱田门的时候，就被赶了下来，和群众一起被驱赶到了日比谷的十字路口。在这里我所见到的，和当天晚上从无綫电和报纸上知道的，尤其是在以后五六天里很快就知道了的那些事，使我感到我的落伍了。

我的情绪消沉了。说是要给自己扎上一针，虽然到地里干点活儿做做样子，也顶不了什么事，不过我以为这也是方法之一。这家农家所在的村落，是在××军事基地的附近。离开市街下了公共汽车，走在田壠之間，有很多吉普和大卡车驶来驶去，卷起闷热的尘埃。没有办法，只好站住等些时候。我背着背囊，穿着工作服和鞋底已磨平了的木屐，戴着麦秆帽子，拿着一根竹板代替手杖，越发觉得脚步沉重，心情烦躁。

“你要什么？老爷爷！”

我停在一家门前放着板凳的铺子前边，从摆着粗点心的玻璃匣子的柜台后边，一个嘴里含着酸浆果的十来岁的小女孩，伸过头来这样问。

“牛奶糖！”

当面就叫我“老爷爷”，我很生气，用带着怒气的声音

說。可是当我向那挂了遮太阳的窗帘的暗暗的門玻璃上看去的时候，覺得小女孩还是对的。不但在稀疏的胡子里明显的杂着許多白胡子，連臃腫的眼胞，在这种粗糙的鏡子上，也照得很分明。

这村子，在丘陵似的小山下边。走了不到一里，来到村落的时候，太阳才平西，刮起了凉风。在山的上空，有两架似乎正在練習着的噴气式飞机，一会儿急降，一会儿急升，在夕阳照耀下，尾翼染成了橙黃的顏色，发出远雷似的声响。

这家农家，是一所小草房，在村落的进口，靠着街道旁边的山崖上。战争时期，因为常到这里买吃的东西，所以很熟悉。这家的大儿子很年青，时常作些短歌之类的东西，我接到过他給我的信，对我是很亲切的。在战争快要結束的时候，他被征入伍，战后快到半年才看見他战死的公报，我到他家去吊祭过。战后一两年間我还常常去买些什么，不过这只是很小的庄稼戶，也只能从他家里买些蔬菜而已。这次当我来这里以前写信給他們的时候，他們就謙虛地回信說：伙食費是不要的，可也沒什么东西招待。

我走上了那切斷山崖的紅土坡，約有四年沒有到这里来过，后門的栗树已經長得很高，几乎把茅草屋頂都包圍起来了。

“你們都好呵！……来麻煩你們来啦！”

站在正房門口一看，屋里一个人也沒有。院子那边牛棚前头，有一个老头儿只系了一条兜襠布，在那里使着鋤刀。

“噢，是你呵，够热了吧！”

老头子把手放在头上的毛巾上，动着没有牙的嘴。他想停下锄刀站起来，我止住了他，他又蹲下去，扳动着锄刀。还不到两岁的那头牛，不住地向着牛栏上蹭着脖子。

“那么，先抽一袋烟！这就给你弄茶去！”

六十来岁的人，一直很结实。可是在这四五年里，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他最喜欢的是，买来小牛犊，养大了再卖出去。我在房檐底下坐下来，一直望到后门，家里什么人也沒有，我问：

“家里人都好吗？”

老头子正把各样东西放进料桶里，攪拌着，一下子扬起头来，转过脖子，向一个地方望着，就这样子回答说：

“好倒都好，嘿，——就是乱七八糟！”

这家里有很多孩子。记得老头子的二儿子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往来于有着军事基地的××市的纺织工厂，也还有年轻的姑娘，我想老头子已经应该有两三个孙子了。

“阿新那个混小子——”把料桶送到牛跟前，老头子张着弄脏了的手掌，垂着胳膊走到我跟前，低声说：“——‘五一’那天被抓去了，在小营那儿，关着呢！”

“谁？阿新？”这突如其来的话，我简直不明白。

“新太郎呀，老三，嗯，记不得是啥时候了，就是到你那儿麻烦过你的那个混小子呀！”

老头子口中的“你”，听来使我感到很亲热。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名字已经忘了，三年以前，确实因为学

校的事情，突然跑到我家里来过，那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呵呵——”我这么说着，可是还不大明白。“是和什么工会一起去的？”

“工会，可不知道！他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就到学校去！”

这么一說，我才想起那时就是因为老头子叫他念完中学就不要念書了，他因此和老头吵了起来，才跑到我那儿去的。

“为什么？就是为了所說的什么扰乱罪嗎？”

“到底为了啥，不明白！”

“去看过他嗎？”

“去过两回。就是太远了，一去就得一天！”

从五月一日算起，已經一百多天了。老头子蹲着，手指夾着我給的那支香烟，扶着額角，看着地面。我对他說，国民救援会会請律师的，从新聞影片上看，那情形也和报纸上报的不一样，是警察那方面首先动武的。这些話，他也并不怎么热心听，只是不时的偏着滿是胡子的臉，打着响舌。

“什么这个那个的！都是些不安分的东西！”

这时，一个似乎是鄰近的农妇从坡上往这边走来，他就站起身迎过去了。又从牛棚后边拉出一輛手推車来，給了那个农妇。接着，他那十岁的最小的女儿和大些的十二三岁的姐姐，象是曾到河里游过水，头上蒙着半干的毛巾，嘴里叼着毛巾的一角，眼睛发亮，走了回来。老头子一見就大

声叫道：

“混蛋，今天刮北风，不是不叫你們游水嗎！快去打水去，做飯！”

虽然老头子以前就不是所謂的“反赤化”的人，但是我說的話，似乎使他很困惑。我也覺得很窘，就想去割些牛草来，我从背囊里取出“水袜子”和裹腿来。——这个消息，实在是我想也想不到的。

2

飞机的馬达声不分晝夜在头上响着。在深夜里，也听得見大卡車在崖下的大道上奔馳。除了山田这一家以外，别的农家我是不熟悉的，和我从前到这儿买食粮的时候比起来，这村落确实是熱鬧得多了，但是有的地方却使人感到比以前更冷清。出去买烟卷的时候，看見道路已經放寬了，豎着很多英語的标志牌，派出所的大門和招牌等等都煥然一新了，可是那些有庫房的商家，有的却在白天都上着窗板，在街上可以看得清屋內的草屋里，象有病人似的靜悄悄的挂着蚊帳。

过了一夜，才知道老头子还没有孙子。想不到老头子是个好喝两盅的，在掉了漆的小飯桌上，放着一个发黑的杯子，喝着燒酒。

“自从大儿子打仗死啦，就倒起霉来了！”

老头儿因为没有牙齿，咂的舌头啵啵响着，一边望着坐

在板床上每个小飯桌前边的家屬們。所謂家屬，也不过是坐在鍋旁边的老太婆和两个还小的女儿。二儿子快三十了，正要討个老婆的时候，可是去年工厂垮台，失业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事做，人家劝他去帮助搞什么黑市米的买卖，被抓去了，又是罰款，又是賠償，弄得一身飢荒，把繳粮剩下的吃飯用的米卖了三百斤，好不容易才把他从警察那里弄出来，直到現在还找不着事做，只得东奔西跑，偶尔才回趟家。大女儿去年病死了，二女儿到东京当女佣去了，三儿子在小菅監獄——情形就是这样。

“大儿子打仗打死了，这就倒起霉来啦！”

老头子重复这句话。放下杯子，又响着舌头，撫摸着已經紅起来的滿是胡子的臉頰，忽然望着小女儿，嚷了起来：

“你看，你看，弄一桌子飯米粒儿！”

他的老婆已經是个老太婆了，冷眼一看，有点可怕。一腦袋乱蓬蓬的白头髮，人又黑又瘦，总是把小腿露到短罩褂大襟的外边。吃晚飯的时候，我说了些“五一”节的事情，虽然說到了在小菅的三儿子，可是老头子一声不吭，老太婆也就只是望着老头子的臉，也默不作声。老头子大概是不願意当着已經上了小学的孩子面前，談这种話，恐怕在村子里傳出去找麻煩。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头昏眼花。讓跳蚤足足咬了一夜，連从炕沿上伸脚到地下穿“水袜子”的气力都沒有了。我虽然也是个写小說的，但我想所謂語言和概念这种东西，也不一定靠得住。譬如，有“被子”“拉門”“席子”

这些語言，假如拿“被子”这話来看，就有“薄被子”“漏棉花的被子”“油光光的被子”等等，可是上述任何一句話都对这里的被子不合适。說薄也并不薄，虽然破了可也沒漏棉花，又不是滿是油垢的被子。如果，从这石头一般重的被子上，除去尘土和髒东西，那么这被子也將消失了吧？我一边这样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边走到灶炕前边，用柴火点烟，这时老太婆說話了：

“今天，也要热呢！”

老太婆拖的草履直响，在地上慌慌忙忙地轉动着。我睡意蒙眬地随便回答了一句話，她就提着水桶，走到我身旁的咸菜缸前边来。

“噲，您說——”这时，她抱了一块压咸菜的石头，把臉貼到我耳朵旁边說：“——監獄里，也挺热的吧？”

“是呵，因为全是水門汀的！”

“水門汀……”她自言自語地說着，陷下去的眼里发着光。“——风呢，透不透风呢？”

我正想回答，她急忙站起来了。因为老头子走了进来。

“到河滩去嗎？”老婆子問他。

“不去怎么办？”老头子把長烟袋鍋从我的肩头上伸过来，在柴火上点着，一边气哼哼地回答。

“那就得預备飯盒子啦。”

“你預备就是啦，叨叨啥！”

这场頂嘴是有原故的。后来我才知道，老头子到河滩，是当挖沙石的小工去的。沙石是用在××基地的，一天两百

块工錢，被工头再剝削一成，只能到手一百八十块錢，可是老头子回来时，在道上就得喝去一半。老太婆在一旁嘟囔着：白薯的叶子得翻了，旱稻也得培土了，……可是讓老头子一句話就給頂回去了：“猫腦門子那么大点儿的田！讓小崽子拿鎬去弄弄就得啦！”

早飯和昨晚的一样，是大麦飯和茄子醬湯。咸滷滷的稀薄的醬湯也成了貴重的东西，最小的女儿碗里剩下一半，大点的姑娘就和老太婆分着喝了。

我扛着鎬，跟着老太婆，到后山去了。繞着山腹走了半里的样子，下到一片杉林后面的旱稻地里。只有六亩来地，有一亩被树蔭擋住，不着太阳。似乎开垦沒有几年，地土不肥。因为稻子是种在麦壟之間的，虽然拿耙子打过麦楂，可是培起土来也并不輕松。下不去鎬，打在麦楂上就濺起土来。說是使鎬刨，其实使鎬的还是手，这双手却是使不好鎬。我也并非完全是个外行，可是干了一条壟以后，已經渾身大汗了。

“今年借了人家的米，得还給人家，这才种了旱稻，可是——”

老婆子擦身过去的时候就說几句话，可是我連回話的勁头儿也沒有了。

“——还得拿錢买肥料，不上算哪！”

我才培了半条壟的时候，老婆子已經培完了一条，又去培第二条壟了，正好碰个对面。她那細瘦的手脚，原来是可惊的强健。两三个来回以后，我已經直不起腰来了，于是挂

着鑄把到壟道上，躺了下去。流到嘴里的汗水，咸咸的。

最小的女孩子抱着青色的水罐和咸菜碗走来了，老婆子也到壟台上来，摘下了草帽。拿罐子盖儿一口气喝了一肚子白开水，然后也没用水冲冲，顺手就把罐子盖儿给了我。我却也并没有不洁净的感觉。

“你，多大岁数啦？”

老太婆在看着我，她的脸并没出多少汗。她对我不称“您”，而称“你”，这是表示在一起流汗的人的亲切和率直。

“五十三。”

“喲，和我同岁呵，属猪的吧？”老婆子笑了笑，接着说：“长得真年轻！夔，还是因为没啥操心的事儿呀！”

这是很妙的。很少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当小姑娘替她把粘在白头发上的稻草取下来的时候，老婆子把戴着手背套子的手掌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等小姑娘拿着水罐什么的一走开，她就说：

“自从咱家大小子打仗打死了，他爹简直成了个酒篮子啦！”

这仿佛是要取得我的同情的声调。

我们的话又谈到今早在锅台前边说的事情上去了。当我说到我可以替他们去探望一下的时候，老婆子的陷了下去的眼睛，又发出光来。

“呵呀，那可是多谢啦！”老婆子小心地向四下看了看，低声说：“我本来打算自己去一趟，可是老娘们一穿上长褂子，村子里的人就要问长问短的！”

我說了一點在“五一”節那天所見的事。老婆子一聲不吭地听着，可是話一說到需要判斷誰是誰非的時候，她的眼睛里就糊塗起來了。

“阿新在家里可能吃啦，我一想到監獄里的飯不夠他吃的，簡直難受的不得了！”

雖然地里沒有別的什麼人，可是老婆子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總是不斷的東張西望。

大型轟炸機緊貼着山巔出現了。也許因為剛剛離開基地，飛得很低，轟轟響着，震動着這一百來戶人家的小村落，飛了過去。下午很早的就把早稻地收拾完了，我总算勉強支持到最後，可是當老婆子往另一塊地去的時候，她叫我先回去燒洗澡水，我也就顧不得面子，从地里回去了。

“B 29”就是這天傍晚摔下來的。

我和大一點的小姑娘兩人把洗澡池的水燒熱了，我先下去洗。到天黑的時候，涼爽一些了。似乎是才喝了兩盅酒回來的老头子，在房檐底下的一邊躺着。老婆子還沒从地里回來。就在我蹲在廁所隔壁的圍在板障里的浴池里，朝着亮處看着被熱水浸濕了的掌上的水泡的時候，突然手掌被映得通紅，這一瞬間，象是有人在敲打什麼鐵桶似的，一陣響聲使我跳了起來。

頭上燃燒着通紅的火焰，更高的空中是漫天的黑煙，傳來可怕的不斷爆炸的聲音。——定下神來一看，原來事情發生在離這兒至少有一公里遠的地方，在村落一頭的突出的山嶺那邊。——那個大一點的小姑娘，剛从外面打水回

来，水桶放在身边，失魂落魄地蹲在正房門口，吓得臉色发青，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是赤裸裸的，只拿一块湿毛巾遮着前面。

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老太婆跑进屋里，瘋狂似的嚷叫着。老头子大概想把牛放出来，正在拆着牛棚的欄杆。我从崖上下去，到大道上的时候，天已經黑黑的了。家家都在吵嚷着，可是不知为什么，却都关着电灯。从各处跑来的穿着消防衣服的男人們，越过我向前跑去。可是，意外的远，还看不见飞机机体。当我看见被汽油燃燒起来的山上的房子，和被松林的火焰燎烤着青青的田地的时候，好象是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把我擋回来了。这里是桥头，攔着稻草繩子，擋住了消防人員以外的人們。

“危險哪，真危險！”

派出所的警察揮动一下提灯，人們就往后退一退。爆炸的声音还在繼續响着，可是已經比剛才小的多了。火焰向着山上延燒开去，这才看出来那儿离着庄稼有五百多公尺远。

“我是××的亲戚，讓我过去看看吧！”

这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立刻被頂回来了：

“要是再爆炸起来，怎么办？”

提灯又一搖动的工夫，就把我挤到田壠之間的小水溝里去了，吉普車开来了。七八个装备得和美国兵差不多的，戴着鋼盔揹着短枪的人跳了下来，我們被赶散了。

“××家的病人，燒死了沒有？”

“喂喂，我說，我看降落傘下來啦！”

被趕了回來的人們，還在激動，不知為什麼在跑着。在我回到村莊的途中，行人還不見稀少。火焰比剛才低了，每家還都關着電燈。在道旁的黑影里，女人們象是被恐怖壓制住了呼吸似的，噉噉喳喳着。

“我以為又是來了空襲呢！”

“我天天想：可別掉了下來呵，可別掉了下來呵！可是真就掉下來了！”

暗影里，嬰兒們的哭聲和媽媽們的喝聲里，混雜着女孩子們的啜泣聲。

“媽呀，我害怕！”

到山崖底下的時候，突然一道耀得眼花的光綫，吓得我幾乎跳了起來。兩三輛大型吉普車，接着，在黃塵的後邊是一連串的車燈。救急車，消防車，大卡車尖銳地鳴着笛。還有伸着巨大的長腕的起重機卡車，把各種車輛都擠到一旁，緊挨着家家的屋檐開過去，震響着大地。

回到家裏的時候，老頭子一家已經鎮靜下來了。好歹总算吃過晚飯，可是簡直弄不清現在是幾點鐘了。在崖下的大道上，從××市來的人們和車輛，越來越騷亂了。

“山田，真是要命的事！”

“山田，你們還好吧？”

有人在崖下的道上朝山田家這樣喊着走了過去。也有的人們登到山坡上談論着。

流傳着各種傳說：有人說在大型轟炸機掉下來以前，在

半路上就扔下来炸彈；也有人說有九个美国兵跳傘得救，有三个燒死在机身里，有一个死在田地里。燒了两家农家，死了一个病人和一头牛，燒了十七八亩松树林，杉树林还在燒着。

“真是飞来橫禍，您这儿沒有受伤的嗎？”

已經很晚了，大門口来了一个青年，这样問着。这个青年剃着光头，身材很瘦，穿着縐縐巴巴的翻領汗衫。

“謝謝！”老头儿从里屋的拉門里伸出头来望着門口，这样回答。又問：

“你們那里沒有出什么事嗎？”青年行一个礼道了謝。話里有些方言，可是語調却不同。不是学生，虽然身体也結实，却又不象是真正的农民。

“我們那里，东家病了，全是些娘儿們，一开始就慌成一团儿了！”

他說着話的时候，有往下看自己脚尖的习惯，怎么也不进屋来。

“請进来吧！”

老婆子說，老头也說：

“进屋里来吧！”

青年行个礼，說一声我再来，便回过身来，这工夫，我正坐在房門旁边，他对我說：

“是××先生吧？”

还没等我回答，青年行个礼，就在黑暗里消失了。

“媽呀，你来看，这些怪飞机打轉儿呢！”

門外边，女孩子們叫着。后来我向老头儿随便問了一下那青年的事，說是崖下一家农家的雇工。

我走到院里，崖下大道上越来越騷乱了，各种車往来行駛，車灯照耀着揚起的灰尘；头上，一架架飞机在回旋着，几乎要碰到房頂了，机尾上亮着紅、藍、紫、綠五六个灯，掀起一陣陣的风，在头上飞来飞去。

“三十七，三十八，媽呀，有多少架呀？是不是要往我們这儿扔炸彈？”

老婆子甩开被拉着的手，叱罵着：

“住嘴，当心人家听见！”

难道飞机上能听见么？可是誰也沒笑她。火焰还在冒着，不时响起爆炸声，在凄惨的汽笛声中，村庄象是闭着气似的，靜默下来了。

3

大概在第四天，自从前一晚上下了暴雨，現在变成了連阴天，雨剛一住又下了起来。到晌午，我和女孩子們整理着扔在屋地上的滿是泥的韭菜苗。老婆子很难得的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向鄰家收集茶碗，因为今天是她家值日，午后要在这里开村子的例会。

吃完了午飯，老头子趁着晌午放晴的工夫，到地里去除稗子，我就背了草筐，割喂牛的草去了。被雨洗过的田野是美丽的。家家都鋤完了第一遍草，据說不再鋤第二遍了，这

为什么,我不大清楚,只听說最近撒过了一种預防害虫的葯品,在这以后,草就不大長了。已割过的稻田也收拾得很整洁,好象剛理过发似的。农民是对田地傾注了精力的,如果和他們家里的骯髒比較一下的話,那是使人覺得奇怪的。好象是地里越整洁,家里就越骯髒……

来到河滩的土堤上,割着田边斜坡上的草。我看见过丢在牛欄底下的草,那些喂牛的草是很好的,所以必須挑选着割才行。草也有各种各样的,用眼睛看可以知道哪些草是牛或馬喜欢吃的,可是几乎叫不出名来。我是从小就割过草的,可是我在文章里却从沒写过草的名字。我正想着为什么在日本的小說里几乎很少写到杂草的名字呢?这时,堤上有說話的声音:

“你原来不是一个外行呵!”

老头子背着手,拿着一把稗子,站在土坡上。誠然,象割草这样的事情,我本来是一把好手。

“燒了很多呵,有五十多亩吧?”

我也上了土堤,飞机掉下之后燒焦了的山脊,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一而眺望着——和老头子一块点着了烟。

“不止是五十多亩,那些枝叶有点发紅的,都得枯死!树干受了伤啦!”

松树林是全部熏黑了,杉树林也只是在山頂上剩下了一点儿。

“山是誰的?”

“村子里公有的!”

“燒了的飞机，归置好了嗎？”

老头子不吭声，把正在抽着的紙烟用手弄熄了，过了一会冷淡淡地說：

“不知道。”

他又說：那时候不許打警鐘，所以有好些消防人員都沒有赶到，說着向河滩那边唾了一口：

“不干好事！”

河滩这儿是多摩河的上游。也有适于釣魚的地方，可是看不見一个釣魚的人。对岸，断云的下边，望得見已經不冒烟了的紡織工厂。

“近来，連鮪魚都吃不着了，河里滿是汽油！”

有基地的××市，是在河滩下边。河里当年的小魚还对付吃，可是两寸多長的魚都帶汽油味了，对这些終年买不起海魚吃的村民來說，这实在是一个打击。

“快点回去吧，也許还要下雨！”

看了看天空，老头儿就下了土堤。我回到斜坡上，又动着镰刀的时候，老头儿的話說中了。来的时候沒帶蓑衣，我背上草筐就跑了起来，可是全身都淋湿了。

村子里人集合在一起了。从房檐下直到鋪着花席子的房間里，坐着三十多个人。大概是村子南部或北部的一部分的例会，抱着孩子的妇女們在屋里土地上或門口的板壁那儿，在人家望不見臉的地方，坐了下来。我換了淋湿了的汗衫和褲子，可是在屋里找遍了各个角落，也沒有找到上衣。因为跑得累了，就躺在鋪着木板的房間里了。木板上

滴着醬湯，黑黑地聚着一群蒼蠅，又嗡的一聲飛去了。

側着臉，鼻子下邊就是泥腳印。臉朝上躺着，天花板上垂着的一絲絲的蛛網和粘蠅紙，在搖晃着，被粘在上邊的蛾子，抖着白色的粉末。

就這樣，我躺了半點多鐘。聽他們正在說着，飛機掉下來的那天，因為各種各樣的車輛從橋上跑，所以有一兩根橋腳柱子折斷了。現在只有手推車之類還勉強可以通過；可是要修復它，人工費是由村公所出呢，還是出義務工呢？大家正在討論這個。

我冷得直打哆嗦。灶里沒有火，老头兒和老太婆又正在房檐底下規規矩矩地坐着，我只好忍耐着。這時，我注意到在屋里土地上蹲着的婦女們的身後，那個前天晚上和我說過話的青年“雇工”，正用一只手托着頰，在小本子上記着什麼。也許因為是雇工，代理東家來的，就不能加入到男人當中去吧？他好象也注意到我了。會議結果，是暫且從這會里用抽籤的辦法選出五個人，先向村公所試着要求他們出工資，如果不成就挨戶均攤。直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他始終都是熱心地伸着脖子傾听着。

“到牛棚後邊去吧！”

人們開始閑談，在這吵吵嚷嚷的時候，這個青年雇工就朝爐灶這邊走來，從我身邊走過去的時候，小聲對我說。然後他就出了後門，從栗子樹下邊繞到廁所後頭。牛棚後邊的房檐底下，堆着谷糠和稻草捆，暖和和的。

“從支部那里聽到了您的事，可是我一到晚上，就累得

不得了……”

他不断搔着光头。支部是在鄰村里，这里是沒有的。果然是个同志。看他的手，虽然手指关节粗大，却是有着銳敏感觉的。

我們攤开稻草捆，躺下来談話。不久以前，他还是个鏟盤工。

“您認識这家的老三嗎？”

我对他說了我遇見他那次的事情。

“我也是在‘五一’节以后，参加工作的，不太知道他，”青年說話很快，有些口吃。用一只手支着上半身，一边說着話一边向下看。“这家的老三，并没有参加过农会什么的，只是在他夜間去上課的××市的高等学校里，有一个反对美兵和伴伴儿^①淫乱行为的团体，他就是在这个团体里参加‘五一’节游行的。”他說了这些以后，我說我明天就要去探望他，他就說，不管多少一定要收集一点东西帶进去，并且今天晚上就能送到我这儿来。

“当了庄稼人，够受的吧？”

我这样問他，他眼睛向下，弄着稻草說：“是啊！”他那瘦長臉顏色很白，因此被日光晒成褐色的脖子很显眼，眉毛是長長的。只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已經两个月了，多少习惯了一点儿，不过，……”

說着，又下垂着眼光。

① 伴伴儿——以美国官兵为对象的妓女。

“……不过还挑不了粪桶，昨天，一下子就滚到壟道底下
下去啦……”

他有点懊丧似的用牙咬着稻草。

他是在被工厂解雇以后，参加了农村工作队，来到这个村落里的。工资一天五十元，没事做的日子就不给。他说：本来一般的短工，就是妇女也可以挣一百元，如果再要求多给些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对方是小庄稼户，东家又有病，家里连蚊帐都没有，所以他就自行放弃了。

“不行啊，来了两个月，还只是和大家面熟而已！村子里的人还是不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里的山田，因为地头连着地头，插秧时候互相帮过忙，处的还不错，可是……”

说着，他从工裤口袋里，拿出一本发皱的笔记本给我看。看来毕竟还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的，本子里满满写着铅字似的整齐的字。乍一看去是不懂的，从青年的说明中才知道：这个村子里田地很少，还是被有山林的地主支配着的。

也有这样的人家，东家在××基地干着守卫之类的差事，地里的活儿就雇人来干。村子有劳力的人，几乎都是自由党系统的，所谓“政治意识”比较强的，热心于庄稼活儿的人多半是小农户；有地的人家，就只是忙着往外放钱……

“刚才，在房檐下边盘着腿坐着的，长长的脑袋满脸油光光的那个，——你没看见有一个穿着美国大兵的裤子，拿一把白扇子的吗？”

我没有注意到。

“他一声也没吭，然而他是村长，村议会主席，是自由党议员××的狗腿子！”

我想不起这个人来，青年似乎觉得很可惜。他把两手垫到脑袋下边，仰天躺着，用兴奋的声音说：

“那些家伙们很厉害！我当了雇农以后才真正了解了——”

他吸了一口气，接着憎恶地说：

“——都是封建势力嘛！”

我看着笔记本上的一页，在“山田猪之吉”下边写着：“耕种亩数：水田四亩九分，旱田二亩八分。”还有：“旱田一亩八分是租佃的，其中一亩三分地的地主是××。”“地租每亩二千一百六十七元。”

“这就是这家的山田吗？”我问。

青年抬起脸来，点点头。说：

“还有很多弄不清的呢！”

他拿过笔记本，一边看一边说：

“老头子的脾气可顽固啦，不能随随便便地问他什么。问他买地的时候借了多少钱，他说不知道。可是老太婆说为了给人家打利钱，每年得去白打十天工！债主当然是刚才说的那个长脑袋，那家伙是这一带顶大的地主！”

青年一边抛开手里的稻草，一边说。从麦秸屋顶的房檐上，还滴落着水滴，可是山上边已经放晴了，露出了一片夕阳。

4

第二天早晨，本来早早就出了村子，可是错过了公共汽车的鐘点，到綾瀨站下车的时候，就过了十点，天已經很热了。小菅的監獄从来就是有名的，三面都圍着大濠。大濠的对岸矗立着長長的水泥高牆，濠的这一边是連一棵树都沒有的淒涼的道路。沒到脚脖子上的尘土，热得象火燒的一样。濠里的水在流着，似乎正在往下退，黑油油起着沉重的波紋，在似乎是監獄下水道的巨大的暗渠上，牢固的鉄柵張着滿是鉄銹的大嘴。

老太婆托我帶來的包裹里，除了汗衫和褲衩之类的衣服以外，还有一个罐頭盒子，里边滿滿地裝着炒蚕豆。昨天晚上，老太婆忙着縫补褲衩什么的，忙到很晚；老头儿在一旁裝着若无其事的神气，可是，当我临走的时候，他从腰上的烟荷包里，拿出了一張變成四折的百元鈔票，讓我帶去。

可是，現在我要去会面的这个叫做新太郎的少年，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我还实在摸不透。虽然昨天从那个青年雇工的口里知道：在夜校里有那么一个团体，他就是在那团体里参加“五一”节游行的，多少有了一点印象，但是三年以前他到我家的時候，还完全是个孩子。那时，也許是从作作短歌的亡兄那里，知道了我是做什么的，才跑来找我商量的吧，实在是来得很突然。說是因为升学的事和老头子爭吵起来，他自己打算，一定要念高中，夜校也可以，他要我判断

一下他的意見到底对不对。

我記得曾經給老头子写了一个明信片——或者是一封信，我說我贊成少年的意見，如果家計允許，就應該滿足他的願望。不过后来，到底怎样了，少年也沒有給我一个信儿。留在我的印象里的，这少年是个面孔紅紅的，胖胖的，矮矮的，看去很有毅力的一个小家伙。

“上来坐吧！”

可是起初他一动不动的站在門外，脚上穿一双膠皮鞋，拿着学生帽的手放在腰上。

“——我爹說，念完中学，就算啦，不讓念書了，可是我……”

剛走上外間的洋灰地上，他就赶快地說。好象舌头不灵便，說起話来一頓一頓的，只听他的話真是不大容易懂，然而在他那胖胖的两頰上边放着光的小黑点似的眼睛，却把他心里的不平表达出来了。

“——我說，我要上学，不去，那可不行！我爹就說：那就給我滾出去！那么，你說我……”

就是这样的語調。話是說的絮絮煩煩的，然而非常的認真，非常的急切。我还記得我就在門前被他的神情吸引住了。

象翻过来的螃蟹似的，四輪朝天，在燃燒着的外國汽車，——从耳朵后边流下几行血、染紅了白色上衣的、大大的眼睛直視前方走过来的日本少女，——这些情景，和那生在

紅紅的臉龐上的凹陷的小黑點似的眼睛，是通過怎樣關係聯結在一起的呢？

等待室里滿是人。國民救援會的一個老太婆正在幫着辦理和“五一”事件有關的人，以及其他事件的犯人們的接見和送東西的事情。她不斷地用脖子上的毛巾揩着額上的汗，從小筐里拿出申請書或者筆記本，如果對方是背着孩子的媽媽，她就取出上面寫着“和平大會”字樣的團扇，轉到後邊去給她搨。不知這個相貌高尚的老太婆，是個怎樣的人。

“三十七號到三十九號——三十七號到三十九號！”

呼喚接見人的擴音器叫着。每呼喚一次，等待室里都會引起一片騷動。因為“五一”事件被捕的就有幾百人，所以來接見的家屬是特別多的。

“向島警察署××號呀，你說什麼呀？”一個象是工人的妻子，很年輕，穿着黑裙子，不服氣的說。因為多數被告都堅持着“守密權”^①，被檢舉時的警察署名和號數就成了他們的姓名，我要接見的新太郎就是“××署××號”。這兒有各種各樣的人。一個女人，背上背着、手里牽着、一共帶了三個孩子，人家問她的時候，她簡直喘不上氣，回答不出來。當她正要鬆開背上的帶子的时候，一個穿得很整齊的女學生樣子的姑娘，趕快把正在讀着的書放到椅子上，跑到女人身後去，用手拖住她背上的孩子。

一個說是從千葉來的老太婆，把包袱挂在肩上，挂着手

^① 日本法律規定，犯人在起訴前，沒有蒐集到確實證據時，被告有拒不作答的守密權。

杖，泰然自若地在長椅的一头上坐了好几个小时。听说这个老太婆天不亮就来了，也早已接見过了。原来她接到了獄里儿子的信，說是一連拉了十天痢疾，还没有好。于是，老太婆就帶着垫布来了。見了面以后，知道已經好了，她这才放了心。救援会的那个老太婆到她身边来对她说，救援会从獄里取得联系以后，立刻就通过律师办理了医疗手續，所以用不着那么挂念了。可是老太婆耳朵有点沉，沒听清人家說了些什么，尽自叨念着：

“看見他气色不錯，我放心啦，是呵，放心啦！——儿子还跟我說：媽媽，挺起腰板来吧！——”

輪到我接見的时候；已經是大下午了。穿过了在水泥牆上打开的一个小門，按着看守的指示走过了一条水泥的走廊，就是一排有着小門的接見室，不知在第几个門上我找到了那个号碼。进去以后，一个看守正坐在窗下的椅子上，把胳膊架在椅子背上，厌倦地点了点头，在鉄絲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脸色蒼白的青年。

“蒙您特地来看我；对不住！”

他用不高的声音，謙遜地說着，行了礼，穿一件也許就是他父亲的有格子的單衣，从我这边可以看得見他那放在腰帶上的两只手。三年之間，面貌已經大变了。个子長高了，肩膀很寬，但是瘦了些，也許因为監獄生活的原故，脸色是蒼白的。

“身体还結实吧？”

“身体很好！”

他微微一笑的时候，高高的颧骨上的两眼就不见了，又变成了两个小黑点，这时我又清楚地看见了三年以前的景象。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了！”

他搔着头，又笑了笑。好象他也想到了三年以前的事，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完全是个大人了。在对他所“守密”的一些事情上没有妨碍的程度以内，我对他说他家里的人都很平安，他注意地听着，点着头。

“这里的伙食怎样？”

我们的话题一直在谈着带来的东西，说完之后一时就没话可说了。我本想问一问他参加“五一”示威游行的心情，但是有看守在那儿，从对方的情况上说来，这问题恐怕是有些不适当的，所以说了上面的话。

“饭是四百公分，副食费每天十七元五角——”

他一只手摸着脑后，舌头仿佛和从前一样的不大灵便，说起话来断断续续，一顿一顿的。

“菜，多半都是蛤蜊和海带，煮的酱油。晚上是，煮南瓜，没有多少盐的——”

看守弄得椅子在地上直响，打着呵欠。他还是用同样的语调说着：

“——可是，外国人，就不同。副食费，一天就是五十元！这里边有外国人。”

我问看守可不可以把这些话记下来？他从椅子背上转

过臉来，在眼睛里笑着，仿佛說：愛，沒啥不可以的！

“这里有强盜，暴徒，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抽烟，看报，神气十足！”

他在鉄絲网对面，靜靜地講着：監獄里也是殖民地状态；几天以前，为了懲罰“五一”事件被告們的唱歌，出动了特务警察，給他們銬上了手銬，把人弄得半死；这里的罰規，据典獄的回答，还是明治四十二年制定的呢。

这时候，早已离开椅子在我身后走着的看守，走了过来，站到鉄絲网前边了。我吃了一惊。看守什么也沒說，新太郎微笑着，住了口。

“过時間了嗎？”

我这样一問，看守难为情地瞧了瞧手表，神气不那么强硬了。又走到我身后去，一边說：

“按規定是可以到三十分鐘的，”又接着說：“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人在等着，还是快一点好！”

果然，在門外有探望的人們帶來的嬰兒的泣声。

“麻煩您，能不能給我送一本‘整风文献’来？”

“整——风？呵，‘整风文献’！”

“是的，进来以后，借別人的讀过，可是人家的書，又不能往書上批什么！”

高高的顴骨，小小的眼睛，成人一样的沉着。既不恐惧看守在旁边的威胁，也沒有故意調皮的神气。他是从什么时候讀起“整风文献”的呢？話头断了一会儿，兩人互相望着臉的时候，新太郎搔着腦袋說：

“我是，直到‘五一’节，还是一个旁观者呢！”

“旁观者？”

他透过铁丝网，对看守望了一眼，低下头去说：

“我们，是跟在别的工会的后边，往广场去的！实在是，很高兴！在广场上，不知是什么工会的，妇女们，围成一团儿，在跳舞！男人们，也摇着旗一块儿唱，我们也就唱开了！不是有一个，“把世界结成一个花环”的歌吗？可是，这时候，前边就乱啦！……”

又往看守那边望了一眼。

“——起初，我们就逃起来了，害怕了呵。可是，拍拍地飞来了催泪弹，眼睛睜不开了。后来，可一下子睜开了眼睛，一看，就在我旁边，女的，男的倒下了！这些混蛋……”

说到这里，好象才注意到了似的，把脸离开了铁丝网，笑着，用一只手拍着后脑。我一直望着他的表情，只是“呵，呵”地答应着；可是大体的情形我已经明白了。

过了十五分钟。给看守点点头，再回过头来，我看见在铁丝网那边，他已转过去的半边脸又转了过来说：

● “××日是公审，请您叫他们都来听听！那天，我打算痛痛快快地讲一讲……”

出了门，走在走廊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在什么地方读过的一句话：“造成了共产主义者的，决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而是资本主义自身。”

等待室里人已经不多了。我向那个救援会的老太婆道了谢，出来的时候，太阳还很高。刚走了一段路，一个头上

包了一块手帕的年輕妇女，“喂喂”地喊着我，跑了上来。

“您是山田的家属嗎？”

說明起来实在麻煩，我就答了一声“是的！”她把手里的报纸包儿递了过来。

“这是山田的东西！”

輕而小的紙包，上面用紅墨水写着“××署××号山田”的字样和遺失物品的号碼。

我想她大概是救援会的人，对她道了謝，把紙包放进衣袋里，又往前走。

路上，我回家去了一趟，回到山田家的时候，已經晚上九点多了。

家中只有老头子自己。女孩子們和老太婆在这次輪班燒澡盆的岸下一家人家里洗澡，还没有回来。我正喝着老头子給煮的热茶，那个青年雇工，一边說着：“我这是第三次来了！”一边走了进来。

“是啊，身体結实，总比有病的好！”

照常系着一块兜襠布的老头子，一边听着我的报告，一边赶着胯股上的蚊子，这样說。我想起了那个报纸包，就从脫在肥料草袋上的上衣口袋里，拿了出來，交給他：

“什么东西？”他問。

我也还没有看呢，打开套着膠皮圈儿的报纸包一看，先是滾出一枝自来水笔来，接着出現了一本在脊上插着一枝鉛笔的小筆記本；一块髒得很的小手帕纏成一团儿。筆記本上用小小的字写着“五一”歌曲的詞句。老头子两手展开

了那条髒手帕，一只手的手指上夾着点着了烟的烟袋，这时，烟袋抖动起来了。

“呵，是血！”

在一旁注意地看着的青年雇工說。在纏成团儿的手帕角上，的确凝結着一块硬硬的血，已經变成了黑色。

“誰的血？”

老头子把它扔到一边去，把身边的用空罐斗盒做的烟灰皿挪了过来，把烟袋在那上边敲了两三下。

“是那个混小子的血！”

我們都沉默了一会儿，听見了門外小女孩們的声音，老太婆也走进来了。

“呵呵，您真受累啦，天可太热啦！”

老太婆一見了我，立刻就走进来坐在門檻上，下巴上支着一只手，由下边向上望着。我的話說到一个段落，她就点着头，陷下去的眼睛放着光。

“还結实嗎？嘿嘿嘿，是呵，結結实实的，我呀，算是放心啦！嘿嘿——”

这时，我注意到老头子裝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把那块髒手帕团成一团儿，一下子站起身，塞进头頂上滿是灰尘的棚板上了。

“我寻思阿新那小子，早就餓坏了呢！噯，他是不是还穿着單衣裳呢？”

老婆子翻来复去地問我已經說过了的話，我也滿有精神地对她說，可是老头子在一旁叫了起来：

“話，以后还能說！××先生还餓着肚子，你先去热热面条好不好！”

这么一說，老太婆就慌忙站了起来。我說我已經在路上吃过了，她也不管。还說这是特意給我做的，就把鍋拿到灶上去了。年輕的雇工默默地望着屋地。老头子从烟荷包里捻出烟末来，裝进烟袋里，不住地干咳着。

譯 后 記

一九五四年，“在軍事基地旁边”于某刊物刊出以后，我們接到德永直同志寄来的短篇集“下乡的文工队”。作者还特別在目录上标出了他希望介紹給我国讀者的几篇。我們感謝作者的好意，便在业余挤出時間，断断續續地把这几篇譯出来了。这几篇小說，真实地反映了在美国軍隊占領下的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革命的胜利在日本人民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青年，渴望着讀到“整风文献”。一个大学教授在革命群众中进行着刻苦的自我改造；一个女工在車床旁唱着中国的“流亡曲”，閱讀着“新民主主义論”。……这些描写，是亲切动人的。

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能够讓我們把他更好的新作品介绍給中国的讀者。

譯 者 1957年7月1日